

我是共产党员

百年大党群英谱

了不起的巾帼英雄

任仲文 编



央 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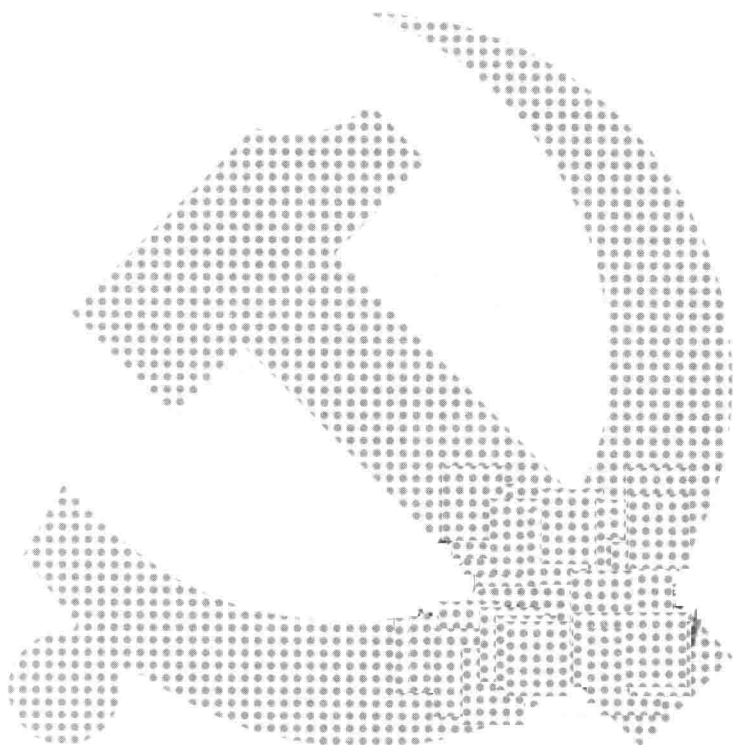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予秀慧
冠开慧
警陈铁军
成赵曼
杨李贞
陈王筠
越李蓝
李丁
王胡兰
刘丁雪
丁松
李和英
常香玉
董全珍
于漪
申纪兰
解秀梅
郭兰英
屠呦呦
谭青
周凤英
樊锦诗
那燕子
郝贵玛
张海迪
张桂梅
袁红冰
李素丽
王佳花
任长霞
宋鱼水
陈薇
梁建英
司洋
文花枝
袁文秀

了不起的巾帼英雄

任仲文 编

我是共产党员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共产党员：了不起的巾帼英雄 / 任仲文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12

ISBN 978-7-5115-7191-5

I. ①我… II. ①任… III. ①中国共产党 - 模范共产党员 - 先进事迹 IV. ①D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47140号

书 名：我是共产党员：了不起的巾帼英雄

WOSHI GONGCHANDANGYUAN: LIAOBUQI DE JINGUOYINGXIONG

编 者：任仲文

出 版 人：刘华新

责任编辑：林 薇 陈 佳

装帧设计：观止堂_未 氓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2 65369846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010) 65363486

网 址：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科宇律师事务所 010-83622312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20千字

印 张：16.75

版次印次：2022年2月第1版 202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7191-5

定 价：48.00元

1921—1949

向警予 中国妇女运动先驱
002

戎冠秀 子弟兵的母亲
006

杨开慧 “牺牲我小，成功我大”
012

陈铁军 富家小姐舍弃安逸投身革命
018

赵一曼 誓志为人不为家
023

李 贞 坚贞一生的开国女将军
027

江竹筠 入党之初就决定把一切献给党

033

李蓝丁 中国的南丁格尔

044

刘胡兰 领袖两度题词的女英雄

049

 1950 年至今

丁雪松 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

060

李桓英 心怀大我，毕生求索

071

常香玉 戏比天大，忠心报国

082

龚全珍 坚守爱与信仰的本色

086

于 漪 “让生命与使命同行”

092

申纪兰 对党忠诚，执着为民
097

解秀梅 唯一女志愿军一等功臣
103

郭兰英 “吾为人民唱”
113

屠呦呦 一生倾情青蒿素
120

谭竹青 走街串巷的贴心人
126

尉凤英 毛主席的好工人
130

樊锦诗 厮守，一眼千年
135

邢燕子 乡亲“知心人”
140

都贵玛 草原最美的额吉
146

张海迪 用燃烧的生命抗争
151

张桂梅 用初心和信仰书写对党忠诚
156

卓嘎、央宗 爱国守边的最美格桑花
166

李素丽 为人民服务没有“终点站”
175

王仕花 以岛为家，守岛卫国
186

任长霞 人民爱戴的忠诚卫士
195

宋鱼水 一身正气的“阳光”法官
203

陈 薇 为国铸盾的“人民英雄”
225

梁建英 让世界领略中国“智”造
233

刘 洋 “被祖国需要很幸福”
238

文花枝 生死关头唱响生命的强音
243

黄文秀 青春之花，绽放在扶贫路上
247



1921—1949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里，她们曾以鲜血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她们虽为女儿身，却巾帼不让须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突出贡献。



向警予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中国妇女运动先驱

为花季少女解开裹脚布，为广大妇女争取参政权，为底层娼妓寻求独立人格，谁说我辈不女权？

——向警予

溆水河畔，松柏青翠，夕阳的余晖洒落在向警予故居的白墙青瓦上，宁静，肃穆。与之相邻的向警予铜像纪念碑广场，每天来此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一代妇女领袖向警予的革命英雄事迹，在湖南怀化溆浦县大地上，远播四方。

向警予（1895—1928），原名向俊贤，女，湖南溆浦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向警予 1895 年 9 月出生于溆浦县城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1912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两年后转入周南女校，并将名字改为向警予，表示对封建势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向警予在这里认识了蔡畅，并通过她结识了蔡和森和毛泽东。

1916 年夏，向警予从周南女校毕业，回溆浦创办男女兼收的新型学校——溆浦女校，以“自治心，公共心”为校训，重视新思想的传播，尊重学生个性，反对“驰骤之若牛马”的奴化教育。

1919 年秋，向警予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同年 10 月与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成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12 月，向警予和蔡和森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她发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实践，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坚定地支持蔡和森的建党主张，积极参与建党工作。

共同的理想信念使向警予和蔡和森产生了爱情，1920 年他们在法国蒙达尼举行了婚礼。

1922 年年初，向警予回国后正式办理了入党手续，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在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5 年 5 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主任，并增选为第四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

五卅惨案发生后，向警予领导上海妇女界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斗争。

1925 年 10 月，向警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7 年回国后，在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和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大革命失败

后，党的大部分领导同志先后转移，向警予主动要求留在武汉，坚持地下斗争。有的同志考虑到她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太危险，劝她离开武汉到上海去。向警予说：武汉三镇是我党的重要据点，许多负责重要任务的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了，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绝不能离开！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不幸被捕。敌人对她实施了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严守共产党员的操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崇高品格。

国民党新军阀决定在5月1日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里杀害她。向警予视死如归，在走向刑场的路上，沿途向广大群众进行演讲。敌人对此极端恐惧，宪兵们殴打她，想使她不再说话，但她仍然坚持讲下去。残酷的刽子手向她嘴里塞进石头，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街上许多人看了都哭泣起来。向警予被押赴刑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时年33岁。

蔡和森闻讯后写下《向警予同志传》表达浓浓的怀念之情。他在文中写道：“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1939年，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向警予的一生。他说：“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向警予创办的淑浦女校，也更名为警予学校，她当年亲自编写的校歌，在一代又一代师生中传唱。

（柳王敏，《人民日报》2018年5月25日）

人物小传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年出生在湖南省溆浦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中国妇女运动先驱，被誉为“模范妇女领袖”，毛泽东称赞她为妇女解放、为劳苦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她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向警予6岁进入私塾学习。1916年从周南女校毕业，怀着“妇女解放”和“教育救国”的抱负，在家乡创办了溆浦县立女校并担任校长。

1919年五四运动中，向警予带领学校师生上街游行，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说，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在各个商店向市民宣传抵制日货。

1919年秋，向警予参加由毛泽东等人创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同年10月和蔡畅等发起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1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初，向警予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并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成为党的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人。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向警予积极组织和领导上海妇女参加斗争。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动反革命政变，向警予置生死于不顾，主动要求继续留在武汉开展工作。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同年5月1日，向警予被押赴余记里空坪刑场，就义时，年仅33岁。



戎冠秀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子弟兵的母亲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这是我们一个责任，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

——戎冠秀

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敌后晋察冀根据地，严酷的斗争中曾涌现不少英模人物。其中“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是我认识较久、接触较多，也是受教育最深的一位。

戎冠秀同志是一位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是抗日战争期间家乡“妇救会”的老会长。在敌后根据地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她作为拥军

模范出席了1944年晋察冀边区群英会，被授予“子弟兵的母亲”荣誉称号，又作为劳动模范出席了1945年的群英会。新中国成立后，她的儿子李兰金担任连长，牺牲于朝鲜战场，她又作为军烈属代表出席了全国军烈属会议。由于她高尚的人格和在群众中的威望，从1954年开始，她连续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1944年边区群英会上，我有幸亲耳聆听了她的发言。为了宣传她的事迹，我所在的军区抗敌剧社指定我编写话剧《戎冠秀》，指定胡朋扮演戎冠秀。为了反映好这一真人真事，我们二人曾陪伴戎冠秀大娘由群英会会址河北阜平县史家寨返回她的家乡平山县下盘松村，并在她家住了段时间，以便进一步了解她的身世和拥军事迹的细节。

戎冠秀原是平山县胡塔沟村人，生于1896年9月29日，小名柔妮。1910年，她14岁时嫁给沙坪村李家为媳。公公是个有名的赌鬼和酒鬼，不久家业就败落下来。据戎冠秀回忆说，她的公公婆婆跟他们兄弟妯娌分家的时候，她和丈夫李有只分到八斗粮食、一只马勺和两个碗。从那以后他们便靠租种地主家的土地为生。1926年，戎冠秀31岁时移住到下盘松村，在韩姓地主家的荒山沟里开了几亩坡地。言明打下的粮食连同副产瓜菜秸草，要对半劈给东家；春起从东家借的一石粮食，秋后要还一石五斗。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就这样全家吃糠咽菜勉强维持生活。1937年秋后，地主突然收回他们耕种了十年的土地，逼得他们只好离开下盘松再到别处谋生。那是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全面抗战已经爆发，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溃兵沿途抢掠，人心惶惶不安，戎冠秀一家竟不知何去何从。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迎着敌人赶上来的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个大胜仗，来到了她的家乡，从此这个老山沟成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减租减息政策使他们的生活稳定下来。

在这以前，戎冠秀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好心肠的农村妇女，她为全家的衣食操劳，把侍奉公婆、侍奉丈夫、照料孩子作为生活的全部。共产党八路军来了，成立起农会、工会、妇救会、“青抗先”、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时常开会讨论国家大事，讲抗日道理。从这以后，她好像变了一个人，除了关心丈夫和孩子，还关心着村里的事情和来来往往的八路军同志们，把做军衣、做军鞋、交公粮、出公差勤务、照料伤员看得比自己家的事情还重。由于为人正直善良，她被妇女们推举为妇救会会长，而且连选连任了多年。远远近近，一提起她这位“老会长”，几乎无人不知。她的丈夫李有担任着村农会主任，夫妻二人是下盘松最早的共产党员。

1943年秋冬，持续三个月的反“扫荡”对“老会长”戎冠秀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她要带领群众抢收地里的庄稼，要搞好公家物资粮食的坚壁清野，有情况的时候还要负责照顾妇女老幼往大山里转移。那时乡亲们十天半月露宿山野，更要照料好那些老人孩子和有病的妇女。有时白天忙碌一天，夜里还要赶着给部队碾米磨面。遇有伤员抬来，就把主要精力用来照料伤员。由于她平日的拥军行动和在这年反“扫荡”当中抢救了我军一位生命垂危的重伤员，在敌人搜山时掩护了我军一位掉队的伤病员等动人事迹，她被选为拥军模范，出席了1944年春节过后召开的晋察冀北岳区群英会。我就是在这个会场上第一次见到她的。只见她梳着发髻，穿着破旧的棉袄，立在台上对大家娓娓而谈，讲完后走下台，在热烈的掌声中被台下的军队英模们团团围住，搀扶着回到座位。会后，她和战斗英雄邓世军、民兵英雄李勇等众多英模人物一起受到了军区领导人的接见，并荣获了“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

那次群英会，也是一次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动员会。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她一回到家乡，立刻和丈夫李有，儿子李聚金、李存金等开了家庭

会议，制订了当年的生产计划，并向全村公布，由此带动起全村的生产热潮。这年年底，戎冠秀又以劳动模范的身份出席了边区第二届群英会。这届群英会从1944年年底开到1945年年初，她是冀晋、冀察、冀中各地区选出的90位典型人物之一。这年2月，《晋察冀日报》曾发表文章《平山劳动英雄戎冠秀》，专门介绍了她的新事迹。在那次会上，我们作为为会议演出的文艺工作者，又一次同她见了面。

1945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我们剧社随军区机关进驻张家口，次年在张家口人民剧院演出了话剧《戎冠秀》。可惜与戎冠秀相距遥远，未能请她到现场看。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在动荡的野战环境中，更没有机会见到她。我和胡朋作为夫妻同戎冠秀大娘再次见面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作为英模人物，多次来北京开会，而我又在北京工作，只要有可能，总要到招待所去看望她。1954年9月，全国第一届人代会期间，已经58岁的她白发明显增多了。她在讲述家乡变化时告诉我，抗战胜利那年，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她送自己的小儿子李兰金参了军。李兰金遵照母亲的嘱托，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多次立功，1951年作为炮兵连长，壮烈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也许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年，她讲得十分平静。当时我刚刚写完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戏剧，思绪还一直沉浸在志愿军的战斗生活中间。我想到十年前在戎冠秀家中见到的那个活泼的少年，想到在朝鲜战场上我所熟悉的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战友。戎冠秀同志看出了我的沉重心情，立刻把话题转到家乡的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上来。

每次见到戎冠秀同志，我都会为她那永不停息的脚步所感动。当时她已经是花甲之年，仍带头参加农业劳动，带头响应党的各项号召，除关心妇幼保健事业，也关心上山植树造林和民兵建设。有时外出开会，十天半月不在家，她特别警惕，生怕自己脱离了群众，回到村里总要下

地劳动，完成队里的劳动力指标。她的女儿李荣华同志是国家干部，住在大城市，多次提出要把母亲接出去享几年清福，她一直没有同意。她不愿离开本村的乡亲们，不愿离开自己的岗位，她说：“那样做，我就脱离群众了。”她的正直无私的品质、联系群众的作风，受到了乡亲们特别是妇女群众的爱戴。

戎冠秀这位革命母亲的崇高形象，将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

（胡可，《人民日报》2015年9月2日）

人物小传

戎冠秀是享誉全国的拥军模范，被誉为“子弟兵母亲”。她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896年，戎冠秀出生在河北省平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山县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戎冠秀加入妇救会，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向妇女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和妇女解放道理。1938年，戎冠秀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推选为下盘松村妇救会主任，担任八路军伤病员转运站站长。她带领妇女拥军支前，为八路军筹集粮草，做军鞋、军衣。1941年至1943年间，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连续发动多次大“扫荡”，戎冠秀整日为抗日工作奔忙，带领全村妇女给战士们送水、送饭，转运伤员。她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像母亲一样护理伤员，在她的精心救护下，很多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八路军指战员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她动员群众参军，并带头为儿子报名参军，她说：“我有三个儿子，都报上名，愿意上哪就上哪去！要是不嫌弃我老伴老，让他给咱八路军喂马。”在她的带动下，下盘松一带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

争相上战场的热潮，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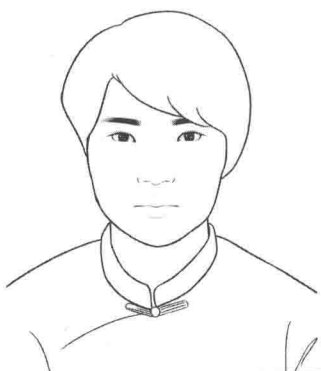
1944年2月，戎冠秀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被授予“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在荣誉面前，戎冠秀不骄不躁，把奖给她的骡子和农具全部贡献出来，带领群众掀起了支援前线的大生产运动，同年被晋察冀边区评为劳动模范。

1949年9月，戎冠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作为华北区的人民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51年，她的一个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她的三个孙子，长大后，她一个一个送到部队去当兵。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她一直在村里当干部，挤时间做群众工作，常常是端起个大碗，出这家，进那家，饭吃完了，工作就安排好了。1950年9月，戎冠秀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后又多次出席全国劳动模范会议和拥军优属表彰会议。先后当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三、第四届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委员，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她还多次给守卫边疆的部队写信、送锦旗，鼓励他们保卫好祖国的大门。

1989年8月12日，戎冠秀因病逝世，享年93岁。戎冠秀作为子弟兵的好母亲，已经成为拥军爱民的一面旗帜。打动我们心灵的不仅仅是战争年代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更是全家几代人前赴后继、用心血浇灌培育的光荣传统。

戎冠秀的三个儿子都是爱国拥军的好党员，她的孙辈有多人穿上军装，传承着这个家庭的优良家风。



杨开慧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牺牲我小，成功我大”

我的生命早不计较，不成功便成仁。

——杨开慧

杨开慧 1901 年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昌济是近现代伦理学家、教育家，先后于长沙师范学校、北京大学任教。青少年时代的杨开慧本来可以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她见国衰民困，因而毅然投身于救国救民之路，1920 年与志同道合的毛泽东在长沙结婚，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史上第二位

入党的女性，1930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9岁。

向往秋收起义却身不由己。1927年秋的一天晚上，在板仓老家，杨开慧醒来时发现丈夫毛泽东不见了。她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即刻起身寻找丈夫，在客厅看见了毛泽东留给她的一封信及几块银元。她旋即从房里追出来呼唤即将踏上领导秋收起义征程的毛泽东。还好走出不远，她追上了丈夫。杨开慧怕丈夫在外忍饥挨饿，趁毛泽东不注意，将那几块银元又偷偷地塞进毛泽东的口袋里。毛泽东说，等我安顿好了，再来接你与孩子。杨开慧深情地望着毛泽东说：“我等你回来……”然而这一别，毛泽东与杨开慧都不曾想到竟是永别——自从毛泽东踏上秋收起义的征途后，便再没有机会回家看一眼深爱自己的杨开慧及孩子们。

杨开慧原本的愿望是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但她此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便不得不到她娘家长沙附近的板仓隐蔽起来，从此她与毛泽东天各一方。长沙的反动力量极其强大，而板仓由于离长沙太近，因此杨开慧的处境十分危险。敌人早已知道她是秋收起义领导人毛泽东的妻子，多次去她老家板仓搜捕。她只好乔装打扮，带着三个孩子并让孩子们自称姓杨，在几个亲戚家来回转移。

湘女本柔情，因信仰而刚强。有一次，杨开慧乔装潜入长沙城，然而眼前的一幕让她震惊不已——敌人抓住了女红军战士、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并将她放在长沙司门口梟首示众，其状甚惨。为了革命事业，她自己头可抛、血可洒，但一想到才8岁的毛岸英、7岁的毛岸青、3岁的毛岸龙以及她慈祥的母亲，那颗柔软的充满慈爱的母性之心便在滴血。她思前想后，决定将三个孩子托付给她十分信任的堂弟杨开明，并给他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托孤信”：“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来看，一个女共产党员的浓浓亲情，以

及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的鲜活形象跃然而出。

在带着孩子躲避敌人搜捕的日子里，她怀着对毛泽东的无尽思念。她写道：“天哪，我总不放心他”“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儿，谁都拿不开”。从这些情感真挚的文字中，展现出杨开慧湘女多情的一面，以及她对毛泽东忠贞不渝的爱情，感人至深。

在险境中与敌周旋。1930年8月，来自中央苏区的红军围攻长沙，但长沙城城墙坚固，更兼湖南军阀何键集结重兵把守，红军失利后撤。红军退却后，卷土重来的何键，在长沙设立“清乡”司令部并自任司令，不仅调用手下大部分力量搜捕共产党人，而且还将长沙一带的地痞流氓组成“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用于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抓住杨开慧，何键给出了很高的赏银：谁抓到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赏1000大洋。何键这一狠招果然奏效，那些贪图钱财的“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队员搜捕杨开慧到了几近疯狂的程度，甚至不分白天黑夜反复下乡搜查。有的地痞为了得到赏银也频繁打听，试图探听到杨开慧的下落。情况已经万分危急，杨开慧凭着机智，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几次变更住所躲过了数次险境。有个乔装成卖陶罐的商人的密探还是发现了杨开慧的行踪。1930年10月24日晚上，他带领60多个“清乡队”队员，冲进板仓杨开慧的秘密居所，杨开慧和8岁的毛岸英被抓捕，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署。

铁一般信仰拒诱降。何键原本是打算将杨开慧像伍若兰那样，立即斩首悬头于长沙城门，但一位叛徒向何键献计说不如劝降杨开慧，若劝降成功则可引来更多的共产党人效法。何键觉得有理，便诱降杨开慧，审讯官对杨开慧说，只要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便可立即释放她。然而杨开慧在敌人的威逼和利诱面前，却始终不为所动，大义凛然：“死

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据当年一起被关押的难友杨经武回忆，每次敌人提审杨开慧，她都镇静而严肃。湖南《晚晚报》记者采访杨开慧，对她说：“你为何要做共产党？你犯了法晓得吗？”杨开慧回怼道：“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采访记者劝降她说，只要她悔过自新可马上得到自由，然而杨开慧决然回道：“我誓不屈服”“我的生命早不计较，不成功便成仁”。表现出湖湘女杰坚贞不屈、将信仰和气节看成自己的灵魂与生命的崇高精神。

何键见反复劝降杨开慧而不得，遂动了杀心，决定将其“枪决、暴尸三日”。1930年11月14日，敌人将杨开慧押向长沙城北再到城南，走过长街，震慑示众，然而杨开慧始终镇静坦然，毫无惧色。她镇定自若地走向浏阳门外识字岭，径直地向一处较高的坟茔走去，用沉默以示对敌人的无比愤慨，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无比坚定，展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罪恶的枪声响后，那片荒草地上被一大片血迹染红了……

杨开慧牺牲后，板仓的乡亲们用一副薄皮棺材悄悄地将其收殓，将英烈的忠骨掩埋于棉花山上，后来立了一块墓碑。在亲友的努力下毛岸英被保释出狱，与毛岸青、毛岸龙由舅母李崇德护送转移至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毛泽东惊悉杨开慧之噩耗，悲愤至极。

杨开慧从被捕至牺牲的20多天，始终忠贞不渝，坚守气节，乃至慷慨就义，展现出共产党员的芬芳气节和湖湘巾帼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宁死不屈的浩然之气。

（王家宏，《人民日报》2021年5月14日）

人物小传

杨开慧，190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板仓（今开慧镇开慧村）。父亲杨昌济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学者、教育家。1913年，杨昌济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杨开慧随父亲迁往长沙，并在这里认识了毛泽东。

1918年，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举家北迁。这年9月间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在这期间，毛泽东和杨开慧有了更多接触并开始相爱。

1920年冬，杨开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南第一批团员之一。就在这时，她和毛泽东在长沙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结为革命伴侣。

1921年，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毛泽东在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任区委书记，杨开慧负责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身兼秘书、机要、文印、联络、总务等多个职务，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1923年4月，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杨开慧带着毛岸英和毛岸青也来到上海，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

1925年2月，杨开慧随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协助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并担任教员。同年12月，杨开慧离开韶山转往广州，协助毛泽东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文稿，负责联络工作。

1927年初，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杨开慧把大量的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工整地抄写下来。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按照党的八七会议指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杨开慧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回到长沙板仓开展地下斗争。

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敌人逼问毛泽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坚定地说：“牺牲我小，成功我大”“要

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



陈铁军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富家小姐舍弃安逸投身革命

现在，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陈铁军

春日午后，阳光正好。走进位于禅城区的岭南天地，穿过几条老巷子和一片镬耳屋，一栋占地约280平方米的清代二进院落的民居建筑跃入眼帘。步入其中，一座傲然挺立的半身塑像矗立在小楼正

中，门楣边上的“陈铁军故居”几个大字熠熠生辉。

这里正是佛山爱国革命烈士陈铁军出生和少年生活的地方。如今，穿过历史的尘埃，从这栋小楼，仿佛依稀可见陈铁军用生命捍卫信仰、以热血写就初心那段壮烈而峥嵘的革命历史。

近日，记者走进陈铁军故居，追寻陈铁军留下的红色印记，重温光辉历程，铭记英雄事迹。

富家小姐舍弃安逸投身革命

“这里基本保存了陈铁军生前居住的风貌。”长期研究陈铁军生平故事的禅城区博物馆馆藏研究部主任韩健说，陈铁军的哥哥和侄女陈惠文此前一直在此居住，直到2007年东华里片区启动拆迁改造才搬走。

在他的叙述中，陈铁军为追求革命理想、铁定心肠干革命的形象越发清晰。

从小衣食无忧的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04年出生在佛山一个华侨富商家庭。童年时代的陈铁军便主动要求父亲送她进私塾，像男孩子一样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浪潮席卷全国，各地青年纷纷响应。当时，一支由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组织的宣传队来到佛山，女青年大声疾呼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提倡民主和科学。少女陈铁军看着清一色的女青年大声呐喊，深受启发，毅然投入宣传中，最后冲破家庭阻力，转学进入由郭鉴冰在佛山创办的第一间新学制的女子小学——季华女子小学（今铁军小学）就读。

1922年，陈铁军考入广州坤维女子中学，她的语文老师正是被后人称为佛山“三谭”之一的共产党人谭天度。也就在这个时期，工农革命

运动热情高涨，马列主义广泛传播，革命思潮风起云涌，陈铁军结识了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蔡畅、邓颖超，并与党组织建立了紧密联系。

1924年秋，陈铁军考入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求学期间，因目睹残忍至极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开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勾结，在学校里嚣张跋扈，陈铁军把自己的名字“陈燮君”改成“陈铁军”，表示与旧我决裂，坚定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陈铁军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回到了佛山老家。陈铁军的哥哥也是位富商，见此情形十分担心，劝她说：“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搞革命一旦被捉，就没命了！你要读书，我供你去香港或出洋留学都可以，你要为自己的前途、幸福着想呀！”

陈铁军清楚哥哥的苦心，却没有被亲情融化革命的意志。哥哥万般无奈而又心急，让比陈铁军小四岁的二妹陈铁儿去劝她。没想到，二妹不但没有劝陈铁军回头，自己反而在陈铁军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姐妹俩在革命的洪流中意志更加坚定。

1927年，邓颖超因病留在广州住院。就在此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搜捕共产党人。4月15日，大批军警将陈铁军所在的中山大学包围起来，陈铁军立即想到住院的邓颖超可能有危险。她立即乔装翻出学校院墙，躲过盘查的军警，赶到医院通知邓颖超撤离。第二天，敌人就对医院进行了搜查。

1927年，受党组织指示，陈铁军与共产党员周文雍假扮夫妻参与准备广州起义，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

由于叛徒告密，两人同时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高官利诱，他们毫不屈服。最终，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判处他们死刑。两人被解往刑场前，要求在监狱铁窗下合影，并宣布结婚，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后人缅怀弘扬铁军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对陈铁军的英勇事迹一直未曾忘怀，周恩来总理还亲自指示文艺工作者宣传周文雍、陈铁军的精神和事迹。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周文雍和陈铁军为原型，把这段饱含革命豪情且富有爱情色彩的故事搬上了大荧幕，制作成名为《刑场上的婚礼》的影片。电影一经推出，便在全国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

2009年9月，周文雍和陈铁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为了缅怀陈铁军烈士，弘扬铁军精神，1991年，佛山市政府把陈铁军曾经就读的小学改名为佛山市铁军小学，并在江湾立交桥畔修建了铁军公园，在公园正中心摆放了陈铁军的全身塑像。

1998年，市政府把陈铁军出生和少年生活的地方——陈铁军故居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禅城东华里改造时，禅城区政府对陈铁军故居进行全面修缮。禅城区博物馆对陈铁军生平进行了考证，通过合理利用展厅空间和使用声、光、电等技术生动形象地呈现陈铁军烈士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英雄形象。2014年6月，陈铁军故居作为烈士事迹展厅免费向公众开放。

2016年8月，位于铁军公园西北角的陈铁军纪念馆建成开馆，向社会各界免费开放。从开放之日起，就有志愿服务者长期驻扎在此，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提供讲解咨询服务。如今，每逢清明节、烈士纪念日，佛山各界人士都会到此凭吊、缅怀先烈。

（郑奕纯，《佛山日报》2021年3月17日）

人物小传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04年3月生于广东佛山。1992年春，陈铁军积极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同学们一起组织“读书会”和“时事研究社”。她一边念书，一边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州群众革命运动。她自觉地到工人当中接受锻炼，到手车夫工会劳工子弟学校教书，到罢工的工人家庭中去工作，和她们一起打草鞋、缝衣服，支援北伐大军，等等。

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宣传工作。同年考入广东大学（现中山大学）。1926年4月，陈铁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担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1927年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在邓颖超的领导下，主持开办了两期“妇女干部培训班”，为党培养了一批妇女工作骨干。

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10月，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她装扮成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周文雍的妻子，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陈铁军奉命转移到香港。1928年1月，广东省委派她重回广州，协助周文雍重建党的秘密机关，并酝酿在春节期间发动工人暴动。

1928年1月27日被叛徒出卖，与周文雍同时被捕。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判处他们死刑。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深深埋藏在心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之于众。

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两位气吞山河的年轻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枪口，把刑场作为结婚的礼堂，把反动派的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从容不迫地举行了婚礼，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赵
一
曼

誓志为人不为家

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就是反满抗日。

——赵一曼

初夏时节，四川宜宾市翠屏山苍松翠柏，绿意盎然。在位于山腰的赵一曼纪念馆广场上，矗立着这位女英雄的雕塑，她目光坚毅，英姿飒爽。

“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在赵一曼当年所作《滨江述怀》的诗中，尽显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80多年前，这位巾帼英雄在东北林海雪原中英勇抗击日寇，令敌人闻风丧胆。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出生在四川宜宾。五四运动爆发后，她在大姐夫——共产党员郑佑之的鼓励和引导下，阅读进步书刊，接受新文化思想。

学生时代的赵一曼，以其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成为学生领袖，带领学生积极开展各项革命运动。1926年夏，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她考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次年，参加了由叶挺指挥的北伐军讨伐反动军阀的战斗。

1927年9月，赵一曼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1928年，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她接到组织通知回国从事革命斗争。

“在苏联学习期间，赵一曼结识了人生伴侣陈达邦。接到回国通知时，正怀有身孕。”赵一曼纪念馆馆长陈怀忠介绍，强烈的报国之心让赵一曼毅然选择了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临行前，她到照相馆抱着年幼的“宁儿”，留下了与儿子的唯一合影。

在东北，赵一曼先在沈阳、哈尔滨领导群众地下抗日，后在珠河等地带领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她能文能武，机智过人，曾参与领导了震惊日伪统治集团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极大鼓舞了东北人民反“满”抗日的热忱。

1935年秋，赵一曼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师2团政治委员。在一次与日伪军的战斗中，她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不幸被俘。

日军对赵一曼施以酷刑，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她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为了得到口供，日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在医院里，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争取看护和看守人员。1936年6月28日，赵一曼在医院看护和看守的帮助下逃出医院，但很快被迫敌再度抓捕，受到更加残酷的刑讯。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日寇杀害，牺牲时年仅31岁。临刑前，她给幼子写下一封遗书：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封遗书后来经“宁儿”陈掖贤重新誊写，留给他的女儿陈红。“不管走到哪里，我都随身带着这封遗书。”陈红说，“父亲告诉我，要将奶奶在信中传达的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作为家风，永远地传承下去。”

2009年，赵一曼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赵一曼的英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等文艺作品，广为传播。今年，其家乡宜宾启动了“百校同演同看话剧《赵一曼》”活动，让“一曼精神”薪火相传。

（杨三军、康锦谦，《光明日报》2021年5月19日）

人物小传

赵一曼是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白杨嘴村（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一曼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五四运动爆发后，赵一曼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接受革命新思想。1923年冬，赵一曼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9月，赵一曼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奉命回国，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赵一曼与湖南人陈达邦结婚，婚后产下一子，取名“宁儿”，她把孩子寄养在陈达邦大哥陈岳云的家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1934年春，赵一曼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特派员和妇委会负责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自卫队，配合抗日部队作战。

1935年，赵一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率部活动于抗日游击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被俘，被押至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

1936年8月2日，日军将她绑在大车上游街示众，赵一曼慷慨就义，年仅31岁。



李
贞

『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获得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

坚贞一生的开国女将军

战争年代十分艰苦，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不能贪图享受，丢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李贞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李贞是唯一一位被授予将军衔的女性。

5月中旬，记者来到浏阳市永和镇和沿溪镇，寻访共和国唯一的开国女将军李贞的革命足迹。

6 岁当童养媳，18 岁闹革命

顺着满目青翠的公路进入永和镇，很快来到李家大屋。91 年前，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这里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而那时及其前后，年轻的李贞参加了附近沿溪镇境内“双洞苏区”红军游击队，她还是当地苏维埃政府干部。

永和，是李贞出生长大的地方。在这里，她挣脱旧式婚姻的束缚，从浏东游击队到红军、八路军、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浏阳到井冈山最后到北京，这个在旧社会饱受欺压的“童养媳”，拿起枪杆子闹革命，一路写下不朽传奇。

“因为家境贫寒，父亲又早逝，为了维持生计，她才 6 岁就被送去给人当童养媳。”在位于永和镇仁成村的李贞生平事迹陈列馆，讲解员刘琼的介绍从李贞不幸的童年开始。

李贞性格顽强，18 岁时毅然出走，投身革命。

1927 年，19 岁的李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加入党组织后，她参加的第一次大的革命活动，就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李贞后来并没有跟随秋收起义的部队去井冈山，而是留下来加入了浏东游击队，活跃在湘赣边界。”刘琼说，李贞足智多谋，经常带领游击队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打击敌人。

1927 年秋，在浏东游击队只有 3 支短枪的情况下，李贞在洋油桶里放鞭炮假冒机关枪的声音，成功吓退敌人，攻下观音堂团防局，为游击队打赢第一仗。

李贞还假扮新娘子奇袭团防局。1928 年秋的一天，浏阳张家坊来了

一个娶亲队伍。走到团防局的时候，这一队人突然取出枪支冲进去，跟里面的人交上了火，花轿里的新娘子随后也抄枪冲了进去，这个“新娘子”就是李贞，她带着游击队端掉了张家坊团防局。

英勇跳崖生还，两度失去孩子

更传奇的是，李贞还曾有过一次跳崖壮举。

1928年9月18日，浏东游击队与当地国民党部队发生一场激战，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李贞等5名剩下的游击队员边打边退，最后退到祖师岩悬崖峭壁上，再也无路可退。

当时身为士兵委员会委员长的李贞发出命令：“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崖下跳！”说完，李贞纵身跳崖。幸运的是，她落在了一棵树上，树枝的托挡让她幸免于难。

站在李贞当年跳崖的位置往下看，耳畔冷风飕飕，眼前团团白雾飘来，记者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一同爬山上来的浏阳市中共党史智库专家、“双洞”苏区资深研究者张立雄介绍，这里是连云山脉腹地，地属浏阳市沿溪镇，史称“双洞苏区”。它是浏阳最早的红色武装割据地，也是湘鄂赣边最早的由工农兵代表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政权所在地。当年，李贞就是在“双洞”苏区打游击，并跟随张启龙、黄公略一道参与红五军第二纵队的改编成立，以及一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并在双洞苏维埃政府中担任妇女部长。

当时，李贞已有4个月的身孕，自己虽幸免于难，孩子却没能保住。之后，李贞参加了红军两次攻打长沙，以及湘赣苏区、中央苏区多次反围剿战争并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李贞第二个孩子早产，由于缺乏营养，14天后她第二次失去孩子，从此再也无法生育。

将军百战归来，身后不留一物

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李贞又和丈夫甘泗淇一起奔赴抗美援朝战场，李贞当时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

1955年9月27日，下午2时30分，中南海国务院礼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典礼在此举行。此次授衔，李贞、甘泗淇夫妻同时被授予将军军衔。47岁的李贞，是其中唯一一位女将军。

周恩来总理亲手把少将军衔命令状授予李贞，并握住她的手说：“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当日下午5时，又举行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暨授勋典礼。李贞获得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的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李贞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3月，李贞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

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李贞将军的遗物屈指可数：有4枚勋章、4把藤椅、两只用尼龙绳牵连着的皮箱，还有1.1万元、2500元国库券，战争年代留下的两根小金条。

勋章是战争年代用鲜血换得的，藤椅是35年前从湖南搬家时带来的，皮箱是赴朝鲜作战时用的行军箱。

在遗嘱中，李贞这样安排她的遗物：一根金条捐给自己的家乡浏阳，另一根捐给丈夫甘泗淇的家乡宁乡，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党费上交组织，一部分捐献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

身后不留一物，李贞的遗嘱令人既感动又钦佩。

（王文隆，《湖南日报》2021年6月4日）

人物小传

李贞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女战士，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1908年，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6岁当童养媳。1926年10月，李贞被选为乡妇女协会委员长。1927年，李贞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李贞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大革命失败后，李贞积极寻找党组织，在浏东特委和王首道、张启龙同志领导下，她任当地党支部书记，秘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1927年9月，她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并组织了浏东游击队。土地革命时期，她先后担任浏阳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兼赤卫军政委、平江县委军事部长兼妇委书记、湘赣省委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湘赣军区医务学校政委、湘赣军区妇女团政委等职务，参加了攻打长沙等多次战斗。

1933年，李贞到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高级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先后担任吉安县委军事部长兼赤卫军政委、湘赣军区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和湘鄂川黔军区组织部长，把学到的革命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积极参加湘赣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设和反“围剿”斗争。长征时期，李贞随红六军团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顺利到达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李贞奔赴抗日前线，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解放战争时期，李贞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在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为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作出重要贡献。抗美援朝期间，她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和平年代，李贞、甘泗淇夫妇

先后抚养了 20 多个烈士遗孤、亲属子女及边远地区战友的孩子，有近 20 人考入了大专院校，成为国家优秀的专业人才，其中，不少人还在军队或地方单位担任了领导职务。

1955 年，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江竹筠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入党之初就决定 把一切献给党

要革命还怕什么，革命本身就不是什么安乐与享受，我决定入党，就是决定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事业，甚至宝贵的生命。

——江竹筠

“最普通的人就是最秘密的人”

1939年夏天，正在重庆中国公学就读高中的江竹筠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

段。入党前，介绍人戴克宇曾问她：“入党后会遇到各种艰难困苦，也可能牺牲！你是否再三考虑过这些问题？”江竹筠回答说：“要革命还怕什么，革命本身就不是什么安乐与享受，我决定入党，就是决定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甚至宝贵的生命。”

江竹筠原以为加入共产党后，可以风风火火地投入抗日宣传、发动群众等学校的各项社会进步活动中去。然而，组织却交给她一项意想不到的任务：隐蔽。隐蔽意味着生活的平常无奇，却考验着人的意志与自律。当其他进步同学激情澎湃地发表时局演讲、评论时，她只是一个人在角落里静静地听，不轻易发表看法；在同学们开展歌咏会、话剧表演等活动时，原来酷爱唱歌的江竹筠却不得不克制自己。这一时期严格的自律、“隐蔽”的锻炼，对她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有着重要影响。

1940年秋，江竹筠转移到中华职校学习会计专业，担任该校及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恰巧她的同学兼挚友何理立也考入该校，但失去了组织联系。何理立一度很苦恼，见到江竹筠后非常高兴，希望她能帮助自己恢复党组织关系。虽然江竹筠对这位挚友非常了解和信任，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组织纪律，只与其保持工作关系，对组织关系一直避而不谈。

作为党组织的负责人，江竹筠团结进步学生，秘密开展党的工作，扎根于群众当中，隐蔽于群众之中。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严密封锁消息，阻止《新华日报》发行，捏造所谓“异党暴乱”等来欺骗群众。为揭露国民党的丑恶罪行，党组织将一批印有八路军和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人声明的传单交由江竹筠散发。当时中华职校的三青团分子活动猖獗，形势恐怖。为了完成这次任务，她约上何理立，白天察看地形，晚上行动，把传单放在教室办公室的走廊上，并用小石头压好。第二天，许多老师和同学们都发现了传单，明白了事情的

真相，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开始同情中国共产党。

凭借沉稳谨慎的工作方式，江竹筠不仅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的各项秘密任务，而且始终未暴露党的组织和同志。上级决定交付江竹筠更为重要和机密的任务。后来，江竹筠被任命为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以宋庆龄、邓颖超领导的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办事员的社会职业作为掩护，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从学校走向社会，江竹筠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工作环境和更为危险的工作方式。为帮助她尽快适应新的工作方式，川东特委宋林同志传授了许多地下工作的经验：言谈举止要符合自己的社会身份，两人开始接头就要约定公开的社会关系是什么，被捕了就要准备牺牲自己、保护组织等。

“最普通的人就是最秘密的人”，老宋的这句话让她印象特别深刻，并身体力行。每天早上，她从观音岩临华街的家中步行去曾家岩上班，途中要经过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务机关总部，随时会遇到特务暗探的跟踪盘问，下班后还要安排时间到沙坪坝一带去联系同志，几乎整天都处于高度紧张的战斗之中。她把宋林同志对敌斗争的宝贵经验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向同志们传达上级文件和指示时，她总是先将文件或口头意见记熟才出发，不随身携带任何可能会暴露身份的证据；她始终注意言谈举止要符合自己的社会身份，每次去学校联系时，着一身简单的学生服，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个普通的小姑娘竟是共产党员。江竹筠在斗争中成长、在战斗中历练，逐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从假夫妻到真伴侣

1943年5月，党组织交给江竹筠一项特殊任务，让她与彭咏梧假扮

夫妻，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彭咏梧原名彭庆邦，四川云阳人，1938年加入共产党，先后任万县中心县委巡视员、云阳县委书记，1941年8月调往重庆，担任市委第一委员，领导重庆市地下党工作。他以国民党中央信托局中级职员的社会身份作为掩护，由于没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场所和可靠的助手，工作开展很不方便。党组织决定让江竹筠以“妻子”名义协助彭咏梧工作。

他们把“新家”安在重庆市机房街，这里成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彭咏梧负责联系几十名党员，白天还要正常上班，工作十分繁忙。领受、传达上级指示精神，联系党员、布置任务等许多具体通信联络工作就由江竹筠来做。彭咏梧是信托局的中级职员，家里还经常来一些信托局或金融界的同事朋友，这时江竹筠还要努力扮演与这一身份相符的“彭太太”。从一个穷学生到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太太”，江竹筠虽然时常感到不习惯，但她都努力去适应，不仅瞒过了邻居同事，甚至连她的母亲也没有发现这个女婿竟然是“假”的。

1944年春，江竹筠在一次外出工作中，引起了特务的跟踪注意。党组织为安全起见，立即把她转移到成都，两个月后，江竹筠考上了川大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在川大，她是学运中最隐蔽的幕后策划者，但她的组织关系依然留在重庆，常写信给彭咏梧报告学习情况。在重庆，缺少“太太”掩护的彭咏梧，工作起来出现了不少麻烦。他们在一起工作中相互关怀、相互敬重，也渐渐地产生了感情。鉴于这种情况，南方局和重庆市委批准彭咏梧与江竹筠正式结婚！1945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与彭咏梧结为伉俪，成为真正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一起历练的革命夫妻。此时，抗战即将胜利，但胜利后的喜悦很快被内战的阴霾所笼罩，他们将共同迎来更为严峻的考验。

走向学运斗争最前沿

山雨欲来风满楼。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一时间，重庆的斗争形势陡然严峻复杂。7月，党组织决定江竹筠停止川大的学习，回重庆开展地下斗争。此前南方局决定成立重庆地下市委，为配合前线的军事斗争，要求“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开辟第二条战线。江竹筠回到重庆后，协助彭咏梧奔走于各大、中学，联系团结进步学生，争取中间分子，使各校学生运动迅猛开展起来。

1947年2月，市委指派江竹筠直接领导重庆育才学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学院等学校党的地下工作。这时的江竹筠开始独当一面领导学运工作，勇敢地站到了残酷斗争的最前沿。

育才学校是一所新型学校，党的组织基础较好，建立了以廖意林为书记的党支部。廖意林是从延安派到重庆来的老党员，政治觉悟高，领导能力强。江竹筠与廖意林接上关系后，保持单线联系，传达上级指示，研究实施方案，一般不过问工作细节，让该校党支部和广大师生积极发挥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西南学院和女子师院两校进步学生多，但没有建立党的组织，许多工作处于自发状态，江竹筠决定以建立党的组织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3月初，江竹筠来到西南学院，找到了该校唯一的地下党员学生罗永晔。通过罗永晔在进步学生中发展了多名党员，建立学院地下党支部，学校的学运很快有组织地恢复起来，同时还派党员到附近学校开展工作，辐射带动周围学校。之后她把工作重心转到女子师院，与一位名叫赖松的女学生接头联系。赖松是根据南方局青委委派考入该校的进步女青年。经过多次接触考察，江竹筠发现赖松不仅工作能力强，而且沉稳机敏。

于是，江竹筠把她发展为党员，并结合自身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悉心指导赖松如何在学生中工作，教她如何保护学生领袖，既有效地发动学运又隐蔽自己。不久，女子师院成功建立党的支部。从此，女子师院的学运有了一个扎根并隐蔽于学生群众中极富战斗力的领导核心。

重庆是国民党西南统治的中心，特务组织最为严密，他们也加紧对学生的镇压活动。关键时刻，江竹筠频繁与女子师院支部联系，分析敌人的动向，要求她们从最坏的可能性着眼，做好隐蔽工作。1947年5月底6月初，国民党特务两次武装包围女子师院，抓走了13名同学。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党组织都没遭到破坏，没有党员被捕。随即她又积极组织力量营救被捕学生，号召成立科系联席会，宣布罢课，组织“六一”事件后援会，采用请愿、记者招待会等形式，争取社会力量共同声援。在舆论的压力下，被捕同学全部出狱。为把全市进步学生组织起来，彭咏梧、江竹筠等还在学生界中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重庆的学运工作走向新的高潮。

殚精竭虑为“挺进”

由于新华日报社被迫撤走，1947年7月，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创办机关报——《挺进报》，来传递党中央的声音，由彭咏梧直接领导。1947年秋，市委指派江竹筠来加强《挺进报》的领导工作。

作为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安全保密是江竹筠着重考虑的问题，她把报纸的供稿、出版、发行分离开来，避免相互间的横向联系，并把最危险的取送稿件和发行工作承担起来。

《挺进报》的稿件主要是通过收听电台并记录来自延安的广播。稿件取来后，她亲自校对、整理，抄写清楚后，在约定时间地点交给联络员

吴子见同志，吴子见再把稿件交给陈然、蒋一苇等同志印刷出版。这一工作充满危险，容不得半点儿闪失。一次她发现吴子见把稿件和资料放在屋角的一只衣箱里，很不放心，便动手帮他整理，反复地叮嘱：“要时刻警惕着，经常准备应付特务的突然袭击。”有一天，两人偶然在街上碰着，吴子见高兴地向她打招呼，准备和她商量事情，但江竹筠立即将脸转开，示意吴子见避免照面，不能在约定以外的场合见面。

在白色恐怖下，要使这张地下报纸突破各种关卡，安全及时发送到全市进步群众手中去，是一件十分重要也十分危险的工作。凭着长期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谨慎细致的工作作风，她有条不紊、稳当周密地安排发行工作。每次把报纸领回来，江竹筠就匿藏在家中天花板的顶棚上，晚上通宵达旦地分装，白天想方设法把报纸送出去。为了躲避国民党严格的邮检，她弄来一些印有国民党财政局和时事新报社两个单位名称的信封，专门用来邮寄《挺进报》。分发投寄时，她要求每次必须有两人同行，万一出了问题，另一人及时通报组织并遏制事态发展。她还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不要只投一个邮局的信箱、邮筒，要变换地方多投一些信箱、邮筒。后来，江竹筠又联系到了在邮局工作的进步学生，通过他们从邮局内部投寄，这就更加方便和安全了。此外，她还在育才学校等布置一些秘密转发站，通过进步学生直接发送报纸。

斗志昂扬下川东

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江竹筠不再负责《挺进报》和参与重庆市学生运动的联系和指导工作，组织上任命她做地下党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委的联络员。川东临委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正是她的丈夫彭咏梧同志，负责领导下川东一带的农村武装起义，以配合解放军南下的外

线作战。

能够公开与敌人在战场上进行较量，对于长期做地下工作的江竹筠来说，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但她也深知这一趟远行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向接替工作的同志详细交代后，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年仅1岁多的儿子。她和丈夫反复商量后，决定暂时托付给好友看养。离别前，江竹筠和丈夫上街买了一件美军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和一顶小军帽。为云儿穿好大衣、戴好帽子后，看着高兴的云儿，彭咏梧似有预感地说道，咱们一块去照张合影吧！这张幸福的合影是他们留下的唯一一张全家福。

1947年10月，江竹筠和丈夫一道斗志昂扬地奔赴新的战场。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四县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处，扼长江上游之门户，被选为下川东暴动重点区域。一路上，江竹筠作为联络员，细心在沿途地设点布线，协调渝万之间的运输，建立云万两县的交通站。她还为过往的同志在各地选择便于掩护的茶馆旅社，并对旅社老板和服务人员的历史、思想情况、社会关系及敌人查号的规律，通过当地同志做了详细调查。

12月，彭咏梧一行来到云阳汤溪沿岸，召开炉塘坪会议，会议决定尽快暴动。下川东地区虽有少数骨干，但知识分子干部很少。彭咏梧决定派江竹筠回重庆，组织输送一批干部来。她不得不暂时离开，却未曾想到，这次离开竟是夫妻永别。

歌乐山下英魂存

1948年4月，《挺进报》被敌特侦破，以此为突破口先后逮捕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刘、冉两人贪生怕死，相继叛变，争相出卖共产党组织。6月14日，感到风声日紧的江竹筠紧急去布置战友转移，突然遭遇叛徒冉益智，跟随而来的国民党特务一拥而上。江竹

筠就这样被捕了。

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已经成为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很快，在万县县城和乘船的客人中，传开了这样的新闻：一个戴手铐的女人，大骂长络腮胡的涂矮子是共产党的叛徒，从而避免了川东党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

江竹筠被带回重庆后，关押在号称“人间地狱”的渣滓洞监狱。得知江竹筠是彭咏梧的妻子，国民党特务妄图从她口中获得暴动地区党组织情报，在连续三次劝降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开始对她用刑。当年参与审讯的国民党法官张界后来交代说：“当班的军士把竹筷子拿来，顷刻一把新竹筷子放在江烈士的十个指尖。当班特务军士，两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在烈士的手指上猛夹，江烈士忍着痛，连声喊：‘哟！哟！’弯腰下去站不起来，江烈士顷刻脸都变得苍白，声音也发不出来……”尽管疼痛难忍，数次昏迷过去，但江竹筠始终坚定地表示：你们可以整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老虎凳、吊索等酷刑逐一使用，但她毫不畏惧、坚贞不屈，对敌痛声斥责，对党的秘密守口如瓶。

特务们黔驴技穷，只得收场。江竹筠被折磨得人都变了形，十个手指都被整烂了，但她心里充满着胜利的豪情，艰难地走进监狱的院坝。各个囚室的风门口挤满了人头，难友们用无限敬仰的目光望着她，向她致意，亲切地称她为“江姐”。

江竹筠的坚贞不屈和英勇斗争，激励了整个渣滓洞监狱的难友，使全体难友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凝聚力空前增强，开展了一场长达17个月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狱中地下斗争。为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江姐以学“国文”为掩护，与难友一起依靠记忆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书的内容写下来，供大家讨论学习、交流思想体会。江姐还通过日常攀谈、做思想工作

作、反复试探等方式，做通了监狱看守黄守才的工作，接通了与外面党组织的联系，及时把监狱内的情况传递出去，接受党的指示。江姐与狱中的难友们还秘密互通信息，组织开展了悼念彭咏梧逝世一周年、春节联欢活动、庆祝党的生日等多次大规模的集体斗争，鼓舞了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江姐是一位坚定的革命斗士，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她也是一位柔情的母亲，格外思念她那幼小的云儿。1949年8月，在给亲人谭竹安的托孤信中，她写道：“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这是江竹筠留给儿子最后的遗言。

1949年11月14日，年仅29岁的江竹筠被秘密杀害于歌乐山下的电台岚垭刑场。江竹筠没有亲眼看到重庆的胜利解放，但她忠贞革命、宁死不屈的革命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学习时报》2020年9月7日）

② 人物小传

江竹筠，小说《红岩》中江姐的人物原型，在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烈士。

1920年8月20日，江竹筠出生在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江竹筠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秋，她进入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并担任该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从事青年学生的工作。

1943年，党组织安排她为当时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彭咏梧当助手，做通信联络工作。同时，他俩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

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组织整风学习的指导中心。

根据党的指示，1944年，江竹筠考入四川大学，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做党的工作。1945年，江竹筠与彭咏梧结婚，后留在重庆协助彭咏梧工作，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江姐”。

1947年，江竹筠受中共重庆市委的指派，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这年春夏，川东党组织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武装斗争，彭咏梧奉上级指示赴川东领导武装斗争。江竹筠以中共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

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江竹筠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同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刑，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破获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竹筠始终坚贞不屈。

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夕，江竹筠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监狱，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李蓝丁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获得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自由奖章』获得者

中国的南丁格尔

共产党教养了我忠于人民的事业，
所以我在任何时候，都能挺身前进，
以此感到无比的快慰。

——李蓝丁

她的叙谈，引我回忆到长江沿岸抗日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她以一个普通医务人员，在敌后率领伤员，经历了五年艰险困苦的与敌周旋；她又引我回忆到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千山万水的战场上，那时，她担任着野战医院的医疗队长；八年来，她随人民解放军转战黄河长江之间，做伤兵敬爱的姊妹和保护

者。坚毅、果敢、忠心耿耿舍身为伤兵服务，她为前线的医务人员树起了光辉的大旗。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女医务人员李蓝丁，代表着人民解放军千万个医务工作者的第三野战军政协代表之一。

两眼闪烁着兴奋喜悦，她以坚毅的语调说：“在新的中国，科学技术人员才真正被重视，因此，政协也有我们的席位；人民政协包括了各革命阶层和各界的代表，认真地商讨建国大计。”

一九四二年，李蓝丁是一个团休养所的卫生员。长江边和运河线上正展开了游击战争，日寇向这里进行残酷的清乡扫荡，她便经常带领数十伤员，白天夜晚，在湖泊山林村庄间转来转去，一面与敌周旋，一面进行医疗看护工作。她要掌握敌情决定对策，她要替伤员煮饭烧茶，洗涤脓血浸透的衣带；他们时常被敌人紧紧追踪，机智地躲藏在麦田水苇里，有时她也背着沉重的药箱向坟堆草垛中奔窜。这时，她只是一个初离家庭学校的18岁新兵。艰苦的斗争，使她学会了：对同志应忠诚，对敌人要机警。

“有一次，是一九四三年初，我们在淮宝地区郑家渡附近遇见了紧急情况，我帮伤兵迅速地分路散开了，为了保护药箱，我必须从最危险的水路上脱走，船能否顺利抵达河口是毫无把握的。船行到河心，敌人的枪声更逼近了，同行的通讯员开始动摇，要叫船靠岸以便逃走。我当时想，药品是我们的武器，绝不能丢。这时我急中生智，从药箱的座位上跳下，夺了通讯员的手榴弹——我说：‘不准靠岸，还得帮摇船，不然就同药箱同归于尽！’手榴弹帮我制服了动摇者，我们终于胜利地逃脱了敌人的追踪。”从此，她又懂得了运用武器，不让手榴弹片刻离身。

一九四四年冬，她率领几只伤兵船渡河，前面一只船突然漏了，水已漫进，眼看就要沉没，伤员发出救命的叫喊。她在大家手忙脚乱中，毅然跳下没胸的冰水，旁人跟着跳下去，才把伤员们拯救上岸。“伤员是

活的革命财产，我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眼看他们遭厄难而不去抢救，这是医务人员应尽的责任。”她这样说明这次英勇行动。

积年累月的辛劳，担负着超出她体力的重劳动，她在三年后吐血了，每晚发高烧，但战胜敌人的信念逼着她不能休息，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体，依然坚持工作。“我不相信我自己患了肺病”，她今天还这样对我说。

抗日战争胜利了，蒋匪军向解放区疯狂进攻，李蓝丁又挺起带病之身，投进了解放战争的火线抢救工作。她做了前方野战医院一个一二百工作人员的医疗队队长。她一面随大军大踏步地前进后退，一面在纵横千万里的战场上设立伤兵转运站。她常是随在战斗部队之后，以一小时数十里的速度，徒步奔跑在公路、平原或山野里，连续十余小时不敢停息，完全像一个战士一样地寸步不离行列。战斗部队展开作战，她的伤兵转运站也摆开了。“把山沟变成树林！”医疗队便以战斗的姿态，在沙滩上，在山脚下，随地搭起收容伤兵的篷帐，只需一天一夜，便在平地升起可容一千副担架的无数篷帐。队长的任务便是布置指挥伤兵到达后一系列工作：洗擦手脚、喂开水、包扎、行手术、喂药、喂饭、换担架，向前转送！他们经常在一小时内，抢救医疗百余伤兵（包括百分之五的人施行紧急手术）。她说：“我们必须同敌人争取时间，更要同细菌争取时间。”像指挥部队一样，他们用旗号、标记，指挥着各种工作的进程，在紧张的战场附近，坚持着执行抢救伤员必需的医务纪律。战役结束，医疗队随部队之后做紧急转移时，她必须跑遍周遭数十里的村庄，为伤兵动员担架车马，没有办法时，便带领工作人员自抬担架。不管情况怎样紧迫，敌人追击如何逼近，她的命令永远是：“向前，只许前进，不准后退！”她欣慰地告诉我说：她的医疗队，从来没有丢弃过一个伤兵。

一九四六年秋，我军主动撤出淮北，李蓝丁的医疗队经历了一次最艰苦的转移。她率领着五百多伤员，在部队撤走的公路上行进，遭受敌机六小时猖狂的扫射轰炸，而没有一个伤亡；常常是一个月辗转行进中没有粮食，她和工作伙伴勒紧腰带，省下粮食给伤兵和担架员吃。夜晚，她被高烧和工作任务扰得彻夜不寐，天明，她又支撑起来，在泥泞的雨中前进。一次，她和战友们用担架抬着伤员过河，走到河中间时，李蓝丁突然头冒冷汗，胸腹巨疼，嘴里已喊不出声。她咬紧牙关，跨过了深沟，才发觉是左胸第二根肋骨断了。她完全忘却身体的病伤，又继续参加南下出击和孟良崮战役，完成着同样艰苦的每个任务。

这就是她自称为“平凡”的英勇事迹。在断续的回忆中，她屡次地说：“共产党教养了我忠于人民的事业，所以我在任何时候，都能挺身而出，以此感到无比的快慰。”

谈到新中国建国事业，她念念不忘医务工作。首先提出：“我们建国的共同纲领，给卫生工作的建设指出了方向，中国人民在卫生医药事业和提高科学知识、提高技能上，需要建树的太多了。目前我们必须面向广大的工农群众：要在每一工厂和农村，肃清落后迷信思想，开展科学的卫生医药工作，仍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正同消灭封建主义残余一样是长期的改革。”她眼睛里再度放出热情的光芒。

我们的南丁格尔将把她的旗帜插在新中国建设的道路上，千千万万的南丁格尔都要伴同她一齐前进。

（汪溪，《人民日报》1949年9月23日）

人物小传

李蓝丁，又名李兰丁，原名李一冰。1923年10月，李蓝丁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盐官镇（现郭店镇）仙步南街一个富有而开明的家庭。

1937年，李蓝丁到上海读中学。1939年，她考入上海私立同德高级助产学校。1941年底，李蓝丁从同德高级助产学校毕业，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参加了新四军第六师。1942年，李蓝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新四军第六师休养所医务室室长、苏中军区后方医院医疗队长，参加反“扫荡”、反“清乡”和车桥战役、高邮战役，曾在被日军包围的情况下，将100多名伤员分散隐蔽在芦苇丛里，每天摇船治疗，使伤员全部脱险。1944年，在新四军苏中军区卫生模范大会上，她被评为三等模范医务工作者。解放战争时期，李蓝丁担任华东野战军野战医院医疗队长、伤员转运总站第四队队长。

1946年秋，部队撤离淮北解放区，她率领医疗队在上有机、后有追兵、连天大雨、水深齐膝的险恶情况下，把500多名伤病员安全转移到鲁南。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李蓝丁带领100多人的伤员转运队，在四昼夜抢救和收转了4400多名伤病员。

1950年，李蓝丁获华东军区一级人民英雄奖章，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同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任上海军医大学志愿手术队队长，带领160多人的手术队在前线参加抢救工作，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1200多次手术，荣立二等功。

1955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自由奖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受到毛主席的多次亲切接见，被誉为“中国的南丁格尔”。



刘胡兰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领袖两度题词的女英雄

怕死不当共产党！

——刘胡兰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挥毫泼墨，把这个评价赋予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一位杰出的中华儿女——刘胡兰。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是谁第一个挥泪写下女英雄？毛泽东主席因何两次为刘胡兰题词？杀害刘胡兰的凶手是怎样找到

并得到应有惩罚的？刘胡兰的母亲因何蒙受不白之冤？在还其清白之时，又是怎样解开了一个多年的疑案——到底是谁出卖了刘胡兰？

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在敌人铡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其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在《晋绥日报》率先发出，不知内情的人也许会问：

是谁第一个挥泪写下女英雄

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出生后，家里给她取名刘富兰。8岁那年，她走进本村的小学堂读书。10岁时，她参加了儿童团。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到妇女训练班学习。

1946年夏，刘胡兰任区妇联干事，积极参加和领导当地土地改革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

1947年1月12日拂晓，阎锡山军队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包围了文水县云周西村。这伙荷枪实弹的阎军，在云周西村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惨案。他们胁迫村民们在村南的观音庙集合，依照叛徒的告密，当众抓捕了16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同时，还抓捕了石三槐、石六儿、张树山、张年成、石世辉和71岁的陈树荣6人，他们是本村民兵、干部家属和八路军回乡战士。

面对敌人的引诱威胁，刘胡兰坚贞不屈，大义凛然。阎军为了让刘胡兰屈服，当众将被捕的6个农民用铡刀铡死。同时命令士兵架起机枪对准村民，狂叫道：“把村里的人全杀光。”刘胡兰为保护群众，大声说：“不许残害百姓！”说完，她走近沾满血迹的铡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刘胡兰等壮烈牺牲不久，新华社吕梁分社记者李宏森随人民解放军某部挺进文水县阎锡山占领区。当他听到云周西村这一流血惨案后，立

即赶到云周西村，怀着沉痛的心情，含着眼泪向知情的区干部和村民做了突击采访，很快写完报道刘胡兰等人英雄事迹的文章。此文经新华社吕梁分社负责人审定后，向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发了两条消息：颂扬了刘胡兰面对凶恶的武装阎军顽强斗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优良品质，又揭示了阎军惨无人道的罪行。

延安各界慰问团副团长张仲实向党中央汇报了刘胡兰的事迹，毛泽东听了任弼时的汇报后，为刘胡兰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0年后，毛主席再次为刘胡兰写下同样的题词。针对这一情况，有人提出——

毛主席为何两次为刘胡兰题词

1947年2月4日至18日，延安各界慰问团在吕梁前线慰问作战部队。当时慰问团的副团长是张仲实。

张仲实是著名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不仅倾毕生精力于中国革命，尤其在翻译传播马列主义著作方面，功绩卓著，为人们所敬仰，刘胡兰烈士事迹的发现与传扬与张仲实有直接关系。

张仲实来到文水县后，在县委召开的情况汇报会上，听到刘胡兰同志大义凛然、壮烈牺牲的事迹后，当即派慰问团中的新华社记者和陕甘宁边区妇联的一位同志，到云周西村群众中调查了解。调查了解的情况汇总到张仲实这儿之后，张仲实深为感动，随即又派人前往云周西村慰问了刘胡兰的父母亲。

张仲实在回延安的途中，遇到当时担任晋中地委书记的解学恭。解学恭向张仲实同志请示“如何在战区进行党员教育”的问题时，张仲实详细地向他讲了刘胡兰英勇牺牲的感人情节。他说，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凭着对人民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

理想的坚定信念，不贪钱财，面对敌人的利诱，坚定地回答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在铡刀面前，大呼：“怕死不当共产党。”她的这种表现首先在于她从儿童团起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并看到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给贫苦农民带来了根本利益。她的表现，正是共产党的革命教育深入千千万万农民心中的成果。所以，应该把刘胡兰英勇就义的典型事例，作为教育党员的教材，大力宣传。

解学恭采纳了张仲实的建议，决定在刘胡兰烈士墓前立一个石碑，并请张仲实同志写碑文。张仲实非常谦虚，他认为由他写不合适，便说道：“等我回到延安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后，还是请中央负责同志为刘胡兰写碑文，这样有利于宣传刘胡兰的事迹。”

3月25日，张仲实在陕北向任弼时同志汇报了刘胡兰烈士的事迹，也汇报了晋中地委关于纪念刘胡兰烈士决定的意见，最后，张仲实向任弼时建议说：“纪念刘胡兰烈士一事，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或题几个字，以示表彰。”任弼时听了张仲实的汇报并听取了他的建议后，表示赞同由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

3月26日，任弼时向毛主席汇报了刘胡兰的事迹。毛主席以沉痛的心情，在他住的窑洞里，挥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此时，正值中共中央从延安撤出后的第8天，毛泽东正决定离开陕北以游击方式同国民党军周旋。在此紧要关头，全党的领袖在指挥全国战局的百忙中，为一个年轻的女党员写下这样的文字，正有着激励全党和全体解放区人民去英勇奋斗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寓意。

1957年1月12日，是刘胡兰烈士就义10周年的日子。共青团山西省委早在1956年12月11日就作出了《关于纪念刘胡兰逝世10周年的决定》。在组织开展这项纪念活动中，有一件大事要办，就是要派人进京恳请毛泽东为刘胡兰第二次重新书写八个大字的题词。因为第一次的题

词在战乱中丢失了。当时，团省委宣传部写作科长杨小池接受了这个任务，他来北京先到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呈交了团省委恳请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重写题词的报告。

1957年1月12日，在刘胡兰牺牲10周年前夕，毛主席为刘胡兰重写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题词，由山西省团省委派人送到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陵园，新华社记者播发了由马明采写的消息。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尽快捉拿、惩办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经过缜密调查，杀害刘胡兰的凶手一个个显露出来，并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当这些杀人凶手被处决后，人们还是没有弄清谁是杀害刘胡兰的主谋。实情披露：

杀害刘胡兰的主谋是如何落入法网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共和国的卫士们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追捕。这场大追捕不仅仅是为烈士复仇，更是为了还人间一个正义。

1947年2月2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文水县城后，党和政府就开始了制造刘胡兰惨案的有关凶犯的缉捕工作。

吕德芳，惨案凶犯之一，在解放文水县城战斗中被解放军击毙。

吕善卿，惨案主谋之一，在解放文水县城时被俘，经审查后被处决。

冯效异，惨案主谋之一，二一五团一营营长。在1948年6月的晋中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

孟永安，惨案主谋之一，在解放文水县城时被俘。

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经过群众检举，许德胜被逮捕。许德胜是亲自指挥并用铡刀杀死刘胡兰等烈士的阎军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连长，同年4月4日在祁县武乡村被枪决。

1951年5月8日，运城县公安局派人逮捕了张全宝。张全宝是杀害刘胡兰的凶手之一，是阎军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指导员。

1951年5月11日，阎军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副营长侯雨寅被稷山县公安局逮捕。

1951年6月24日，在云周西村惨案发生的地点，举行了文水县各界2.4万多人参加的公审侯雨寅、张全宝大会，并对侯、张两犯处以死刑。

然而，杀害刘胡兰的真正匪首是朱永生，此时，他还在逍遥法外。

朱永生是如何被抓获的呢？

这事很有戏剧性。1954年8月的一天，内乡县赤眉区公演歌剧《刘胡兰》，当演到大胡子连长指挥士兵铡刘胡兰的情景时，有个看戏的低声道：“哼，演得一点儿都不像。”站在他身后的一位老工人，听到他的话后，心里不由咯噔一下。心想，这个其貌不扬之人，怎能知道演员演得像不像呢？难道这个人……演出结束后，老工人便跟在那个可疑人的身后，跟踪到那个人的家门口，记下那个人的住址后，立即报告了区公安特派员。公安特派员认为此事重大，便迅即展开调查。经调查，这个人正是杀害刘胡兰的匪首，叫朱永生，河南省内乡县赤眉人。新中国成立后，他畏罪潜回老家，并从山西带回一位妻子，名叫何秀珍。朱永生在家乡当民办教师，他的老婆任村妇女主任。

朱永生是个瘦高个，他当时是个具有一副书生模样的匪营长。朱永生出生在一个老实厚道的贫苦农民人家。十几岁时就被卖到山西太原一带当壮丁。他这个人脑子活，很会察言观色，还练了一手好枪法。也正是出于他的身手，被闻喜县一恶霸地主看中，雇他做了保镖，还将女儿何秀珍许配给他为妻。后来，朱永生又投靠了山西反动军阀阎锡山，朱永生由此成了阎军手下的一个营长。在云周西村，杀人不眨眼的朱永生便向他的部下大胡子连长下达了用铡刀铡死刘胡兰的命令。

在确认朱永生是不是杀害刘胡兰的匪首时，朱永生正在郑州市出席省先进教师表彰大会，公安人员到达郑州后，在河南饭店澡堂内辨认了朱永生确为杀害刘胡兰的主谋。

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朱永生被捕后，经闻喜县和文水县两地公安机关调查核实，朱永生任国民党地方武装营长时，在山西省闻喜县、文水县一带杀人放火，为非作歹，犯有谋杀农会主席、杀害共产党员刘胡兰等多条人命案，罪状达十条之多。

1954年冬季，血债累累，又险些漏网的朱永生被司法机关判处死刑，在山西省文水县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胡文秀，虽是刘胡兰的继母，但她视刘胡兰如亲生女儿。“文革”期间，胡文秀被诬为出卖刘胡兰的凶手。最后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才获解放。同时，也解开了一个多年的疑案——

究竟是谁出卖了刘胡兰

1954年10月1日，刘胡兰的继母胡文秀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荣幸地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

“文革”期间，已担任刘胡兰村党支部书记、刘胡兰公社党委副书记的胡文秀，被人贴了许多大字报，列举了胡文秀三大“罪状”：胡文秀是刘胡兰的继母，冒充烈士母亲沽名逐利；胡文秀虐待烈士父亲刘景谦；胡文秀是出卖刘胡兰的凶手。

事实如何呢？1921年，胡文秀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文水燃起抗日烽火，17岁的胡文秀便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

1941年年初，胡文秀嫁给了比自己大16岁的刘景谦，成为刘胡兰姐妹的继母。

胡文秀视刘胡兰如亲生女儿，由此母女之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刘胡兰原名刘富兰，是胡文秀将“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她发自内心把刘胡兰当成自己的女儿。但她还是被说成是出卖刘胡兰的凶手，遭到批斗。

刘景谦这位忠厚老实人，再也无法沉默了。他和女儿刘芳兰一道赶往北京，要找党和国家领导人明断是非。问题反映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解决了问题，胡文秀才获得解放。

出卖了刘胡兰的叛徒也于1963年2月14日，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这个叛徒究竟是谁？

这个叛徒就是云周西村的石五则。石五则原是村农会秘书，过去因包庇地主段二寡妇，受到过刘胡兰的批评。后来区党委为纯洁组织，撤销其职务并开除了其党籍。

在刘胡兰等人被捕时，敌人对石五则名为逮捕，实质是在保护。在“受审”时，石五则将刘胡兰等人全部出卖。所以与石五则一道被捕的石三槐、石六儿、刘胡兰等被残杀时，石五则却平安回了家，这事引起了公安机关和许多人的怀疑。因此，1947年10月，我公安机关将其抓获。但是，由于他本人拒不承认出卖过刘胡兰，再加当时战事频繁，没有来得及对其进行周密侦查，未获得足以证明其罪恶的证据，便于1947年12月23日将其暂时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受难者家属等干部群众心中疑团未释，一直向公安机关反映有关情况。1958年年底，公安机关对此案进行了严密侦查，终于查清此案。在法庭上，石五则百般抵赖，但在大量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1963年2月14日，石五则这个叛徒被枪决。在参与屠杀刘胡兰等烈士的罪人中，他是最后一个受到惩处的。

这个结果，也还了胡文秀清白。

1986年3月10日，年仅65岁的胡文秀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闫树军,《人民政协报》2021年6月10日)

人物小传

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生后，家里给她取名刘富兰。8岁那年，她走进本村的小学堂读书。10岁时，刘胡兰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占领了文水县城，解放区军民被迫拿起武器，保卫胜利果实。1945年11月，刘胡兰参加县党组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回村后，她担任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动员青年报名参军。1946年夏，刘胡兰任区妇联干事，积极参加和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

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军队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包围了文水县云周西村。他们胁迫村民们在村南的观音庙集合，当众抓捕了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同时，还抓捕了石三槐、石六儿、张树山、张年成、石世辉和71岁的陈树荣6人，他们是本村民兵、干部家属和八路军回乡战士。在敌人威胁面前，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敌人没有办法，将同时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当场铡死。但她毫不畏惧，从容地趟在铡刀下，壮烈牺牲，年仅15岁。



1950
年至今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新中国成立后，妇女事业迎来新纪元。她们激扬巾帼之志，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家庭和自己的主人；她们或积极投身改革热潮，或始终坚守平凡岗位；她们牢记责任，继往开来，与新时代同行、为新目标奋斗、在新征程建功、做新时代新女性。



丁雪松

新中国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女大使

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

2011年5月29日，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走完了她93年的革命人生，为她的亲人、朋友和熟识她的人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题记

从1979年到1984年，丁雪松先后在荷兰和丹麦做大使。时值改革开放之初，中央领导已明确提出，要设法利用外国资金及引进先进技术，以促进国内建设事业的发展。丁大使想，时代不同了，作为使馆的一把手，不仅要抓政治，而

且要下大力气抓经济。她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加大经济调研力度。当时，丹麦对外贷款数额虽不大，但对急需资金的中国来说不无小补。中国驻丹麦使馆积极为国内各省市牵线搭桥。黑龙江省在丁雪松的帮助下，利用第一笔无息贷款，在安达建起了一座乳品厂。两年后，安达牌奶粉即上市，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胡耀邦专门批示道：“做得很认真。与外资合作门路和同第二世界国家合作门路还很多，希望努力打开新局面。”

与此同时，引进丹麦嘉士伯啤酒生产技术一直萦绕在丁大使的心头。1980年，丁雪松在北京报纸上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标题：“借问啤酒何处有？”当时，人们为了能喝到一点啤酒，抱着暖瓶，端着罐子，顶着烈日在饭馆门前排长龙。她还听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对北京人喝不上啤酒很生气，曾过问此事。

经丁大使国内国外多次奔波，穿针引线，反复磋商，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北京将建一座年产10万吨的啤酒厂，丹麦提供优惠贷款，并在关键车间开展丹中经济技术合作。同时还提供一笔无息贷款用来建造一个食品研究中心。至此，一个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啤酒厂北京华都啤酒厂终于破土动工了。3年后，正式出酒，北京啤酒奇缺的问题终于解决。为此，丹麦啤酒厂的老总诙谐地称丁雪松为“啤酒大使”。

见证友谊的船舶“圣母”

在欧洲，人们把新建船舶的下水看作一个婴儿的诞生。每逢此事，往往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社会知名女士为它主持下水仪式。届时，这位“圣母”将手中的一瓶香槟酒掷向船头，酒瓶撞得越碎越吉利。

1982年10月19日，丹麦BW造船厂给中国建造的第四艘远洋轮

“台洲海”号举行下水仪式。丹麦工业大臣伊布·斯泰特和丁雪松大使先后致辞，都为两国卓有成效的经贸合作感到高兴，也为“台洲海”的诞生祝福。当丁大使紧握着拴有红丝带的香槟酒瓶用力甩出后，酒瓶如离弦的箭迅速飞向船头，只听哗的一声，香槟酒花四溅。顿时，船上、岸上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站在甲板上的几十名中国船员尤为高兴，因为这象征着“台洲海”顺利诞生了，它将一帆风顺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

20 世纪 80 年代，在国际航运市场运价低、柴油费用上涨的情况下，这种远洋经济型船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当时，上海造船厂及其镇江柴油机分厂利用丹麦先进技术和为中国培训技术人员等合作方式，已建造出低速船用柴油机，并用于中国出口的船舶。现在，中国的造船业已取得长足进展，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我们不应忘记丹麦这位启蒙老师。作为彼时的中国驻丹麦大使丁雪松，对此也备感欣慰。

在丁雪松离任时，丹麦最大的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为她饯行时说：“丁大使把高雅的风度与职业的外交和卓越的才能结合得天衣无缝。”外交大臣彦森则表示：“您在哥本哈根留下了令人尊敬的声誉，这不仅指您的精力和能力，而且还有您与你们高度文明国家相称的老练的工作。”女王玛格丽特说：“在您的任期中，丹中两国关系越来越好，而且两国合作项目还在继续增加。”

曾长期从事民间外交

丁雪松的外交才干不是一日之间形成的，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她同丈夫郑律成从朝鲜归来后，就进入外交领域了。

从中央对外联络部到国务院外办，她先后在王稼祥和周恩来身边工

作。“文革”期间，她被从干校召回，到对外友协工作，先后任秘书长和副会长，直到后来做大使。

在“文革”那个非常时期，官方外交受到很大干扰。周恩来苦撑危局，最早恢复了对外友协工作。以民代官，以民促官，在外事交往中，友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中国到朝鲜，从延安到平壤，多年的革命历练，已铸就了丁雪松钢铁般的意志和融化在血液中的革命信仰。她以周恩来为楷模，以极大的热情和仔细的工作态度开始了踏踏实实又风风光光的民间外交工作。

她接待过许多重要的外国客人，其中有不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人、杜波伊斯夫人、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加拿大的文幼章、卢森堡的弗兰克、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斯、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等。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直接关怀下，她承办了斯诺的骨灰安葬仪式。她陪伴邓颖超接受过斯诺夫人捐献的斯诺保存了40年之久的红军八角帽。她按周恩来的教导，要给朋友看好的一面，也要看差的一面，使客人对中国有全面的了解。她率团或随团出访，足迹遍及亚、欧、北美和拉丁美洲，为祖国赢得了鲜花、荣誉和掌声。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丁雪松首次带团出国。那是1973年经周恩来批准而被拖延下来的一项文化协定——派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法国和加拿大。团长原来是“四人帮”委派的，后领导决定换丁雪松为团长，丁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带好这个团，就必须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包括节目和演员的敲定、文字资料、思想动员、组织工作、国内外的协调等，特别繁杂琐碎。演出非常成功，“整个巴黎为之鼓掌”“加拿大沸腾起来了”“受到国宾红地毯接待”。一位加拿大外交官称：“从他们的行动中，看到一个从容、安详的北京政权的某些征候。”访问法、加后不久，丁雪松又奉命率中国艺术团访问北欧五国，访问同样获得成功。丹麦一

位大臣风趣地说，现在丹麦内阁成员都在“排着队等候访华”。在出访归来的总结报告中，丁雪松适时提出了引进北欧先进技术的建议，使艺术团团的访问成了中国对外寻求经济技术合作的先导。

金日成家的座上客

1945年8月10日、11日，延安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布了七项命令，其中第六号是朱老总颁布的：“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东北之朝鲜人民，以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丁雪松的丈夫郑律成自小离开朝鲜到中国参加抗日斗争，现在曙光已来临，他希望雪松与他同行，迎接朝鲜解放。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丁雪松二话没说，向边区政府提出了申请。1945年12月，丁雪松带着幼女，从延安出发，随爱人郑律成加入朝鲜义勇军的队伍中。一路风餐露宿，经过3个多月的辗转，终于到了朝鲜。他们将中国共产党党籍转为朝鲜劳动党党籍，并立即投入朝鲜土地改革等工作中。1946年初，金日成到海州视察工作时，见到了丁雪松夫妇。不久，金日成交给丁雪松一项重要任务：回中国北满找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同志，请求支援一些粮食。因金日成了解她在延安的表现，特安排他们住在他的家里。丁雪松回到东北后，见到了时任东北局副书记的高岗，也见到了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和蔡畅。当时，粮食极端匮乏，尽管如此，东北局还是竭尽所能地支援了朝鲜。金日成对丁的工作很满意，赠她一个战利品——降落伞作为纪念。

后来，丁雪松和郑律成二人被调到平壤工作。丁先后被朝鲜劳动党

中央任命为侨务委员会秘书长、朝鲜华侨联合总会委员长。中国东北行政委员会则任命她为驻朝鲜商业代表，新华社任命她为平壤分社社长。郑律成则创建了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创作了《朝鲜人民军进行曲》《图们江》《东海渔夫》等10余部大型音乐作品，成为朝鲜军队中的专业音乐工作者。金日成曾诚恳地对丁雪松说：“朝鲜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继续，中国的解放也是朝鲜的解放。”丁雪松夫妇为中朝的解放事业并肩作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和丈夫郑律成生死相依的爱情

1976年12月7日，郑律成从外地赶回北京。他准备谱写有关周恩来的组歌，以纪念这位在国家多难之秋殚精竭虑，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团长，丁雪松将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一个作曲，一个搞外事工作，两驾马车鼓足了劲儿向前奔跑。然而悲剧恰恰就在这时发生了：郑突发脑溢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在郑律成突然离开的那段日子里，丁雪松一直在痛苦的回忆中煎熬。郑生前曾对丁开玩笑说：“你是家庭中的官僚主义者。”他们从未一起到外地休假或旅行，总把这一天留到遥远的将来。然而，这一切美好的憧憬都因郑律成的骤然病逝戛然而止……

1938年春，丁雪松与郑律成相识在延河畔。那时，丁在抗大五大队女队学习，郑还是鲁艺音乐系学生。在后来的交往中，二人彼此倾慕。郑向丁讲述了自己丧家失国并颇有些传奇色彩的身世，使丁对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原来郑的父亲及三个哥哥和姐姐都是抗日的积极分子、爱国者。他被三哥从朝鲜带到南京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学习，后在上海学习音乐，同时参加进步青年活动。1937年，上海战事危急，郑决

定去延安。1939年1月，郑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和1939年，是郑律成音乐创作的巅峰期，《延安颂》《延水谣》《保卫大武汉》《生产谣》《八路军大合唱》等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笔下流出来，在古老的延安城里回荡。但恰在此时，纷纷传说他政治上有问题，组织上也正在审查。丁和郑的恋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跨国婚姻，3年苦恋，历经磨难，但两个人还是终成眷属。婚后半年多，因整风运动等原因，郑律成去了前方，且一年多杳无音信。为了喂养不足月的女儿，丁雪松卖掉了郑律成的小提琴，换了一只母羊，挤奶喂孩子。为此，她给孩子取名小提。当郑律成返回延安时，孩子已快满1周岁了。

丁雪松夫妇在朝鲜工作5年，经周恩来批准，并征得金日成同意，他们又相继返回中国，重新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籍，郑律成也正式加入中国国籍……

提起郑律成，丁雪松总是愧疚难当，自己整天忙忙碌碌，竟没有能多抽出点时间来照顾他，此恨绵绵无绝期。但她也为他骄傲，为他自豪。在1976年12月17日的追悼会上，胡耀邦说：“郑律成是一个好同志。他是仇视林彪、‘四人帮’的，是爱憎分明的。在延安时期，他的歌达到了高峰。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革命斗争作出了很大贡献。”作曲家唐诤称：两个国家（指中国和朝鲜）的两首军队进行曲（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出自一位作曲家之手，这在世界音乐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1981年，王震为《作曲家郑律成》纪念文集作序称：“他是当年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朝鲜人民没有忘记他，1991年，大型彩色故事片《音乐家郑律成》在平壤正式上映。郑律成是音乐家，也是革命者，亲身参加了中朝两国的民族独立运动，走过了崎岖不平的路。但不管是鲜花怒放还是布满荆棘，丁雪松作为他的爱

人、革命伴侣，一直陪伴在他身旁。

从抗大高才生到李鼎铭的秘书

1918年5月27日，丁雪松出生于重庆木洞镇。听着川江的号子，送走了苦涩的童年，她来到重庆市区求学。1936年，18岁的丁雪松在《商务日报》上呐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次年当选为重庆妇女救国会常委。1937年底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奔赴延安。1938年1月到达延安，投身革命的洪流。当听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抗大校歌时，丁潸然泪下，她终于走进了抗大。她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博古等人的演讲，还受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教育，军事课程也占相当比重。后来又参加生产自救运动，开荒种地，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学。1939年初，中央作出了加强妇女工作的决定，创办女子大学。丁雪松被分到女大高级班学习，并成为这支英姿飒爽的娘子军的大队长，故又有“女大侠”的绰号。1941年底，边区参议会开幕。高岗被选为议长，谢觉哉、李鼎铭被选为副议长。李鼎铭目睹边区遇到的严重困难，想到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的“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从而增强了勇气和信心，提出“实行精兵简政，避免人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李鼎铭的议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后经毛泽东提名，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林伯渠为主席。丁雪松被派去给李当秘书。李鼎铭从米脂县举家迁往延安，并把全部家产捐给了边区政府。从此，他专心干起了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工作。英国记者斯坦因曾采访过他，并提了个敏感的问题：“你是个非共产党员，你在边区政府真能起作用吗？”李骄傲地说，毛主席对他的“精兵简政提案”很感兴趣，而且自己被推选为边区副主席。

李经常说：“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自从辛亥革命，我对社会改革发生兴趣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实的进步。”“我希望重庆方面知道，为什么我这样的绅士会以边区为自豪。”事后，斯坦因见到边区秘书长罗迈（李维汉）时承认：“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丁雪松在回忆延安八年时曾说：“那是我一生中的重要历程，承前启后，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晚年的特殊贡献

2007年4月3日，沐浴着和煦的春光，外交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符华强、离退休干部局副局长陈绮曼、机关妇工委主任刘霞等，陪同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筹建工作顾问马延军和文物征集部工作人员，看望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并接受丁的文物捐赠。丁雪松此次捐赠的珍贵文物共计10件，其中有1984年丹麦外交大臣赠送的礼物——纪念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登基10周年，由皇家瓷厂特别烧制的精美大瓷钵（钵底印有金色皇冠并有女王二世的缩写字母，编号为1686，共烧制2000件）；有1982年5月18日，丹麦宫廷侍从迎接丁大使前往皇宫递交国书时的照片和当时穿着的礼服；有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参加外事活动时的照片以及《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等。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物是丁从事外交事业所作贡献的见证，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马延军代表妇联感谢丁雪松的慷慨捐赠，已近九十高龄的丁雪松用颤抖的声音说：“都是应该的。”

（张兵，《党史博览》2019年第2期）

人物小传

丁雪松是新中国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女大使，她也是一位作曲家，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

丁雪松，曾用名丁正兰，1918年出生在四川巴县木洞镇，家境贫寒，还未出世，父亲就患病离世。小的时候在木洞镇福音堂小学读书，后来考入重庆文德女中。193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后考进重庆平民银行当职员。

1935年，日军发动华北事变，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丁雪松愤而投书《商务日报》，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积极投身重庆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7月，丁雪松团结一批进步职业青年成立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对外称重庆职业青年读书会，当选为理事，负责宣传工作，并在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开办的平民夜校担任教员。1937年8月，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丁雪松担任委员，分管组织工作，同年12月，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成立，被首批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丁雪松受党组织派遣前往延安，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毕业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秘书，1941年，丁雪松与鲁迅艺术学院教员、作曲家郑律成结为伴侣。1945年经中央批准与郑律成赴朝鲜工作，在朝鲜劳动党黄海道党委宣传部工作，先后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侨务委员会秘书长、朝鲜华侨联合总会委员长、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丁雪松回国了，从1951年起，先后担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组长、秘书长等职务。1971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副会长。1979

年，丁雪松被任命为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她是新中国第一位派驻国外的女大使。1982年，丁雪松担任中国驻丹麦（兼冰岛）大使。

2011年5月29日，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走完了她93年的绚丽人生，为她的亲人、朋友和熟识她的人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李桓英

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
时代楷模

心怀大我，毕生求索

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更加坚定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

——李桓英

她出身书香门第、条件优越，却选择被许多人视为畏途的传染病防治作为自己的事业；她曾与家人在海外生活，有体面的工作、丰厚的薪水，却毅然回国艰苦奋斗；她一生未婚，无儿无女，却被许多重

获新生的患者视为“妈妈”……她，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生、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桓英。

李桓英是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优秀代表，践行科学家精神的杰出典范，爱国归侨的学习榜样。在 80 多年的医学生涯中，李桓英始终心系人民健康福祉，勇于探索创新，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为推动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巨大贡献。2021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李桓英“时代楷模”称号。

秉持大义：心有大我、赤诚报国的爱国情怀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赤诚的爱国情怀，植根在李桓英的心中从未改变，源自她的家风传统、内心情感和责任担当。

优良家风的传承延续。“桓”字有华表的意思。李桓英的名字，寄寓了长辈期待她像华表一样杰出的愿望。李桓英的家族不仅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更有爱国的优良家风。李桓英的祖父李庆芳是清政府公派的留日学生，后回国效力，是民国时期知名人物。抗战期间，李庆芳坚持民族大义，为解救 30 多名八路军战士，被日军关押 40 余天，不久愤恨逝世。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曾专门刊载李庆芳的事迹，盛赞其“劲节可风”。李桓英的父亲李法端是中国第一批留德学生，学习电机专业，归国后先后在杭州电机厂和政府多个部门任职，致力实业报国。祖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李桓英从小就受到熏陶。在李桓英看来，“爱国”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没有什么值得标榜：“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根，我学习的知识，要为中国人服务，不能忘本。”她本人的学成归国，也成就了家族“一家三代，留学报国”的佳话。

心系祖国的内在召唤。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青年时代的李桓英虽在多个国家学习工作，却从来不曾忘记祖国。“在缅甸时，我与祖国仅隔着一條河。”李桓英说，“每当夕阳西下，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眺望北方，想念北京。”新中国的成立让海外学子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很多人不远万里回国参加建设。李桓英内心也有很深的触动，她说：“那时回国正当其时，就是要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一穷二白，基础非常薄弱。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李桓英的选择，长期的国外阅历使李桓英深深认识到，传染病往往与贫困落后紧密相连。她更加迫切地要回国，要用自己的医术为当时尚未脱离贫困的国家和同胞贡献力量。

无怨无悔的责任担当。世卫组织刚刚成立时，李桓英被推荐成为首批官员。1957年工作期满后，她婉拒了世卫组织年薪9000美元（当时美国人均年收入3110美元）的续约邀请，准备回国。“当时美国与中国还没有建交，遥远的祖国并不知道我要回来，也没办法给我提供帮助。”李桓英想尽办法，手持一本联合国护照辗转多地，终于在1958年回到祖国。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根据她的专长，安排她到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国家的信任使李桓英进一步感到肩负的责任。回国60多年来，她服从安排，先后参加了一系列科研工作。20世纪60年代前后，她参加的“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取得成功，开展的麻风菌脂质抗原提取、荧光抗体试验处于国际先进水平。70年代，她成功研制出“灰黄丸”，为江苏省泰州市苏陈公社160多名头癣患儿解除了痛苦，这项成果还获得1972年全国科技进步奖。1978年，57岁的李桓英全身心投入到令人望而生畏

的麻风病防治事业中。当时，她的家人已移居美国，赴美探亲时，家人都希望她留下，但她放不下正在开展的医学研究工作，再一次放弃了与家人一起生活的机会——早在1964年，父母就曾这样劝过她。可李桓英说：“国内的生活确实很苦，但苦的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缺吃少穿、体弱多病。这时弃之而去，还不如当初不回国！作为医生，能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我感到自豪。”对祖国的真挚情感和非凡的工作业绩，使李桓英成为爱国归侨的学习榜样。

胸怀大爱：生命至上、护佑苍生的医者仁心

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向往和追求，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在长期的麻风病防治工作中，李桓英视患者如亲人，不仅精心医治，为数以万计的患者解除了病痛，还身体力行，为破除社会对麻风病患者的歧视树立了典范。

济世慈心因于同情敬畏。自古以来，麻风病就是人人避犹不及的恶疾。这种疾病使人皮肤溃烂，鼻塌目陷，四肢畸残，与人类相伴了至少3000年，与梅毒、结核并称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患者在忍受肉体痛苦的同时，往往还要承受被社会歧视的精神折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麻风病患者有50多万人，涉病地区分布广泛。20世纪70年代初，李桓英第一次亲眼见到麻风病患者的惨状，做过多年传染病研究和治疗工作的她也不免动容了。她把对患者的深深同情转化为沉甸甸的责任，决心以自己的努力，帮助他们解除痛苦。1978年，年近花甲的李桓英确立以麻风病防治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她的目标，就是“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在她看来，自己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青少年时期辗转多地学习生活、艰苦的国内外医学教育科研、世卫组织工作期间在多国的传

染病治疗实践、回国后的工作生活历练……之前所经历的一切似乎都在为此做准备。因此，李桓英总是说：“不是我选择了麻风病，而是麻风病选择了我。”为防治麻风病，李桓英长期奔波在涉病地区，云南、贵州、四川的大多数麻风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无微不至彰显人文关怀。以前，医务人员在面对麻风病患者时，往往穿得像个“防化兵”：白大褂、白手套、帽子、口罩、鞋套全副武装，整个人只能看见两只眼睛。放药的桌子隔着患者1米远，医务人员用棍子把药推到患者面前……面对社会的歧视和麻风病难以治愈的现实，不少患者心灰意冷，不愿配合治疗。李桓英说，医生要消除患者的自卑，让他们心情轻松起来，才能配合治疗。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李桓英认为，麻风病传染性有限，一般接触不易感染。她身体力行改变人们对麻风病的态度，与患者握手拥抱，和患者一起吃饭、喝水，一年至少有2/3的时间在麻风村寨度过。麻风村的村民都很惊讶：“北京来的女摩雅（医生），天哪，不怕麻风病！”有人问她为什么不怕，李桓英说：“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患者亲眼看到，我能治好它！”在治疗早期，患者的脸部会出现发红发紫的状况，有的患者感到恐慌便拒绝服药，甚至把药扔进水里。李桓英挨家挨户做工作，告诉他们这只是服药后的正常反应，开导患者坚持服药。3个月后，患者状况明显好转，身体逐渐恢复。他们深情地说：“麻风病把我们从人变成了‘鬼’，是李教授把我们从‘鬼’变回了人。”

攻坚克难不畏以身涉险。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统筹开展麻风病防治，在涉病地区形成了一些麻风村寨。李桓英长期奔波在这些地区，云南、贵州、四川的大多数麻风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在深入麻风病区的途中，由于道路崎岖、山高水险，李桓英多次遇险，两次翻车，两次

翻船。1989 年去往四川西昌途中，李桓英乘坐的汽车翻越雪山时不幸掉进十几米深的山沟，等她苏醒时，皑皑白雪上留下了一大片殷红的鲜血。那一次，她的两侧锁骨和 3 根肋骨都骨折了，头部外伤缝了 7 针，大家都劝她好好休养，但她打着石膏、缠着绷带，强忍疼痛，又投入到工作中。看到大家为她担心，她打趣说，“按照我坐车的概率，也该翻车了”，“我胖得像个皮球，掉到水里也沉不下去”。艰苦与危险没有阻断李桓英继续前进的脚步，她坚定地说：“要想搞事业，就别怕付出。若要计较，就什么也干不成。”

医者仁心换来了显著医疗效果，经她治愈的患者达到 1 万多人。在李桓英和广大麻风病防治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短短几年，肆虐数千载的麻风病成为可控、可治的普通疾病，全国麻风病患者从 11 万人降至不足万人，年复发率仅为 0.03%，远低于世卫组织 1% 的标准。李桓英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医德楷模、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和“最美奋斗者”称号等，成为我国医学专家和科技大家的优秀代表。

融汇大智：求真务实、勇于攀登的科学精神

科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斗争的锐利武器，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李桓英在直面问题、迎难而上中始终坚持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严谨治学，开拓创新，在推进中国和世界麻风病防治事业中取得重大成就。

1983 年，李桓英来到云南省勐腊县南醒村，建立“短程联合化疗”试点。经过 27 个月的治疗，服药的 47 名患者临床症状全部消失，完全达到了预期效果。1990 年 4 月，当地政府举行了麻风寨摘帽更名大会，

南醒村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曼喃醒村，在傣语中意为“新生的山寨”。

严谨细致，秉持科学态度。从18岁考上同济大学医学院开始，李桓英就在学习和工作中培养了科学严谨的作风。在被世卫组织派往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开展传染病防治的7年中，她与当地专家一起工作，锻炼出因地制宜开展医学科研的能力。1958年回国工作后，她在多项科研工作中进一步提升了能力和水平。投身麻风病防治工作以来，李桓英始终秉持科学态度，坚持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在她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云南、贵州、四川交通图，上面插了20多面三角旗，都是她行医所到之处。其中7个麻风病发病率较高的地区，被李桓英选定作为治疗的试点。在云南省勐腊县试点，为了实验的规范性以及便于日后复查追踪，李桓英严格要求实验人员进行细致的检测和记录。一套包括47例患者的病案，连续27个月详实记录了患者每天每次的用药等情况。如此用心用情、认真细致的记录，深深地震撼和感动了后期来到这里的工作人员。

结合实际，创新防治方法。在总体思路，李桓英注重从实验室走向现场。以往的麻风病防治多注重实验室研究，李桓英打破陈规，主张把实验室搬进麻风村，在现场面对面地为患者检查治疗。在治疗方案上，李桓英推广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治疗效果显著。在防治模式上，1996年，李桓英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行动，首次提出了麻风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为我国乃至世界麻风病防治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2000年，中国卫生部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麻风病患者已经下降到2000人左右，患病率在十万分之一以下，基本消灭了麻风病。

造福全球，贡献中国智慧。作为最早也是最年轻的曾在世卫组织任职的中国女性，李桓英积极与世卫组织保持联系，运用国际资源推动中国麻风病防治工作，又用中国成功经验促进世界麻风病防治事业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她在世卫组织资助下，以访问学者身份考察了6个国家的9个麻风病治疗中心，开阔了麻风病防治的国际视野。当世卫组织将中国作为“实验新疗法”地区后，李桓英根据中国的特点迅速拿出了“联合化疗”的“短程试验”方案。在她的争取下，世卫组织向中国提供了药物和医疗物资，对中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给予积极支持。她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法被世卫组织在各国推广，造福了全世界的麻风病患者。

出于对我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的肯定，1998年，第十五届国际麻风大会将会址选在了北京。这次会议具有纪念现代麻风病防治100周年的特别意义。大会期间，李桓英被推选担任轮值执行主席。会上，她领导开展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特别行动计划，被誉为“全球最佳”，世卫组织官员诺丁博士紧紧握着李桓英的手说：“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李桓英是在麻风病领域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探索者和推动者。多年来，她被任命为世卫组织麻风病专家委员会成员，多次担任国际麻风会议主席和副主席。李桓英的成功医学实践，不仅有力推进了中国麻风病防治事业，也为世界范围的麻风病防治做出了突出贡献。

躬行大道：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党性修养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2016年12月27日，一场不同寻常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北京友谊医院举行。历经思想磨砺和实践考验，95岁的李桓英，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入党。

不断磨砺思想，追求真理。在李桓英看来，加入党组织，首先是因为“立场相同”。医学研究不信天、不信命，只信事在人为，这同中国共产党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同

时，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李桓英的志向也是一生只为“人民的需要”而工作。她常常说：“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我，能够为人民群众治疗疾病，取得一点成绩，是此生最大的幸福。”这种对人民群众的诚挚情感，源自她在深入麻风村寨治疗时同患者及家属结下的情谊。入党时，李桓英说：“入党也和科研一样，都是为了追求真理。我为国家服务了快60年，现在觉得自己可能合格了。”在她心里，“合格”的标准很高，为此，她一直在努力奋斗。

李桓英始终把自己取得的成绩与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联系在一起。

始终保持初心，淡泊名利。海外归国的老一辈科学家往往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在科研工作中，都有着复杂深刻的头脑；在生活选择时，又有着简单纯粹的心灵。对待个人名利，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总是首先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李桓英也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刚回国时，国内的实验设备比不上国外先进，她一边“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用简单的设备完成艰巨的任务，不因条件艰苦停止奋斗；一边积极向世卫组织申请医疗物资和技术支持，为在国内开展研究工作创造条件。为了事业发展，她想方设法、雷厉风行；但面对个人待遇，她却不太上心、拖拖拉拉。单位让她报一张“正教授”的申请表，她拖了整整20年才填好上交……因为投身传染病防治事业，李桓英一辈子没有成家。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说，人生有很多种幸福，她与麻风结缘，能够毕生从事自己喜爱的医学研究，已经很幸福、很幸运了。

坚持脚踏实地，心怀感恩。李桓英始终把自己取得的成绩与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联系在一起。每当获得荣誉，李桓英总是归因于自己赶上了好的国家、好的时代。她动情地说：“我今年整整100岁了，亲眼见证了中国100年的变迁——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一个党来凝聚人心。只有把人心都团结在一起，国家才能干大事，个人也才能出成就。”“流

行病防治是一个高效医疗、有力政府和健康社会共同协力的事业，因为我在中国，我的事业才能这么成功。我只是做了自己应做的事情。”这些深情话语，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崇高的思想境界。

李桓英说：“我国虽然基本上消灭了麻风病，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为了弄清麻风病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李桓英带着研究人员又开始进入分子生物学领域研究麻风菌，努力通过基因分型研究麻风菌传染源和传播链，为“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继续奋斗。

李桓英学成归国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李桓英期颐之年时，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阔步走向伟大复兴。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李桓英，以她的百年经历，亲身见证了中华民族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化。让我们以李桓英同志为榜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求是网，2021年11月19日）

人物小传

李桓英，女，汉族，1921年8月生于北京，中共党员，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生，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194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1946—1950年毕业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卫生研究院，专业为公共卫生和细菌学。

1945年，李桓英从同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细菌与公共卫生专业。1950年，她被霍普金斯大学推荐，到日内瓦刚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作为世界卫生组织首批官员，她被派往亚洲、美洲等许多国家，做防治性病等疾病的工作。1958年，她为了新中国的卫生健

康事业，舍弃国外优厚条件，回国投身麻风病防治工作，长期面对面接触麻风病人，严谨细致开展临床试验，科学稳妥进行治疗研究。1959—1978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主治医师；1978年至今任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她的短程联合化疗卓有成效，后来原卫生部在全国进行了推广，全国麻风病人数量迅速下降，已由1987年的7万和每年发现4000余名病人，分别降至1999年的7000和近2000例。到目前，在云、贵、川的七个地、州，采用短程联合化疗方法治愈的患者，已经达到1万人，经过10年监测，年复发率仅为0.03%，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1%的标准。中国麻风病短程联合化疗的经验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世界卫生组织于1994年开始向全世界推广李桓英他们的做法，认为他们的工作为全球实现消除麻风病这一目标提供了范例和依据。

李桓英同志是党领导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她对党忠诚、热爱祖国，始终心系人民健康福祉，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卫生健康事业；她视病人如亲人，精心医治、破除歧视，为数以万计的病患解除了疾苦；她尊重科学规律、坚守科学认知、勇于探索创新，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鲜明体现了心有大我、赤诚报国的爱国情怀，生命至上、护佑苍生的医者仁心，求真务实、勇于攀登的科学精神。



常香玉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戏比天大，忠心报国

唱戏先做人，无德艺不立。

——常香玉

在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南河渡村常香玉故居，一架名为“香玉剧社号”的米格-15喷气式飞机模型特别引人注目。“这是‘香玉剧社号’飞机模型，是常香玉家国情怀最具代表性的体现……”讲解员为参观者讲述人民艺术家常香玉的一生。

常香玉原名张妙玲，1923年出生在河南巩义一个贫苦家庭，为了

不当童养媳，9岁起随父学戏。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常香玉取百家之长，集豫剧之大成，融合豫东、祥符各调，并吸收曲剧、坠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等唱腔，形成了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常派艺术。

为了让戏“顺民心，反映时代”，常香玉和丈夫陈宪章一起，在改造传统题材的同时，积极演绎现代戏，他们所改编的《拷红》《白蛇传》《大祭桩》等传统剧目，成为常派艺术传世之作；《朝阳沟》《李双双》《红灯记》等现代戏的探索，让常派艺术焕发新光彩。

从艺70年，常香玉共演出剧目100多部，在舞台上塑造了红娘、白素贞、花木兰、佘太君、穆桂英、李双双等经典妇女形象，使豫剧从一个地方戏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

“戏比天大”、德艺双馨是常香玉一生的承诺和追求。常香玉和她带领的剧团一直坚持“三三三制”演出——三个月在农村，三个月在工矿，三个月在部队，为最基层的观众和官兵巡回演出。

1951年，全国上下掀起抗美援朝热潮，常香玉迸出这样一个念头：在全国巡演、义演，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捐飞机。

常香玉的弟子、今年82岁的韩玉生回忆，巡演、义演出发前，常香玉卖掉了剧社的运输卡车，把自己所有的首饰及多年积蓄拿了出来，还把自己的3个孩子送进托儿所。半年时间里，她带领香玉剧社成员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行程逾万里，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这件事，极大鼓舞了当时全国军民的爱国心。

1953年，常香玉又随赴朝慰问团到朝鲜进行慰问演出。1959年，常香玉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香玉剧社号”飞机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成为凡人壮歌的永远见证。

2004年6月1日，常香玉因病逝世，享年81岁。2004年7月，国务院追授这位豫剧大师“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常香玉当选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9月，常香玉荣获“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人去声尚在，清香犹伴人。“常香玉抗美援朝捐献飞机的爱国义举，一直为世人所敬仰；她艺不惊人誓不休的执着、戏比天大的敬业精神，为戏剧界树立了一座丰碑；她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南河渡村支部书记张继伟说。

如今，常香玉故居，这个由四孔窑洞、三间平房组成的农家院落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有上万人前来瞻仰、学习。

（史林静，新华社2021年6月1日）

人物小传

常香玉原名张妙玲，1923年生于河南巩义，9岁起随父学艺，练就了“吐字重而不死，轻而不飘”的绝功。2004年被追授“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荣获“最美奋斗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称号。

“戏比天大”是常香玉一生的座右铭，她视艺术为生命，始终怀着对民族戏曲艺术的炽热情感，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民族戏曲事业。她让豫剧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不仅唱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而且走出了国门，拥有亿万观众和戏迷。她博采众家之长，集豫剧之大成，把豫东、豫西、祥符、沙河、高调五大豫剧声腔派系熔于一炉，而且广泛采撷了河南曲剧、越调、京剧、昆剧、河北梆子及河南坠子等剧种和曲艺的声腔技巧，形成了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常派艺术。

1951年夏，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潮。半年时间里，常香玉带领

香玉剧社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义演捐款金额达 15.2 亿余元，完成了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常香玉和她领导的剧团一直坚持“三三三制”演出：三个月在农村，三个月在工矿，三个月在部队，为最基层的观众巡回演出。

2003 年底，80 岁的常香玉身患癌症在北京住院。当得知奥林匹克中心工地有一场专门慰问河南农民工的演出，她拔掉输液管，戴上发套遮掩住化疗后稀疏的头发，在家人的搀扶下登上舞台：“只要站得起来，我就要来现场，哪怕说几句话也行。”不顾身体虚弱，她清唱了一段《柳河湾》，成为她一生舞台生涯的绝唱。



龚全珍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劳动模范
最美奋斗者

坚守爱与信仰的本色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民教师，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为党工作，就应该活到老，学到老，绝不居功自傲，还要学习，还要努力。

——龚全珍

龚全珍（1923年12月—），山东烟台人，中共党员，西北大学教育系毕业。开国将军甘祖昌夫人、江西省萍乡市南陂小学原校长。1957年8月，龚全珍随甘祖昌回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务农并一直从事乡村教师工作。离休后，又扶贫助学，

开办“龚全珍工作室”服务社区、群众。著有纪实作品《我和老伴甘祖昌》。2013年9月，龚全珍获得“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称号。2014年2月，荣获“感动中国”2013年度十大人物。2016年，龚全珍当选江西省首届“感动江西十大教育年度人物”，龚全珍家庭被表彰为“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年逾九旬、有着60多年党龄的龚全珍，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随将军回乡，扎根基层，淡泊名利，甘于清贫，一生奉献。

龚全珍的先进事迹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学习龚全珍，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是一面旗帜，树立榜样，感召众人；一面镜子，警示自己，正人衣冠。

9月29日，记者在江西南昌见到了龚全珍老人。3天前，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向龚全珍老人表示致敬。老人深情回忆说，总书记对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老一代人非常尊重，特别强调弘扬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我们这代人要继承，还要一代一代地传承发扬下去！

一位老人、一本日记、一系列报告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江西省掀起了学习龚全珍同志先进事迹、争做为民务实清廉表率的热潮，照镜子找差距，定坐标明方向。在这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土地上，龚全珍老人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反对“四风”、服务群众的对照镜子和学习榜样。

一部生动的教材

“对比龚老，倍觉震撼，倍感差距，倍受教育”

瞻仰革命烈士纪念馆、聆听龚全珍事迹报告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记系列讲话……9月25日，江西省委常委会及省级干部进行了一天内容丰富、意义深刻的集中学习活动，用理论的镜子、历史的镜子、典型的镜子，深挖细找“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改进工作作风的努力方向。

在龚全珍先进事迹报告会现场，不少人心潮澎湃、泪光盈盈。

今年4月1日，刚到江西工作不久的省委书记强卫，专程到萍乡市莲花县登门看望龚全珍。在与龚全珍的一次对话中，强卫真诚地说：“这几天，媒体都在宣传您的事迹，我对您的精神和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要向您学习！”

典型就是旗帜，榜样就是力量。6月27日，江西省委下发《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开展向龚全珍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全省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龚全珍同志先进事迹。专题学习会、报告会、座谈会、“信仰的力量”大讨论……江西上下迅速掀起宣传龚全珍、学习龚全珍的热潮。

《龚全珍日记选》单行本7月初出版，8月底再版，在读者中反响强烈。江西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龚全珍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展开巡回宣讲，每场报告会座无虚席，直接受众达万余人。

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刘平听完报告会激动不已：“对比龚全珍老人这个身边的榜样，倍觉震撼，倍感差距，倍受教育。回想自己在机构改革、职能调整过程中的思想波动，心中十分惭愧。”

曾经得到龚全珍悉心帮助的彭艳峰，如今已是萍乡实验学校教师，她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回报龚奶奶的关爱：“我要像龚奶奶一样当好一名人民教师，把龚奶奶传递给我的精神力量传给我的学生，不断地传递下去。”

一场信仰的接力

“省委领导带头，机关作风有了大改变”

为党工作是本分，离休不等于离岗。龚全珍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生价值，信仰的力量把爱倾洒在赣鄱大地的青山绿水间。

有一回，龚全珍买了几百元钱的书，自己坐车送到鳊村中学。校长不在，她放下书就走了。第二天，校长打电话感谢，表示想在学校补办一个捐书仪式，她一听就拒绝了。老人说，自己做这些事都是应该的，不喜欢搞形式、做表面文章。

避免形式主义，学以致用是硬道理。江西省委常委会带头以龚全珍为镜，边学边查边改。两个多月来，在省委常委会开展的“下访听诉、排忧解难”接访活动中，13位省委常委走进各级信访局，深入农村、社区等基层一线，面对面接触群众，心贴心倾听诉求，倾力为民排忧解难。省委常委会以边学边查边改的实际行动，向全省人民表明了正视问题、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决心，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作出了表率。

9月27日至28日，江西省委常委班子召开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省委书记强卫带头发言，“开展自我批评向我看齐，开展批评向我开炮”。大家深入剖析，敢于揭短亮丑。

紧握信仰接力棒，顺应时代新要求，江西把征求意见建议的范围拓展到互联网上，直接面对众多网友“拍砖”“吐槽”。省委、省政府领导分别走进直播室，开展“省委书记与网民面对面”等在线交流活动，几百件网友反映的问题意见，逐一得到处理并在媒体上公布结果，不少困扰群众生产生活的民生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省委领导带头，机关作风有了大改变。”江西省发改委主任李安泽

说，“原来是坐在机关等别人求上门来，现在处室主动上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围绕项目审批、资金安排、价费管理三个权力较集中的领域，江西省发改委共取消7项审批事项，下放24项审批事项，累计为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37件，答复问题66件。

一座精神的标杆

“向龚全珍学习，加强党性修养，用良好党风带动社会风气改善”

2009年2月19日，龚全珍在日记中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一次剖析：“记得20世纪50年代，民政局给祖昌送来一个伤残证，等民政局的人一走，祖昌就撕掉这个伤残证，说：‘国家给我的钱够多了！’在乡下，他打针吃药的单据自己报销，还拿出他工资的大部分支援农业。我这个离休干部为党做了什么？真十分惭愧！”

几十年来，龚全珍就是这样，以甘祖昌将军为榜样，不断净化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言行。她说：“祖昌就是我的镜子，我经常反省自己哪里做得还不够。”

30年间，没有人记得龚全珍去了多少学校，讲过多少课，但都记得，她从不要一分钱报酬，还经常自带馒头，就着白开水当午餐。龚全珍扶贫济困慷慨大方，自己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乡亲们说，这么多年很少见她买过新衣服，没见过她吃过什么高档营养品。

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在向身边的模范看齐中汲取营养、得到教益。“龚老的严格自律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江西省财政厅厅长胡强说，江西正逐步推行对差旅费、会议费、公务接待费公务卡结算，切实做到“阳光操作、阳光监督”。对无计划、无预算、无编制的购置申请，不予办理

政府采购手续。严格执行办公用品定点采购，接待、会议、出差定点饭店，公务用车定点加油和维修等制度，有效降低行政成本。

“向龚全珍学习，加强党性修养，用良好党风带动社会风气改善”。龚全珍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的示范效应，正在赣鄱大地凸显、传播。在莲花县琴亭镇金城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已经开始协助龚全珍工作室开展服务。共青团江西省委决定，将在更多领域成立以龚全珍命名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把龚全珍的崇高精神发扬光大。

龚全珍树起了一座精神的标杆。龚全珍的价值坐标中时刻高悬着这面无形的“铜镜”，为党员干部照出差距，照足动力，照亮信仰。

（吴齐强，《人民日报》2013年9月30日）



人物小传

龚全珍，女，汉族，1923年12月生，中共党员，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甘家小学原校长。她是开国少将甘祖昌同志的夫人。

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后考入西北大学教育系。大学毕业后在新疆军区子弟学校当人民教师。任教期间，经过介绍，她和开国少将、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的甘祖昌相识并结婚。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跟随丈夫回到了江西萍乡莲花老家，扎根山区当“农民”。1961年，龚全珍到同乡的南陂小学任校长。此后一直无怨无悔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投身教育，爱心奉献。离休后，又扶贫助学，开办“龚全珍工作室”服务社区、群众，著有纪实作品《我和老伴甘祖昌》。

2013年9月，龚全珍获得“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称号。2014年2月，荣获“感动中国”2013年度十大人物。2016年，龚全珍当选江西省首届“感动江西十大教育年度人物”，龚全珍家庭被表彰为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于
漪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改革先锋
最美奋斗者

“让生命与使命同行”

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

——于漪

9月8日下午，上海浦东新区竹园小学。92岁的于漪腰背笔挺、声音洪亮，她在为浦东新区基础教育工作者讲课，一讲就是45分钟……

躬耕教学事业70载，她这样理解当老师：“教师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我22岁大学毕业出来做教师，

至今不敢有丝毫懈怠。”

于漪，我国语文特级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改革先锋”、“人民教育家”“最美奋斗者”。面对赞誉，她说：“我只是克勤克俭做了一些工作，说到底就是坚守了一个新中国教师的本分。”

“每天早上走一刻钟的路，我就在脑子里‘过电影’”

1951年，于漪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最初教历史，后来转岗教语文，开始的语文课并不成功。听于漪讲罢课文《普通劳动者》，坐在后排听课的组长徐老师有些失望：“你虽然在教学上有许多优点，不过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呢。”

“b、p、m、f不认识，汉语语法没学过”，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于漪不服输，“那时候，我每晚9点前工作，9点后学习，两三年下来，把中学语文教师该具备的语法、修辞、逻辑知识，该具备的文、史、哲知识，该了解的中外名家名著过了一遍”。

为了摸索教学的门道，于漪常站在窗户外“偷师”别的老师。“我开始尝到庖丁解牛的滋味”，备课时，她把要说的每句话都写下来，然后像改作文一样修改，之后再背下来、口语化。“每天早上走一刻钟的路，我就在脑子里‘过电影’，这节课怎么开头、怎么铺展开来、怎样形成高潮、怎样结尾。”从宿舍到学校的路上，于漪不知多少次边走边琢磨。

靠下苦功夫，“不入门”的于漪成为行家里手。1977年，电视里直播了一堂于漪执教的语文课《海燕》，人们争睹她上课的风采，成为一时热议话题。也是那一年，于漪带教的两个原本底子薄弱的毕业班，创造了整班考取大学的成绩。

“我不断地反思，一辈子上的课有多少是教到学生心中的”

1985年，于漪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校长。那时，老师们出勤稀稀拉拉，有的学生涂脂抹粉，甚至赌博、酗酒也时有发生……师范学校，培养的是未来的老师啊！于漪大刀阔斧，实施了一系列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的举措：教师实行坐班制，学生剪长发、穿校服，全校开展“什么是当代师范生真正的美”专题讨论。

“那时穿校服是件新鲜事，女生们都很抵触。于校长知道后，就鼓励我们学生参与设计、决策校服款式。”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工作党委副书记、教育局局长卜健笑着回忆。

教师、师范生“两代师表一起抓”！学校风气渐渐变了，“一身正气，为人师表”成为全校共识。后来，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一跃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龙头学校。

“我不断地反思，一辈子上的课有多少是教到学生心中的。”于漪一字一句地说。这些年来，作为班主任，她将“差班乱班”带成了先进集体；作为校长，她使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成为全国先进；作为导师，她培养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教学能手。

“我甘愿做一块铺路石，让中青年老师‘踏’过去”

“教育质量说到底是教师质量。再忙再累，不能忘记自身的修为。”今年教师节前夕，面对台下的年轻教师，于漪循循善诱。这位鲐背之年的老人讲课全程脱稿、思路清晰，工作人员放在她背后的靠垫完全没派上用场。

不但给学生当老师，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于漪就给老师当老师。“我甘愿做一块铺路石，让中青年老师‘踏’过去。”于漪首创了师徒“带教”方法——师傅带徒弟、教研组集体培养、组长负责制，通过研学一体化促进教师成长。

做“大先生”！于漪总是这样勉励年轻的老师们：“什么是教师？教师就是给学生点亮人生明灯的，自己首先要心中有太阳，努力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她这样理解“大”：“中国人造字妙不可言。‘大’就是一个人张开双臂拥抱祖国、拥抱人民、拥抱世界，做‘大先生’就要有这样的气派、这样的格局。”

于漪有一句名言：“让生命与使命同行。”累吗？于漪说：“当我把生命和国家命运、人民幸福联系在一起时，我就觉得我永远是有力量的，仍然跟年轻人一样有壮志豪情！”

（张烁、刘颖、汪哲平，《人民日报》2021 年 9 月 15 日）



人物小传

于漪，1929 年 2 月出生，1951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196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漪老师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1978 年被评为“首批语文特级教师”，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多种荣誉称号，首批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10 年 9 月，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接见。

于漪一直站在教育改革的最前沿。从 1951 年走上教师岗位至今，从上海首批语文特级教师到班主任，再到校长，于漪一直奋战在教育教学第一线。她开了近 2000 节公开课，发表 600 余万字的论文专著，许多重

要观点被教育部门所采纳，近50堂公开课已作为教师教学研究和培训的经典，她的名字和语文课与中国的基础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当代语文教育史上，于漪曾提出两次重要的语文教育改革思想：1978年提出的“教文育人”观点，对当时的语文教育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她的“教文育人”的思想，以“全面发展的人”为培养目标，构建了以“思维训练”为核心的语文教育理论，有力推动了语文教育由“语言—文字”型教育到“语言—思维”型教育这一划时代转变的实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于漪又旗帜鲜明地在《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一文中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特点”这一观点，在语文教育界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推动了语文教育界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新一轮讨论，并使这场讨论最终在“人文性”上达成共识，写入教育部新颁发的全日制初中、高中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她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共“带教”100多名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涌现了像程红兵、陈军、陈小英、王缨、谭轶斌、朱震国、黄荣华、费秀庄、陈爱平、兰保民、孙宗良等一批教学能手，被誉为“精心育人的一代师表，潜心教改的一面旗帜”。2018年12月，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曾任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的于漪获得“改革先锋”奖章，成为100名获得者中唯一一名来自基础教育界的代表。2019年9月17日，于漪又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退休后，她还写下了400多万字的教学论文，出版了《于漪全集》，成为新中国首部中学教师出版的全集。



申纪兰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对党忠诚，执着为民

共产党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立党为公，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申纪兰

去年春节，申纪兰的孙子张璞带着妻子，回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乡西沟村的老屋过年。那几天，太行山里大雪纷飞，一夜之间，西沟两侧的石山裹上了厚厚一层雪衣。一大早，家家户户都在扫雪，张璞三下五除二就把院子打扫干净。

过一会儿，申纪兰出来扫了一

眼，发现院里小房屋顶的雪还没扫，便催促张璞，他有些不情愿：“我要是上去，保准能压塌了……”当时90岁高龄的申纪兰斩钉截铁地说：“你要是不去，我自己上去！”说罢，架着木梯子就要往上爬。张璞赶忙拉住了奶奶，爬上屋顶把“尾巴”清理掉。

她对孙子讲——

“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你要更努力”

每年过年，张璞都会回村里过年。每年过年，他也都会主动去扫雪，这几乎成为一种习惯：因为“小时候，奶奶扫完自己家的，顺手就扫到别人家去了，再过一会看时，一条巷子都扫出来了”。

张璞熟悉西沟村的一草一木。上小学时每年寒暑假，他都会回西沟村。他假期在西沟村的生活节奏很紧张：天不亮，申纪兰就会叫着他的小名，把他从床上揪起来；每天要跟着奶奶下地或在院子里干活。到了晚上，申纪兰还要求张璞写日记，写完之后还要读一遍给她听。

多年来，人们熟知申纪兰平时坚持抄写学习重要文件，即便后来眼睛看不清时，也要专门打印放大字号，逐字逐句学习。这种严格的自律，这份踏实和执着，申纪兰一直没变。

6月28日，申纪兰因病逝世，享年91岁。6月30日，在申纪兰的追悼会上，孙子张璞紧握记者的手，泣不成声。

张璞在太原读大学时，申纪兰也常去太原开会，每次总会抽空去看他，见了面，“时间有限，话也不多，只问问学习怎么样，和同学们相处得如何”。一开始，同学们知道张璞是申纪兰的孙子，免不了让他有些得意，申纪兰总会提醒他：“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你要更努力。你要比别人强，就要比别人忙；要想学得好，就要比别人起得早。”

张璞的工作单位是平顺县商务中心。奶奶对他的日常问询内容，变成了“你帮老百姓在网上卖了多少东西”。张璞跟奶奶之间有一种默契，即便申纪兰最后躺在病床上，点点头，张璞就知道奶奶想听他说什么。

张璞更知道，奶奶对自己和身边人很严，但严中带着爱。每次申纪兰看他时，都会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把香蕉，这是他打小就爱吃的。有一次，申纪兰在北京开会，张璞正好去北京出差，就跑到宾馆看望奶奶，老人从包里拿出两根香蕉递给他。在那一刻，申纪兰是一个万般疼爱他的奶奶。

她对村支书讲——

“穷家难当，能省一分是一分，攒多了就好办事”

西沟村一直是申纪兰的家。申纪兰的生活工作习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乡亲们。6月29日，记者再次来到西沟村，申纪兰办公室在三楼，那把已磨得黄色海绵都露出来的皮椅还在那里，她生前常用的杯子也摆在桌上，旁边几封各地寄来的邮件还没来得及拆封。

平顺县纪兰文化研究院主任张娟近八年来一直在申纪兰身边。她告诉记者：“最近几年，申纪兰每年出去讲党课、做交流近百次。”大部分时候，邀请方都会给我俩安排好单独的房间。“申主任每次都说‘不要浪费那个钱，住一屋就行’。”

同样的情形，西沟村妇女主任郭广玲也记忆犹新。那是2006年，她和申纪兰一起去县里开会，为了节省一间房，申纪兰硬拉着她挤到一张床上。“好几天过后我才知道，申主任每天早上醒得早，但是怕吵醒我，都没敢怎么翻身。”

直到今年6月27日，她还把村支书郭雪岗叫过来，对他说：“要记

住勤俭节约，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穷家难当，能省一分是一分，攒多了就好办事！”

今年4月，在山西长治开会时，申纪兰身体状态已经不太好。会场设在三楼，张娟考虑到她行动不便，打算安排她坐轮椅，申纪兰知道后狠狠批评了张娟。张娟回忆说，她上楼走得很慢，上个台阶都要歇一会，但开会的时候，却是最早到会场的。

每个见过申纪兰的人，都会记得她那双手，长满老茧、大而有力。三年前记者采访她时，她还曾和记者掰手腕。那是她年轻时战天斗地搞绿化手，是一双写满艰苦奋斗、敢于和贫困斗争的手。

申纪兰生命最后的几周里，张璞去看她时忍住泪水，像往常一样用力击掌三下，喊着“奶奶，加油！”申纪兰听到后，也在病床上鼓掌和孙子呼应。

申纪兰年轻时和男劳力比赛劳动，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进宪法的事迹人们耳熟能详，她一辈子就是这么干过来的。去年秋天，申纪兰仍坚持自己下地收玉米。郭雪岗说，你们去看看她村旁的那半亩地就知道了，她下的功夫深，对田事操心，庄稼就长得好。记者看到，这片地里的玉米已经长起来了，但今年秋天，成熟的玉米却等不到它的耕种者来收获了。

她牵挂着一件事——

把自己的共和国勋章经费交作党费

再次走进西沟村，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能看到申纪兰的影子。

乡镇干部李海霞2018年才到西沟乡工作。她清楚地记得，前年冬天从村里回来时，已经过了饭点。西沟的冬天异常冷，申主任那双大手握

住她的手，让她觉得很暖和：“孩子，看你冻成啥了？”申纪兰知道她没吃饭，又从兜里抓出一把“炒琪”塞给她。

炒琪，是晋东南的一种小吃，东西虽“土”，但饱含情谊。张璞说，奶奶就是这样的性格，总能用她独特的方式关心着大家。

论辈分，今年72岁的张相和管申纪兰叫婶婶。张相和肺上有老毛病，前些年住院时，是申纪兰把他送到当地的和济医院，又去专门看望他。张相和说，在西沟村，村民生病住院，申纪兰会去看望或者帮忙联系医院。

西沟村老支书王根考5月上旬去长治市人民医院看望申纪兰。当时，申纪兰强撑着坐起来，一把抓住他的手，再三询问村里的事情。王根考几次起身要走，都被申纪兰留住。王根考去年做过大手术，是申纪兰帮他联系的医院，他回来后，申纪兰还专门去看望他。病床上的申纪兰若无其事地笑了笑：“我没事，过了这个劲，还要回去。”

那天之后，申纪兰真的回了一趟村。也许是她觉察到了什么，今年全国两会前，她主动提出要回去和西沟村的乡亲们再聊一聊。那也是申纪兰最后一次和村两委的人座谈，郭广玲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她重复了两遍的话：“团结一致，好好发展！”在村里开完座谈会后，申纪兰前往北京，坚持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临终时，申纪兰还牵挂着一件事：去年获得共和国勋章后，每个月她都会收到一笔经费。她本想带着张娟把这笔钱交作党费，但最终没有成行；她又嘱咐张璞，要替她完成这个心愿。

（詹彦，《人民日报》2020年7月3日）

② 人物小传

申纪兰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2009年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长治平顺县，17岁嫁到了同县的西沟村。

1951年，为了促进生产，让全村人吃饱肚子，劳动模范李顺达联合几个互助组成立了合作社。生产规模扩大了，只靠男劳力已完不成生产计划，李顺达提出让申纪兰担任副社长，发动妇女一同参加劳动。

妇女们参加劳动以后，遇到了一个问题：干同样的活，得的工分却比男社员少。在申纪兰的提议下，女社员开始跟男社员学技术，比撒肥，比间苗，比锄苗，样样不落后。经过多次争取，妇女们终于能够干一样的活，得一样的工分。

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西沟村妇女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事迹，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年，李顺达与申纪兰双双被评为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毛主席在接见妇女代表时，高兴地和申纪兰握手，说：“很好，你是农村妇女的带头人，妇女是半边天，你这个头带得好。”

1954年，申纪兰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入了新中国的宪法。此后，连任11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她，成为共和国民主进程中的一个传奇，并被外国友人称为资格最老的“国会议员”。

1973年，申纪兰被调任山西省妇联主任，她决定，“不领工资，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坐专车”。10年后，任职期满的申纪兰回到了西沟，为农民们寻找新的致富方向。

2020年6月28日凌晨，申纪兰在山西长治逝世，享年91岁。



解秀梅

唯一一位荣立一等功的志愿军女战士

唯一女志愿军一等功臣

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为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捍卫世界和平而战斗到底！

——解秀梅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果断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历史性决策后，成千上万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热烈响应这一伟大号召，以饱满的爱国热情踊跃踏上了朝鲜战场，其中也包括一些志愿军女兵。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同千千万万英勇作战的男将士

们一样在朝鲜战场上不畏艰险忙前忙后，出生入死，她们有的在文工团做宣传工作，有的在战地医院救护伤员……在看似平凡的岗位上却为最终赢得胜利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在尽人皆知、广受喜爱的电影《英雄儿女》中，就有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英雄王成的妹妹王芳在前线慰问中，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危急时刻，王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战友老李同志，而她自己却受了重伤。更感人的是王芳那曲“风烟滚滚唱英雄”的《英雄赞歌》响彻中华大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人们知之甚少的是，在朝鲜战场确实发生过类似典型举动与历程的事情，她就是志愿军女战士——解秀梅。解秀梅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的真实原型。不仅如此，而且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前后总共产生了154名一等功臣，解秀梅则是其中唯一的女战士，可谓一名顶呱呱的巾帼英雄。

宣传救护处处作表率

解秀梅，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于堤村人。13岁时，当了村剧团演员。1948年8月，参军后一直在部队文工队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解秀梅踊跃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朝鲜战场。

当时的解秀梅只是一个20岁的女孩子，却有着超强的意志品质。在艰苦的行军中，解秀梅紧跟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可是她从不叫苦，总是主动热情地将战友们的米袋、背包等抢过来，乐呵呵地放在自己尽管已很疲惫的肩上。长途行军，这样一个年轻女孩以自己的点滴行动，展现出一个战士最优秀的品格和最顽强的毅力。

作为一名文工队成员，解秀梅时刻不忘给行军的战友们加油鼓劲，

常常不顾自己的一身疲惫，和同伴们一起赶到队伍前面，充满豪情地打起快板搞宣传，战友们看着她们充满活力的宣传鼓动、激情演出，忘记了疲劳，精神更加振奋，加快了行军的脚步。解秀梅还和文工队的战友把英雄们不畏强敌、英勇作战、忠于祖国的事迹编成故事、快板和唱词，为大家表演、歌唱，鼓舞了大家的战斗意志。尤其是在爬山和行进途中遇到非常困难的时候，解秀梅等送上的如此演出，像久旱突逢甘雨一样，所传递出的乐观向上的精神刹那间感染了每一位战士，在最关键的时候鼓舞了他们的斗志。

除了行军打仗之外，文工队员常常要穿过敌人的封锁，深入阵地，为战士们演出，也总会遇到突发的危险情况。据说有一次，解秀梅和其他队员刚准备进行演出，就遭遇敌机的轰炸，人员虽然没有受伤，可是仅有的简陋乐器都被炸飞炸坏了。即便如此，队员们也从不气馁和沮丧，而是在敌机飞走后，就拿起碗筷、脸盆等当乐器，投入宣传鼓动工作中，一边敲一边唱。

解秀梅自编自演的节目备受战士们的喜爱，一首生动朴实却脍炙人口的《小快板》这样唱道：

路程 70 里，小伙咱们比一比。背的东西不算重，50 斤重称得起，走起路来快如风。叫同志，你来听，号角响起炮声隆。叫同志，你莫停，到战场上要立功，消灭鬼子援朝鲜，留取丹心照汗青，照汗青！

如此生动精彩的节目，十分贴近战斗生活，对于行军作战的战士们而言，如同给他们服了一剂灵丹妙药，很快就能够消除疲劳，振奋精神，提高斗志了。

每到宿营地，解秀梅还不知疲倦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烫脚、缝补衣物、上山砍柴，忙个不停。每当粮食供应不上时，她还不辞辛劳地去四处挖野菜，为战士们充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保障工作。

就这样，在连续 18 天的急行军中，解秀梅自己克服困难坚决不掉队，还总是团结和帮助战友们，深受大家的称赞。

不久，解秀梅被上级调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68 军 202 师政治部文工队，分在战地手术所，具体帮助开展救治与护理工作。在危险四伏的前线手术所里，解秀梅忘我地投入对伤员的救护中，倾注着全部心力。

没有办法冲到最前线去奋勇杀敌，解秀梅却也从未轻松过。为了救护前线退下来的伤员，迅速处理伤口，她常常几天几夜不合眼，精心照料、护理，好让他们尽快伤愈之后能重新扛起枪炮上战场、多打敌人。朝鲜的冬天极其寒冷，风雪交加，凛冽刺骨。每当有伤员抬来的时候，她看见伤员脚冻了，就急忙把伤员的鞋脱下去，用手握住伤员冻得冰冷的脚；手凉了，她就想法子再把伤员的脚放在自己的袖筒里。

有一次，一位战士为了追击敌人跑起来方便，在冰天雪地里换上了胶鞋。在战斗中这位战士不幸受伤后，由于天气寒冷，他的脚与鞋袜冻在一起，没法脱下鞋袜救治。解秀梅看见后十分心疼，她毅然解开自己的棉袄，把伤员的脚搬到她自己的怀里给伤员温暖。“情到最真已无言”，解秀梅的举动使在场的伤员们既惊讶又感动，他们纷纷和她握手，表达杀敌决心。其中一位年轻的战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他握着解秀梅的手激动地说：“是您保住了我的双脚，伤愈后，我还要回到前方英勇杀敌！”

面对着这些奋勇杀敌却不幸挂彩的战士，解秀梅满怀心痛和焦急，她总是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心血去照料他们，也会给伤员们表演节目，来缓解他们焦虑的心情。师政治部根据解秀梅的行军表现评她为“行军模范”。

奋不顾身勇救伤员

前线手术所是很危险的地方，但解秀梅从未顾及过个人安危。

解秀梅遭遇在战场上最严重的危机，发生在一次战役的撤离之际。那是1951年11月30日下午，解秀梅刚刚从山上打柴回来，忽然遇到了9架敌机来势凶猛的投弹袭击。敌机在志愿军病房附近投下炸弹，手术所的房子被炸得燃烧起来，被大火包围了，敌机仍在接二连三地低空俯冲。数不清的房屋被炸毁，空气中是飞扬的尘土和硝烟，死亡又一次逼近这些战士。

所有的人员都在最短的时间内转移，大家在帮助一个又一个伤员陆续转移后，才忽然发现，还有一名同志不在其中，那就是身负重伤的605团排长李永华。当得知李永华没有转移的情况时，解秀梅便不顾一切地冲进熊熊大火的屋子。她冒着被滚滚浓烟和肆虐火舌吞噬的危险，很快把李永华背了出来。

刚出门外三四步，“嘭、嘭”，两个汽油弹落在手术所的房顶上。顿时房子被冲天大火吞没，火星溅了他们一身。解秀梅急忙扑灭了李永华身上的火焰，背起他就跑。这时，敌机更加疯狂起来，成串的炸弹惊天动地般落在他们的身前和身后。李永华生怕在这种万分危险境地里自己连累了她，便急促地催她：“快放下我，赶紧隐藏，别为了我，让你也负了伤！”解秀梅一心要将李永华救出去，始终咬紧牙关向前。她全然不顾自己的性命，坚决地说：“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

随着解秀梅背着李永华艰难匆匆向前，只见山上烟火弥漫，什么也看不见，冲出一段路后解秀梅背着伤员磕磕绊绊中不慎摔倒在地。路过的房子火光冲天。敌机还在不停地轰炸……衣服着火了，解秀梅急忙将

火扑灭，背起李永华又继续往前奔跑。敌机发现了他们，对准他们俯冲轰炸起来。

在撤离的最后时刻，突然，一颗炸弹直向解秀梅的头顶上落下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解秀梅马上放下伤员，转身迅速把李永华压在了自己身下，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以免他遭受伤害。

炸弹投下来后，气浪冲天，乌烟瘴气，飞起的碎石和土块把他们埋了起来。解秀梅的棉衣棉裤被打破好几处，胳膊也受了伤，手上流满了鲜血，李永华却安然无恙。

解秀梅顾不得伤痛，奋勇爬起来，又背起李永华使尽全力赶快向前跑……终于把李永华背到了山地防空洞。当看到伤员此刻安全了，她欣慰地露出笑容。李永华得救了，解秀梅却浑身无力地瘫软在了地上。

战友们将李永华和解秀梅二人撤回安全区，李永华得救了，解秀梅的伤势也很快好转。解秀梅舍生忘死勇敢救出重伤员的英雄事迹，在朝鲜战场上广泛传颂。

屡获崇高荣誉，受到两国元首接见

1951年，解秀梅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等功”英雄荣誉称号，同年，经过战火的洗礼与考验，解秀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2年1月18日，解秀梅作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成员，回国汇报。5月2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解秀梅荣幸地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解秀梅被安排了一项光荣幸福的任务——负责向毛泽东主席献花。她手捧鲜花，眼里含泪，心里满是抑制不住的激动，看着毛主席那高大伟岸的身躯，解秀梅感到在战争中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十分值得。她激

动地对毛主席说：“我们志愿军全体将士向您问好，祝您健康！”毛主席高兴地回答：“谢谢，祝你们胜利。”并且欣然为解秀梅题字留念。

在回国后的4个多月里，解秀梅和代表团在全国各地的1054个县、市，先后为510万人做了数千次报告，全国各地给她寄来的慰问信达1300多封。在家乡于堤村，6000多人专门召开庆功大会，省领导将“人民功臣”的珍贵荣誉牌匾，庄重醒目地悬挂在了解秀梅家门口。

1952年5月25日，女战斗英雄解秀梅斗志昂扬地重返朝鲜战场前线。10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在平壤隆重召开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紀念大会。解秀梅作为志愿军代表，荣幸地向金日成举杯敬酒，金日成亲自宣布，授予解秀梅朝鲜最高荣誉勋章——国旗勋章。

在继续与广大志愿军将士并肩作战以取得完全彻底的最后胜利之际，解秀梅难以忘怀党和祖国给予自己的如此崇高荣誉，衷心感谢毛泽东主席对广大志愿军的关怀与鼓励，在新年到来之时，她夜不能寐，心潮澎湃，提笔向毛主席写去一封贺年信，兼向毛主席做自己工作战斗的汇报，并决心誓死捍卫和平。

敬爱的毛主席：

伟大的一九五三年来临了。我在遥远的朝鲜前线向您致战斗的敬礼！祝您新年身体健康！

亲爱的毛主席：向您写这封贺年信，又引起了我那生平最值得纪念的回忆：去年一月间，我随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回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五月二十三日那天，您在怀仁堂接见了我们。在同志们的欢呼中，我跑上前去向您献花。我紧握着您的手说：“毛主席！志愿军同志们问您好。”“好，谢谢同志们！”您慈祥地微笑着回答。您热情有力地和我握

手，使我全身充满着温暖。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下子就扑到了您的怀抱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时我用洒湿了您胸襟的热泪，表达了我和志愿军同志们对您说不出来的热爱。从那以后，您那伟大的形象愈加有力地活在我的心坎里了。回到前线后，我们把您对我们代表团讲的话，详尽地传达给战友们。同志们无数次地为您的健康而欢呼鼓掌。大家并一致坚决表示：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为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捍卫世界和平而战斗到底！

毛主席，我还要报告您一件事情：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的时候，我随志愿军许多战斗英雄们到平壤参加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召开的庆祝大会。会上，我们见到了金日成将军，我并请金日成将军给签了名。许多朝鲜高级首长在讲话中都说：朝鲜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正义的国际援助分不开的。会场上不时掀起毛泽东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毛主席！当时我们越发感到了您的英明和伟大，我自己深深为做一个毛泽东的战士而感到无限的骄傲与光荣。

毛主席，在您的正确领导下，一九五二年我们祖国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朝鲜前线，我们同样取得了比过去更大的胜利。正当我们庆祝胜利的时候，您派来的祖国人民慰问团到达了朝鲜前线，又给我们增加了极大的鼓舞和力量。胜利的一九五二年过去了，祖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一九五三年就将开始伟大的经济建设了。相信在您和祖国人民的努力之下，一定会迅速获得辉煌的成绩。我们保证在朝鲜前线更加英勇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用实际行动来保卫祖国的生产建设，保卫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一等功臣

1954年，解秀梅随同广大志愿军将士，浩浩荡荡凯旋。

解秀梅的事迹，曾经多次在国内各大报刊广为宣传报道，还被编成了歌剧《解秀梅》。著名作家巴金根据解秀梅及其他英雄模范的事迹和经历，创作了小说《团圆》。不久后，小说改编成优秀影片《英雄儿女》，打动了千千万万的观众，影响了几代人。有资料曾提及，与影片《英雄儿女》中的情节相似的是，解秀梅的英雄事迹传遍朝鲜战场后，她的父亲解铁又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代表赴朝，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父女俩惊喜相见。

1956年，解秀梅转业，随丈夫来到徐州，任徐州市鼓楼区团委书记。1970年，解秀梅调到山东省临沂任国棉八厂副厂长、副书记。1976年，解秀梅随丈夫调到石家庄，任兴华印刷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1996年1月30日在石家庄因病逝世，被安葬在了双凤山革命公墓。

“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为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捍卫世界和平而战斗到底！”这是解秀梅给毛主席的信里写到的话。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前半生舍身报祖国，后半生居功不自傲，解秀梅的一生，的确是无愧于“人民功臣”的称号的。

（孟红，人民网2020年10月20日）

人物小传

解秀梅（1932—1996），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于堤村人，1951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被编入第20兵团202师，任师政治部文工队队员。

在朝鲜战场上，解秀梅舍生忘死勇敢救出重伤员，她的事迹被编排成了歌剧《解秀梅》。著名作家巴金根据解秀梅及其他英雄模范的事迹和经历，创作了小说《团圆》。之后，小说又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打动了千千万万观众，影响了几代人。

1952年1月18日，解秀梅作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成员，回国汇报。同年5月2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解秀梅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负责向毛泽东同志献花。1952年5月25日，解秀梅重返朝鲜战场前线。10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在平壤召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纪念大会，她作为志愿军代表向金日成敬酒，金日成亲自宣布，授予她国旗勋章。1953年随志愿军回国。1956年转业，随丈夫到徐州，任徐州市鼓楼区团委书记。1970年调到山东临沂任国棉八厂副厂长、副书记。1976年随丈夫调到石家庄，任兴华印刷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

1994年，62岁的解秀梅因罹患多发性脑梗入院，后因病情恶化，于1996年离世。



郭兰英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最美奋斗者

“吾为人民唱”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有了我的一切。

——郭兰英

我一辈子跟党走，是党培养的文艺工作者，我自己太渺小了。没有共产党，哪有郭兰英？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人民给的。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是为人民服务的，观众是我的老师。2019年，党和政府授予我“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2021

年是党的百年华诞，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想多做点儿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演过很多戏，一辈子演不够的、最爱的还是《白毛女》。《白毛女》改变了我的的人生，带我走上革命道路，彻底改变了我对艺术的理解。

看完戏，内心还在掉眼泪

1946年，我16岁，在张家口演晋剧，当时满城都在传“华北联大文工团正在演出的《白毛女》是很好的戏”。其实这是部歌剧，我早就想看，但歌剧是什么，并不知道。

一天，我被安排演最后压轴的折子戏《血手印》，之前是其他演员的戏。我便趁这个机会跑到人民剧院去看《白毛女》。到那儿一看，他们的戏，和我们演的戏不一样。我们演戏就是穿戏装、扮上人物，而他们却和生活中一样，我自然而然就看进去了。

戏一开头就很“拿人”。喜儿和杨白劳的生活和感情，是我幼年时熟悉的。那时我已经演过几年戏了，看戏一般不那么容易激动，可看《白毛女》，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止不住地流眼泪。尤其是杨白劳死前的场景，让我定在那儿，想走，双腿走不了。等《白毛女》第一幕演完了，我才匆忙赶回戏班。演自己的戏时，我心里还一个劲儿地惦记着《白毛女》，内心还在掉眼泪。

《白毛女》在艺术上是相当完整的，是“真戏”。剧本中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唤醒了我朴素的革命觉悟。看完演出后的几天，我的内心始终无法平静。有时耳边响起“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歌声，有时眼前晃动着喜儿的影子，这使我回想起自己多苦多难的家庭和童年生活。心里有了越来越明确的打算：演戏就演这样的戏，当演员就演喜儿那样

的角色！

我抱着这样的想法告别了旧戏班，扔掉昂贵的旧行头，拿了个包袱，在枪炮声中追赶刚从张家口撤走的华北联大文工团。我下定决心——不再做戏班子的“摇钱树”，要做一个扬眉吐气的文艺新战士。

到了文工团，组织安排我学文化、学音乐、学革命理论。记得那时一早起来就扭秧歌，7点便开始安排各种课程，每天如此。累吗？累！但特高兴，觉得特幸福。好不容易参加革命，成为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学写字时，我先学会了“共产党”三个字。

转变最大的，是我的艺术观念。儿时演戏，我根本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戏班里经常挨打挨骂，在外要受地痞流氓的气，曾觉得不挨打、能挣钱养活父母就行。到了文工团，我才逐渐认识到文艺的作用。演戏，从不是为了“人前夺萃”，而是为人民歌唱、为人民服务。从那时起，无论是唱一首很短的歌，还是上台扭几步秧歌，我都全力以赴。

用“心”唱，创造出一个不同的喜儿

在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时，我开始参加《白毛女》剧组，边负责服装、道具等事务，边在乐队里顶个数，拉二胡、打梆子、锣鼓镲，样样都干。慢慢地，我把《白毛女》看会了，每句唱、每句台词、每个动作都烂熟于心。

那时演出，没有像样的舞台。用土垫起来半米高的台子，只要观众能看清楚，就是舞台。回首那段岁月，大家都有股子热情，表演上也总是感情充沛的。也许正是这种真实的表演，迸发更大的艺术感染力，打动着观众。记得下部队演《白毛女》时，常常从天黑演到转天天亮，五个小时，无人离席。台下时常比台上还激动，台上演员斗争黄世仁喊口号，台下观

众也跟着喊……观众对歌剧这样热爱，推动着我们的艺术创造。

1948年，剧组在石家庄演出。一次演出，扮演喜儿的两个演员王昆和孟于都上不了场。团长和导演研究对策时，我自告奋勇去“救场子”。

那是我第一次上台演喜儿。演到最后一幕的斗争会时，我哭得唱不下去了。舒强导演在侧幕提醒我：“兰英，兰英！我们这是在演戏！”戏结束了，舒强导演含泪和我说：“为什么你唱不下去？我能理解。《白毛女》这个戏写得就是你的生活。从今往后好好努力，好好琢磨琢磨喜儿这个角色，你会创造出一个不同的喜儿的！”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舒强导演对我帮助很大，他强调从人物出发，启发我创造人物。他说：“演唱要从心灵出发。如果郭兰英是喜儿，你怎么处理？”我一下就明白了导演的要求。演员在舞台上不能有“在演戏”的感觉，要表现“我就是这个人物”。

每次演喜儿，我都全身心投入这个形象中。我坚信，感动别人前，先感动自己，才可能有独特的艺术创造。比如，在演唱《刀杀我斧砍我》时，我就是那个羞愧难当、悲愤不已的喜儿，在唱到“爹生我，娘养我……”那句时，我不由自主地“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手搓腿、声泪俱下。为什么这个临场加的动作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因为这些动作不是我加的，是喜儿当时的情绪该有的，是喜儿加的。

在琢磨和学习新歌剧的过程中，我也尝试把戏曲的唱功、做功融入其中。比如“逃走”片段，黄世仁和穆仁智追，我就将戏曲程式中的圆场、滑步、趋步等都融在动作里，但要边害怕地看向身后边往前跑，深一脚浅一脚，对生活情态的简单描摹进行升华。

不少演员向我请教声乐技巧。我说：“演员应该用眼睛‘唱’。”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子，用眼睛“唱”就是在用心“唱”。观众看喜儿手拿二尺红头绳，两眼满是喜悦的光芒，观众看喜儿唱到“王大春”，眼中则是

少女的娇羞顾盼。生活积累、表演技巧，缺一不可。最重要的，是感情要从内心流淌出来，要真。观众听的不是声音，是生活，是感情。

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

几十年来，每次接触《白毛女》这个戏，我都感觉像第一次时那么鲜活、那么动人。一次一次挖掘，不断发现新的东西。我时常觉得，我的艺术生命与喜儿的舞台形象，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2015年，年青一代的演员再次复排歌剧《白毛女》。这部来自人民的红色经典，滋养着一代代观众。一代又一代创作者、表演者的传承演绎，又让这部红色经典焕发新的魅力。

现在，不少青年演员都在深入生活，我希望他们下生活的程度再深些、范围再广些。做个有心人，留心观察日常细节，观察百姓如何生活、怎么走路、有什么表情，了解百姓会因为什么而快乐、关心的是什么。潜移默化，长期积累，对创作大有裨益。作为演唱者，要好好地琢磨中国的语言。咱们的语言多美啊！要把每个字都“啃”住了、唱圆了，像玻璃球一样，送到观众耳朵里，让观众听得真切自然。

将《白毛女》一代代传下去，是我做人、从艺的责任。我常和年轻演员们说：“快把我身上的本事都拿去吧！”我实实在在地教，希望他们实实在在地学，用实实在在的艺术成果面对观众。

我愿意做一颗铺路的石子，把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总结出来，让新一辈人踏着它一步步走下去。希望年青一代能发自内心向经典致敬，踏踏实实地走进生活、研究角色，不辜负观众，不辜负艺术，更不能辜负历史。

（郭兰英，《人民日报》2021年8月12日）

② 人物小传

郭兰英，女，汉族，山西平遥人，中共党员，著名女歌唱家，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她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作出开拓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等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她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八月十五月儿明》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

郭兰英 1930 年 12 月出生在山西平遥的一个贫苦家庭。自幼学唱山西中路梆子，11 岁随戏班到太原市演出，先后主演了《秦香莲》《李三娘挑水》《二度梅》等多部传统戏，扮演角色唱做俱佳，在戏曲表演方面初露头角。

1946 年秋，郭兰英参加华北联大文工团，开始从事新歌剧事业，把传统戏曲艺术中的唱功和做功融入新歌剧中。1947 年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戏剧系边学习边参加演出。1948 年 8 月转入华北大学文工一团，曾演出《王大娘赶集》《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歌舞剧。1949 年 4 月，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以演唱《妇女自由歌》获奖。

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在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任主要演员，主演了新歌剧《白毛女》《刘胡兰》《春雷》《红霞》《小二黑结婚》《窦娥冤》等。作为中国艺术的使者，她曾访问了罗马尼亚、波兰、意大利、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郭兰英嗓音甜美，音域宽阔，吐字清晰，行腔富于韵味，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歌唱特色。由于她少年时期受过戏曲演员的严格训练，艺术

功底很深，她的演唱兼蓄神、情、形、声、腔、字六艺之美。她所扮演的人物，达到了歌唱与表演的高度和谐统一，为中国新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她演唱的歌曲《南泥湾》《翻身道情》《绣金匾》《妇女自由歌》以及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歌剧《刘胡兰》中的《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等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全国流传很广，已成为我国民族歌曲中的经典之作。



屠呦呦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

一生倾情青蒿素

希望青年科技工作者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的进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屠呦呦

2020年12月30日，是屠呦呦90岁生日。她收到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屠呦呦研究员工作室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揭牌。她毕生只致力于一件事——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发，如今依然潜心于此……

“我学了医，不仅可以远离病痛，还能救治更多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的名字，注定她与青蒿一生结缘。

1930年12月，屠呦呦出生于浙江宁波。“女诗经，男楚辞”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取名习惯，屠呦呦父亲从《诗经·小雅》中撷取“呦呦”二字。父亲又对了一句“蒿草青青，报之春晖”。他未曾料到，这株“小草”，改变了她的命运。

屠呦呦的求学之路曾被一次疾病中断。16岁时，她不幸染上肺结核，经过两年多的治疗调理才康复。这次经历，让她对医药学产生了兴趣。“我学了医，不仅可以远离病痛，还能救治更多人，何乐而不为呢？”从此，屠呦呦决定向医而行……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选择了冷门专业——生药学。多年以后，屠呦呦说，这是她最明智的选择。

1955年大学毕业后，屠呦呦被分配至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至今。参加工作4年后，屠呦呦成为原卫生部组织的“中医研究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第三期”学员，系统学习中医药知识，发现青蒿素的灵感也由此孕育。

培训之余，她常到药材公司去，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和炮制技术。药材真伪、质量鉴别、炮制方法等，她都认真学、跟着做。这些平日的积累，为她日后从事抗疟项目打下了扎实基础。

“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1972年7月，北京东直门医院住进了一批特殊的“病人”，包括屠呦呦在内的科研人员，要当“小白鼠”试药。屠呦呦毫不犹豫地说：“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这段故事，还要从“523”项目说起。

1969年1月，39岁的屠呦呦突然接到紧急任务：以课题组组长的身份，与全国60家科研单位、500余名科研人员一起，研发抗疟新药，项目就以1967年5月23日开会日期命名，遂为“523”项目。

最初阶段，研究院安排屠呦呦一个人工作。她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收集整理了2000多个方药，并以此为基础编撰了包含640种药物的《疟疾单秘验方集》，送交“523”办公室。经过两年时间，她的团队逐渐壮大，历经数百次失败，屠呦呦的目光锁定中药青蒿：她们发现青蒿对小鼠疟疾的抑制率曾达到68%，但效果不稳定……

说起研究的艰辛，屠呦呦老伴李廷钊记忆犹新：为了寻找效果不稳定的原因，屠呦呦再次重温古代医书。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几句话引起她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其一是青蒿有品种问题。中药有很多品种，青蒿到底是蒿属中的哪一种？其二，青蒿的药用部分，《肘后备急方》提到的绞汁到底绞的是哪部分？其三，青蒿采收季节对药效有什么影响？其四，最有效的提取方法是什么？”屠呦呦说。

屠呦呦反复考虑这些问题，最终选取了低沸点的乙醚提取。经历多次失败后，终于在1971年10月4日，编号191号的乙醚中性提取样品，对鼠疟和猴疟的抑制率都达到了100%。

尽管有了乙醚中性提取物，但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却发现疑

似的副作用，只有确证安全后才能用于临床。疟疾有季节性，一旦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期，就要再等一年。于是，屠呦呦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也带动同事参与。

“虽然发现青蒿素快半个世纪了，但其深层机制还需要继续研究”

然而，青蒿素的首次临床观察出师不利。

1973年9月，在海南的第一次青蒿素片剂临床观察中，首批实验的5例恶性疟疾只有1例有效，2例有一些效果，但是疟原虫并没有被完全杀灭，另2例无效。

一连串疑问困扰着屠呦呦：不是青蒿素纯度的问题，也不是动物实验和数据的问题，难道是剂型？海南临床试验人员把片剂寄回北京，大家感觉片剂太硬，用乳钵都难以碾碎，显然崩解度问题会影响药物的吸收。于是，屠呦呦决定将青蒿素药物单体原粉直接装入胶囊，再一次临床试验。这次，患者在用药后平均31小时内体温恢复正常，表明青蒿素胶囊疗效与实验室疗效是一致的。

从化学物质到药物的转变，青蒿素研究永无止境。1982年，屠呦呦以抗疟新药——青蒿素第一发明单位第一发明人身份，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领取了发明证书及奖章。青蒿素的研制成功，为全世界饱受疟疾困扰的患者带来福音。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现在全球每年有2亿多疟疾患者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疟疾死亡人数从2000年的73.6万人稳步下降到2019年的40.9万人。青蒿素的发现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

院的诺奖演讲台上，第一次响起清正柔婉的中国声音；屠呦呦的学术报告的标题是“青蒿素——中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面对荣誉，屠呦呦一如既往地淡定。“共和国勋章”颁发人选公示前，评选组曾经联系过屠呦呦。当时，她一遍遍确认着一系列问题：这么重要的荣誉，我够格吗？组织上有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直到对方一再确认保证，她才同意接受。

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栋普通居民楼里，屠呦呦依然没有习惯成为一位“明星”科学家，她的精力依然在科研。在屠呦呦的不断努力下，2019年8月，中国中医科学院在北京大兴举行了青蒿素研究中心奠基仪式；愿景中的研究中心白色的主楼就像一棵生机勃勃的青蒿。

“虽然发现青蒿素快半个世纪了，但其深层机制还需要继续研究。”屠呦呦盼望后辈有所突破。

2019年4月25日是第十二个世界疟疾日，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药研究所的科学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提出了“青蒿素抗药性”的合理应对方案。由特聘专家王继刚研究员为第一作者，屠呦呦指导团队完成。未来青蒿素的抗疟机理将是她和科研团队的攻关重点。

一株济世草，一颗报国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屠呦呦呼吁：全球科研和医务工作者，要以开放态度和合作精神，投入重大传染病防治中去……

（王君平，《人民日报》2021年2月4日）

人物小传

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60多年来，她从未停止中医药研究实践。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2019年，屠呦呦及其团队提出应对“青蒿素抗药性”难题的切实可行治疗方案。钟情科学、向医而行，60多年来，对祖国医药科学的向往与探求，是屠呦呦始终如一的人生选择。



谭竹青

民政部最高奖项『孺子牛』奖获得者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走街串巷的贴心人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虽然官不大，但是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这是共产党员的本分和天职。

——谭竹青

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十委社区办公楼，一栋米黄色五层小楼，玻璃外墙显得格外明亮。社区五楼的谭竹青事迹展厅，记录着谭竹青老人一生的事迹和荣誉。

谭竹青，1931年生，曾任东站街道十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2005年12月不幸病逝。她在

十委社区一干就是48年，曾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社区工作者楷模”等160多项荣誉称号。

“到社区工作的新人，第一项任务就是当好展厅的讲解员，先做谭竹青故事的讲述人，再做谭竹青精神的践行者。”现任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汪洋介绍说。

谭竹青事迹展厅内，每一幅照片、每一件衣物都讲述着老人的故事。

展厅内，54岁的张玲在谭竹青生前物品的陈列柜旁驻足。与谭竹青一同工作了16年，张玲对谭竹青拎着小马扎走街串巷的情景记忆犹新。

当年社区整治卫生，谭竹青拿着大喇叭，走街串户吆喝一遍。“随后，家家玻璃都擦净亮，院子里木见纹铁见光的。”张玲说。

刘俊（化名）成长在单亲家庭，年轻时被叫作“小歪脖树”。一次因打架蹲了监狱。“你妈来看你了。”“我没有妈。”刘俊跟监狱的工作人员说。当看到前来探视的谭竹青，刘俊愣住了，“想到平时谭妈的种种关心照顾”，脚还没迈开，眼泪先流了下来。

这次蹲狱的经历对刘俊触动不小。此后，“小歪脖树”成了社区的贴心人，刘俊尽自己所能，帮着谭竹青清垃圾、扫街道。

“几个老太太，外加白发老爷爷，能办成啥大事？”面对质疑，谭竹青不放在心上，默默地为社区忙活了一辈子。

20世纪80年代前后，居民普遍反映就近买早餐困难。“那就建个社区小吃部。”谭竹青带头把家里仅有的450元钱拿出来，带着一群人到拆房工地拣碎砖头、旧木料。

就这样，小吃部、服装厂、制鞋厂、印刷厂……在谭竹青的带领下，十委社区艰苦创业，创办了大小企业17家，使社区内500余名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曾经，社区内没有托儿所。大冬天里，社区的女职工只能把孩子往

背上一背，挤公交去上班。“老主任看着心疼，社区也有了积蓄，决心要建个托儿所。”张玲说，选址就在谭竹青家旁边。

托儿所的设计方案出来了，谭竹青一看需要占掉自家的半间房。托儿所建成了，谭竹青一家本来不大的房子被拆掉一半，仅剩下十来平方米，一家人一住就是10多年。

40年前，十委社区还是“三条胡同，一条街”，是典型的棚户区。谭竹青反复奔走、协调，先铺上了柏油路，又推动棚户区改造。

1996年，东站十委社区迎来了“改天换地的大事”——棚户区改造陆续动工。2005年，谭竹青病逝前，棚户区居民全住进了楼房。十委社区由棚户区变成了新城区。

48年，从穿着花布衫、扎俩小辫的小姑娘，到白发苍苍的74岁老人，谭竹青从小事做起，用“燕子垒窝”的精神，小事变大事，一点点改变了十委社区的大面貌。

沿着谭竹青的脚步，十委社区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区”等荣誉。

（祝大伟，《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1日）

人物小传

谭竹青，吉林省长春市人，1931年生，小学文化程度，生前系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十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谭竹青是迄今为止全国社区工作领域中唯一荣获“社区工作者楷模”殊荣的优秀干部。

谭竹青在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十委社区工作长达48年。1978年，当看到社区居民买早餐排长队的情景时，谭竹青决定发展委办经济。没

有资金，谭竹青就把家里仅有的450元积蓄拿出来。为了节约每一分钱，谭竹青带领委里的老干部自己干，办起了十委社区第一个买卖——“如意小吃部”。此后，谭竹青带领大家又先后办起了服装厂、制鞋厂、印刷厂、皮革加工厂等大小17个企业，不仅没向国家要一分钱，没向银行贷款一笔款，而且还向国家交纳税金几百万元。应得的奖金，谭竹青一分也不拿，全部用在十委社区发展经济和救济困难户上。

谭竹青用“燕子垒窝”的精神，从一点点的小事做起，一步步改变着十委社区的面貌。拆除棚户区、修路、种草、栽树、修花坛、盖凉亭，建起社区服务中心，昔日“都市里的村庄”彻底改变了模样。

谭竹青始终把居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谭竹青所在的十委社区居民中有90%以上都是贫困人群，下岗职工多，接受低保救济的人多。谭竹青竭尽所能，举办了美容理发、服装裁剪、家政、烹调等培训班，使下岗职工掌握一技之长，先后安置了1000多名下岗职工，使社区居民“虽下岗，不失业”。

谭竹青视社区居民为亲人，家长里短她调解，贫困人群她接济，失足青年她帮教……走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谭竹青成为居民群众的贴心人，被人们亲切誉为“小巷总理”。

2005年12月3日，谭竹青不幸病逝。长春市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自发为她送行。谭竹青先后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居委会主任‘孺子牛’奖”“全国三八红旗手”等170多项称号。



尉凤英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劳动模范

毛主席的好工人

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多大劲就要使多大劲。能挑千斤担，不挑九百九。

——尉凤英

1953年，正值我国“一五”计划实施第一年，尉凤英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到东北机器制造厂当工人。从工人到工程师，尉凤英一路成长，对党无限忠诚，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刻苦钻研生产技术，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今年“七一”前夕，尉凤英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别看窍门小，找着就是宝”

1933年，尉凤英出生于辽宁抚顺一个贫苦的煤矿工人家庭。她3岁丧父，母亲牵着年幼的她四处讨饭。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尉凤英家分到了100斤高粱米，得到10元钱补助，吃上了饱饭。“是共产党让我家过上了好日子，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翻身做了主人，我坚定一生跟党走！”尉凤英说。

1953年1月，20岁的尉凤英进入东北机器制造厂，她上班说的第一句话是：“师傅分配我干啥都行，我有力气，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

尉凤英生产的是军工产品，对质量要求高，如果操作不慎，制造出不合格的产品，就有可能发生事故，后果无法估量。尉凤英每天天不亮就到车间，做好开工前的准备工作。入厂才3个月的尉凤英，就以自己扎实的基本功，赢得了车间领导的认可，被批准独立操作。

1953年，工厂的任务十分繁重，全厂上下干劲十足。尉凤英当时使用的是旧皮带式车床，她无论怎样加班加点地干，都赶不上老师傅的进度。流水线上每人一道工序，有时因为尉凤英的缘故，拖了下道工序的进度。尉凤英心里一急，只听“咔嚓”一声，车床刀报废了。尉凤英难过地哭了起来。师傅耐心地对她说：“你光有热情猛劲不行，提高效率，必须有窍门。”

“别看窍门小，找着就是宝。”为了找窍门，尉凤英经常吃饭睡觉都在车间；吃饭时也不停钻研，她用筷子蘸上菜汤，在桌子上画图。

进厂5个月，尉凤英就成功完成了一项车床技术革新，这项革新技术让工厂产量一下子提高了80%，提前118天完成了1953年的全年生产

任务。尉凤英入厂一年就被评为“工厂模范”，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能挑千斤担，不挑九百九”

1955年，和尉凤英同车间的一个姐妹在送料时手指受伤。尉凤英心里刺痛，下决心制作自动送料器。

在沈阳市技术革新展览会，一台自动化机床给了她极大的启发，回来后她立即向车间党支部提出研制自动送料器的建议。车间党支部专门开会研究她提出的建议，安排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帮助她研制。经过5个多月、11次的紧张试验，自动送料器终于成功安装到了冲床上。这项技术让工效提升了5倍，并且确保了生产安全。

在国家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前夕，工厂接到一项新的任务——制造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纱锭轴承架”。尉凤英承担其中的“保持架切口”项目，这项任务对产品精度的要求极高，使用的却是陈旧的设备，开始生产时废品率达到10%以上。尉凤英边干边思考，进图书馆查资料，与老师傅们讨论，大胆地将旧机床原有的单刀切削改制成四把刀切削，日产构件一下子由800个提高到1.2万个。

尉凤英常说：“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多大劲就要使多大劲。能挑千斤担，不挑九百九。”从1953年到1965年的12年里，尉凤英带领厂里的技术人员先后完成了“双头双刀”“自动送料器”“六角车床”“半自动开关”“自动送料退料杆”等177项技术革新项目，其中重大技术革新58项。她仅用434天就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用120天又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工友们称赞她为“总是在跑的铁姑娘”。

“愿意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年轻时，她是吃苦耐劳、爱岗敬业、一门心思搞革新的“铁姑娘”；耄耋之年，她依然活跃在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一线。这些年来，她先后培养了不少响当当的“劳模徒弟”。

尉凤英长期担任沈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市关工委五老报告团副团长以及几十所中小学的名誉校长、校外辅导员，在机关、企业、学校做报告1000多场，听众达40多万人次。她的报告内容生动鲜活、朴实真切。

“工作可以退休，党员永不褪色。我要始终奔跑着践行初心使命。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愿意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尉凤英说。

（王金海，《人民日报》2021年8月12日）

人物小传

1953年，尉凤英进入沈阳东北机器制造厂，成为一名操作冲床的车工。1953年到1965年，共实现技术革新177项，用434天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又用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荣获全国先进生产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尉凤英是五六十年代著名的劳动模范，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77年回辽宁省做基层工作。她对工作投入了火一般的热情，先后13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4年被党中央命名为“毛主席的好工人”，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1953年，20岁的尉凤英进入东北机器制造厂当工人。她勤奋好学，钻研技术，大胆革新，进厂第一年就实现两项技术革新，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仅用247天。当时厂内的冲床还是由手工送料，技术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低。

尉凤英大胆尝试，成功地将手工送料改为自动送料，提高工效5倍，使冲床工序仅用21天就完成了全年的任务量。1960年，她又完成纱锭轴承垫圈的工艺，由车制改为冷冲压加工，提高功效14倍。从1980年起，尉凤英担任航天部沈阳139厂副厂长、工会主席。沈阳市总工会和国防工业工会先后评选她为“模范职工之友”和“为推进改革搞活企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领导干部”。

2019年9月25日，尉凤英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



樊锦诗

『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厮守，一眼千年

我在敦煌莫高窟转眼 58 年了。我这一生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研究、弘扬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这是最大的幸福。

——樊锦诗

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

那时我第一眼见到敦煌，黄昏古朴庄严的莫高窟。远方铁马风铃的铮鸣，我好似听到了敦煌与历史千年的耳语，窥见了她跨越千年的美。

1962 年，我第一次到敦煌实习，当时满脑子都是一听就让人肃

然起敬的名字：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等等。敦煌就是神话的延续，他们就是神话中的人物啊！我和几个一起实习的同学跑进石窟，感叹到只剩下几个词的重复使用，所有的语言似乎都显得平淡无奇，简直失色了，满心满脑只有：“哎呀，太好了，太美了！”

虽然说对大西北艰苦的环境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水土不服的无奈、上蹿下跳的老鼠后来想起仍让人心有余悸。到处都是土，连水都是苦的，实习期没满我就生病提前返校了，也没想着再回去。没想到，可能就是注定厮守的缘分，一年后我又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的前身）。说没有犹豫惶惑，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无垠的戈壁滩和稀稀疏疏的骆驼草。洞外面很破烂，里面很黑，没有门，没有楼梯，就用树干插上树枝的“蜈蚣梯”爬进洞。爬上去后，还得用“蜈蚣梯”这么爬下来，很可怕。我父母自然也是不乐意的，父亲甚至还给我写了封信，让我转交学校领导，给我换个工作地方。但是那个时候哪里肯这样做，新中国成立10多年，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一开始，在这般庞大深邃的敦煌面前，我是羞怯的，恍若相见初恋一般的惶惑不安，一阵子相处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敦煌当作了“意中人”。

文物界的人，只要对文物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能守护敦煌，我太知足了。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莫高窟，就是一座巨大无比、藏满珠宝玉翠的宝库。这样动人可爱的“意中人”，已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怎么舍得离开呢？我的爱好和想法，影响了远在武汉工作的我的丈夫老彭，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好同学，理解我，支持我，也了解敦煌。

他毅然放弃心仪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教学工作，来到敦煌，来到我的身边。从此，我们俩相依相伴，相知相亲，共同守着敦煌。老彭热诚地投身到敦煌学研究行列，直到生命的最后。

后来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1999 年开始，来敦煌欣赏壁画的人越发多了，我一半是高兴，另一半又是担忧。我把洞窟当意中人，游客数量的剧增有可能让洞窟的容颜不可逆地逝去，壁画渐渐模糊，颜色也慢慢褪去。

有一天太阳升起，阳光普照敦煌，风沙围绕中的莫高窟依旧是安静从容，仰望之间，我莫名觉得心疼：静静沉睡一千年，她的美丽、她含着泪的微笑，在漫长的岁月里无人可识，而现在，过量美的惊羡者却又会让她脆弱衰老。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塑匠、石匠、泥匠、画匠用着坚韧的毅力和沉静的心愿，一代又一代，连续坚持一千年。莫高窟带给人们的震撼，绝不应该只是我们看到的惊艳壁画和彩塑，更是一种文化的力量！就算有一天她衰老了，这种力量不应消失，我一定要让她活下来。

煌，繁盛也！

当我知道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将她们永久保留的时候，我立即向甘肃省、国家文物局、科技部提出要进行数字化工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特别重视莫高窟的保护。20 世纪 60 年代国家经济刚刚恢复，周恩来总理就特批了一百多万元用于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后来国家更是给了充足的经费，让我们首先进行数字化的实验。现在敦煌已经有一百多个洞窟实现了数字化——壁画的数字化、洞窟 3D 模型和崖体的三维重建，30 个洞窟的数字资源中英文版都已上线，实现了全球共享。

我想和敦煌“厮守”下去不是梦想，这真真切切成为现实！

敦煌艺术入门不难，她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人文学科，汇合交融了

太多的文化元素，历史的多元、文化的多元、创作技法的多元，可谓大气魄、大胸怀。在改革开放之前，研究所关于敦煌学的研究也在进行，但更多的是壁画的临摹。如果说到真正的研究工作，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科研的氛围变好了，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了，正如一位哲人的说法：“我希望我的房子四周没有墙围着，窗子没有东西堵着，愿各国的文化之风自由地吹拂着它。但是我不会被任何风所吹倒。”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春天。

我很喜欢中唐第一百五十八窗的卧佛，每当心里有苦闷与烦恼时，都忍不住想走进这个洞窟，瞬间忘却许多烦恼。有时候，甚至觉得敦煌已经成为我的生命了。

我脑海里常想着季羨林先生的诗：

“从内心深处我真想长期留在这里，
永远留在这里。

真好像在茫茫的人世间奔波了 60 多年，
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归宿。”

我还想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一代又一代有志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年轻人，面对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面对苍茫戈壁的寂寞，披星戴月，前赴后继，这是文物工作者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而我也与我的前辈、同人们一样，仍愿与这一眼千年的美“厮守”下去。

（樊锦诗，《人民日报》2019 年 4 月 10 日）

人物小传

樊锦诗，祖籍浙江，1938年生于北京，长于上海。幼年时得过小儿麻痹症的她，身体一直很弱。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时，樊锦诗却偏偏选择了敦煌。

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宕泉河水，20世纪60年代的敦煌，条件还十分艰苦，但这一切没有吓走樊锦诗。大学毕业时，樊锦诗和恋人彭金章约定，3年就回去，可一等就是20多年。千里相隔，夫妻不能团聚，母子难以相见，在爱情、亲情和事业之间，樊锦诗不断经受着煎熬，可她还是选择了敦煌。

在她的发起和直接参与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于2003年颁布实施，敦煌研究院还联合国内外三个机构编制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

20世纪80年代末，樊锦诗偶然接触到计算机技术，嗅觉敏锐的她立刻想到，这或许是莫高窟得以永久保存的一个契机。经过30多年的探索，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一整套集数字采集、安全存储、有效管理等多项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技术规范 and 标准，建立起系统的“数字敦煌”资源库，数字敦煌资源不仅应用于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而且使敦煌艺术走出洞窟，活了起来。

作为一名石窟考古专家，樊锦诗主持编写了多卷本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如今，83岁高龄的樊锦诗还在为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殚精竭虑。

樊锦诗曾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2009年，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邢燕子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最美奋斗者

乡亲“知心人”

党的教导、人民的嘱托，我永远
不会忘记，我愿以萤烛之光，贡献于
祖国的发展，与共和国共同成长，这
是我人生中最美的乐章。

——邢燕子

1941年，邢燕子出生在北京。
她原名邢秀英，“七九河开，八九
燕来”，为了讨一个好彩头，“燕
子”成了她的乳名。受父亲影响，
邢燕子自小就对中国共产党怀着特
殊的感情。

从宝坻县（现天津市宝坻区）
巴庄子农业中学毕业时，邢燕子才

17岁，本可以继续升学，但她决定要“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要投入农业生产中。

放弃城里生活回农村，吃高粱面、玉米饼，衣服晚上洗白天穿，换洗被褥都没有……邢燕子不怕困难，只担心父亲不同意。

“太好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你上的农业中学，知识就该用在司家庄。”父亲鼓励女儿。

来到天津市宝坻区大钟庄镇司家庄，邢燕子像只燕子一般自由，但迎面而来的困难，比她想象中多。

1959年夏，炎热，多雨。

蓟运河水位上涨，司家庄严阵以待。庄里以东百余米的护河土堤，护卫着庄上2000多亩地。邢燕子与10来个姑娘自发组成司家庄姑娘队，承担起在河堤上堆“土牛”的任务。每个“土牛”在1立方米左右，间隔两三尺放置在堤顶，以备抢险补漏之用。

一次，赶上连雨天，蓟运河水暴涨平堤，庄里的北面洼地也成了一片汪洋，姑娘们就踏在堤顶、迎着风雨加紧堆土。

“你们不要命了？”“我们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我们要向老天爷要粮食！”……这是当时党支部书记董德林和邢燕子的对话。

冒着雨，踩着泥，扛着近百斤重的大兜，“司家庄姑娘队”的名号就这么喊响起来。

进入冬季，各家各户粮食紧张，邢燕子又带着姑娘们上结冻的冰面上破冰捕鱼。董德林拗不过这几个“穆桂英”，请了一名叫王学芝的技术员陪这帮“铁姑娘”凿洞捕鱼。

出了鱼，除了售卖，庄里家家户户都吃上了贴饽饽熬鱼。邢燕子还记得夜里家家户户升起的烟气和飘散的鱼香味，她本人也有了意外收获——与王学芝结缘，并相伴一生。

就这样，邢燕子和大伙儿想尽办法，积极生产自救，在当时全国粮食供应极其紧缺的情况下，司家庄村民顺利度过了灾荒。

邢燕子的事迹引起了媒体关注，经报道，邢燕子成了新闻人物。时任唐山地委书记马力与邢燕子见面时，夸赞了她的乳名，她也下定决心正式改名为邢燕子，姑娘队命名为“燕子突击队”。

“出去开会，队里给了一块钱饭费，她回来又上交了九毛一，舍不得买三毛钱的煎鱼和五分钱的菜汤，她就只花九分钱买粗面饽饽填肚子。”出名后的邢燕子不仅继续战斗在农业生产一线，而且保持了一贯的艰苦奋斗作风。

1960年，邢燕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永远跟党走，永远扎根农村。”在入党申请书中，她这样宣示。后来，即便成了全国人大代表，担任领导职务，她始终参与农业生产。

2009年，邢燕子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获得“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如今，年岁已高的邢燕子在家中休养。多少年过去，在她当年奋战的司家庄，那条通向市区的马路，人们还管它叫“燕子路”；横跨潮白河的石桥，人们也还管它叫“燕子桥”。邢燕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树立的知识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她在初中毕业后放弃了在大城市就业的机会，回到家乡带领“燕子突击队”战天斗地，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8年7月，邢燕子从宝坻县巴庄子农业中学毕业，告别学习生活了两年的中学校园，当时她的父亲是天津市一家工厂的副厂长，但邢燕子没有回到天津市区，也放弃了继续升学、深造的机会，而是回到了宝坻县司家庄村。因为邢燕子早已下定决心，要“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农民”，她希望和家乡人民一起，尽快改变家乡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

在经过两年锻炼后，19岁的邢燕子被安排到了生产第一线。在那里，邢燕子和乡亲们插秧苗、种高粱，带领女团员组成“燕子突击队”，在艰苦环境下数年如一日地劳动。

司家庄村是穷村，年轻小伙子多去外地支援建设，剩下许多老弱妇孺。1959年，夏季蓟运河水位上涨，司家庄以西百十米有一条护河土堤，是庄上庄稼丰收的重要保证，邢燕子带领姑娘们主动承担堆“土牛”的任务。

“土牛”每个长2米、宽1米、高0.5米，间隔两三尺，以备汛期抢险补漏。堆“土牛”是公认的重活，姑娘们每两个人抬着100多斤重的泥兜，天上还下着雨，邢燕子带领的姑娘队不但能够完成任务，还自愿要求增加20立方米的土方。

自然灾害面前，司家庄在1959年出现了粮食危机，全村口粮严重不足，生产自救迫在眉睫。邢燕子带领姑娘们在村里老人的指导下，用各种工具往水坑外提水。几天之后坑里的水越来越少，最后居然打出了几百斤的鱼虾。那一年，邢燕子才19岁，但在乡亲们眼中，她已经成为朴实能干的大姑娘。

1960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出现粮食供应紧张，但司家庄却由于捕鱼等自救措施度过了灾荒。为避免受到灾害影响，邢燕子带领司家庄姑娘们天气还没暖和就下了地。天气冷，土地硬，她们花费了平常几倍的力气，才将粮食播种完成。由于时间早，这里的麦田避开了自然灾害的影响，提前获得丰收。

1973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邢燕子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此后又连续当选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此后，邢燕子还当选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分管全市的农业和知青工作，是不驻会的市委书记，也是不拿国家工资的市委书记。

邢燕子不拿工资，仍在村里记工分，与社员的报酬一样，拿的只是队里女劳动力的平均分。1994年夏，北运河遭到洪水袭击，防护堤需要加固。领导考虑到邢燕子的年纪和资历，不准备安排她参加劳动。但邢燕子再次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她主动参加劳动，坚决不搞特殊化。

1981年，邢燕子来到天津市北辰区一家知青农场担任农场党支部副书记，开始了在北辰的生活。在这里，邢燕子依然是劳动者的“榜样”。上班时间邢燕子挑着大桶撒肥，帮小卖部售货员售货，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哪里需要她，她就去哪里。

1984年，邢燕子当选为北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为了履行好人大代表职责，邢燕子经常深入基层单位，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邢燕子曾5次见到毛泽东，13次见到周恩来。是毛泽东牵着手把她领上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台，在毛泽东不许子女参加的生日宴会上，她是被特别邀请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青年代表之一……邢燕子成为“发愤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是影响一代人的青年标兵。

（徐岳，《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5日）

人物小传

邢燕子，女，汉族，天津市人。

1958年，邢燕子初中毕业。她没有回到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满怀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农民的豪情壮志，回到当时的宝坻县司家庄村，每天与乡亲们一起去插

秧苗、种高粱。

司家庄村是个缺少劳力的穷村，她和农民打成一片，村里劳动力少，她先是组织成立幼儿园，解放妇女劳动力，后来干脆带领女团员，组成了“燕子突击队”。之后，“燕子突击队”从7人扩大到了16人，影响带动全村妇女干了起来。

冬季，她带着突击队员砸开三尺厚的冰结网打鱼，晚上打苇帘子，3个月就给村里挣了3600多元钱，种下430亩高产麦，向荒洼要粮。她经历了艰苦生活的考验，数年如一日地忘我劳动，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成绩。

她的先进事迹引起全国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响，成为影响一代人的青年标兵，是中共九大至十三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都贵玛

『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最美奋斗者

草原最美的额吉

这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最高荣誉。
我将加倍珍惜这一荣誉，继续为家乡、
为人民作出更多贡献！

——都贵玛

77岁的都贵玛老人坐在窗前，
用橘红色的头巾包住苍白的头发，
脸上爬满岁月的痕迹。她不时望向
放在桌子上的手机，那里有她59
年前抚养过的20多个孩子建立的
微信群，孩子们经常在群里与额吉
（蒙古语意为妈妈）分享生活的酸
甜苦辣。

一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四子

王旗脑木更苏木牧民都贵玛和她 28 个孩子的故事以不同的形式在全国流传。她的名字在歌声中传扬，她的故事在荧幕上重现，她的善行被写进书中，她被人们称为草原最美的额吉。前不久，这位博爱行善的蒙古族老人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28 个南方孤儿的蒙古族“妈妈”

1960 年的一天，牧羊姑娘都贵玛被招进内蒙古四子王旗临时建立的保育院工作，一下子成了 28 个孩子的额吉。那一年，她 19 岁，尚未成家。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陷入物资匮乏、食物奇缺的困境，米粮眼看就要见底，被政府收养的几千个孩子面临饥饿的威胁。在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的安排下，3000 名孤儿从遥远的江南来到内蒙古草原，他们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国家的孩子”。都贵玛的 28 个孩子便是其中的部分孩子。

他们年龄最小的不满周岁，最大的也仅仅 5 岁，需要在保育院调理好身体之后才能被牧民们领养。年轻的都贵玛在一位助手的帮助下要照顾这些体弱多病的婴幼儿，让他们慢慢适应北方的寒冷、牧家的饮食，向党和国家履行“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承诺。

“我也 7 岁失去父母，对这些孤儿有着特殊的感情。”看着这些来自遥远地方的可怜孩子，都贵玛立志为他们打造草原上第一个温暖的家。为此，这个未婚姑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给 28 个婴幼儿换尿布、喂奶粉、哄睡觉、教蒙古语、照顾饮食起居……都贵玛白天忙得焦头烂额，晚上睡不上一个整觉，一旦有孩子生病，冒着草原寒风骑马奔波几十里地送孩子就医。

那时候，有个 2 岁小男孩，只有躺在都贵玛怀里才能安静入睡。他

会撒娇喊“妈妈”，总要跟“妈妈”一起睡。从小失去母亲的都贵玛，理解孩子对母亲怀抱的渴望。每晚，都贵玛都会抚摩着他的头，哄他入睡。后来，小男孩被牧民领养，取名“呼和”，但一直与都贵玛额吉有着密切联系。

在那个缺医少药、生活艰苦的年代，在都贵玛 10 个月的精心呵护下，28 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没有一人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都被健康地送到养父母家中。如今，这些孤儿也已年过花甲，子孙满堂。

40 多位牧民产妇的救命恩人

20 世纪 70 年代的内蒙古草原，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分娩对于牧区妇女来说无疑是一道“鬼门关”。当时已回到草原放牧的都贵玛，看到身边年轻女性遭受的死亡威胁，心中有着说不出的酸楚。1974 年，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她，抛下家里的牧活，参加旗医院组织的培训，跟随妇产科医生学习接产技巧及产科医学知识。

1975 年的一天，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乌兰希热嘎查牧民敖敦格日勒难产，但最近的医院也在 100 多公里外，情急之下，家人求助刚从旗医院学成归来的都贵玛。正在家里放牧的都贵玛，扔下羊鞭，跨上马背，及时赶到产妇家，用自己掌握的现代医学技术救下母女俩。那是她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此后，这片偏远草原上的难产产妇有了“保护神”。

都贵玛没有辜负乡亲们的信任，她把牧业劳动之余的时间都放在学习产科医学技术上，逐步掌握了一套在牧区简陋条件下接产的独特方法，10 多年间挽救 40 多位年轻母亲的生命。

都贵玛不是专职医生，她的第一身份还是牧民。因为放牧和接产不能兼顾，当年与她一起参加产科培训的人，没有几个人能坚持下来。她

说：“只要有病人家属来家里叫我，不管多忙，我都得赶过去，因为党和政府让我学习掌握了这门技术，这就是我的责任。”

就像履行照顾好“国家的孩子”的承诺一样，都贵玛一直尽职尽责地履行着产科大夫的职责，直到 90 年代，牧区医疗和交通条件改善，牧民产妇能方便接受专业医院诊疗。

身边困难人群的“爱心使者”

对于幼年失去父母的孟克吉雅和朝格德力格尔兄弟俩来说，有个像都贵玛一样的姑姑算是悲惨命运中的幸事。1980 年，都贵玛的哥嫂相继病故，她二话没说把年仅 3 岁和 10 岁的兄弟俩接回家，与自己的女儿一同抚养成人。到了 90 年代，都贵玛 80 多岁的姑姑、姑父瘫痪在床，无人照顾。她又将老两口接到家里，承担起照顾的义务，直到 3 年后老人们去世。

时间跨入 21 世纪，都贵玛已进入暮年，一场严重的车祸，让她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但她还是处处牵挂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尽其所能为他们排忧解难。

汶川地震后，她主动联系嘎查党支部交纳 3000 元的“特殊党费”；得知当地一所小学有 50 多名贫困学生，她拿出 5000 元帮他们交纳相关费用；她是当地边防派出所的“编外”教导员，每年都为边防官兵讲政治教育课……

“我这辈子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党和国家给了我荣誉，我非常荣幸。人的一生总有忙不完的事情，只要身体允许，我还会用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都贵玛说。

（《人民日报》2019 年 11 月 6 日）

人物小传

都贵玛，女，蒙古族，中共党员，1942年生，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牧民，知名妇产科大夫。

从19岁起，都贵玛承担了抚育28名上海孤儿的任务，将他们全部培育成人，被群众称为“草原优秀母亲”。她通过自己的丹心妙手，拯救了众多年轻母亲的生命，为草原无私奉献了一生。

1979年、1983年都贵玛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2003年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2006年获得“中国十大杰出母亲”荣誉称号，2007年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2019年获得中宣部表彰的“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2019年9月29日，都贵玛接受了习近平总书记授予的“人民楷模”国家荣誉勋章。2021年6月2日，都贵玛被授予“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



张海迪

全国劳动模范
最美奋斗者

用燃烧的生命 抗争

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张海迪

海迪天天干活。以我的观察与了解，她所干的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写作（包括翻译），二是社会工作。这两件事她都做得诚实又自觉。她已早就不做报告了，有许多单位甚至托她的家人和朋友动员她出来做报告，她都婉拒了；另外，每年都有数十家电视台邀她做嘉宾主持或参加个什么大型的晚

会，她一般也都谢绝了。她认为开会做报告虽然也可以感动或教育一些人，但总不如自己动手干点具体的事情来得踏实，来得愉快。热闹总是短暂的，掌声不会永远响着，心潮不能永远澎湃。她成名之初即锻炼出特别能控制和调整自己心态的本领，无论多么热烈、火爆，灯光一暗，掌声一落，马上就能走入沉静。她贪恋着自己那间写作的小屋，迷恋着那种写作的过程。

海迪的写作的确是以身体作为代价的，她天天在写作，也天天在吃药，她吃的药可不是营养或保健品，而全是止疼药与抗菌素。如果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要说，一个人健康的时候劳动并不难，难的是有病的时候还在劳动，还在奉献。海迪就在始终有病、天天吃药的状态下劳动着，奉献着。近年她已经不能较长时间地坐在电脑前写作了，为此她添置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她也不能像常人那样倚着或平躺着写作了，她须将电脑放在身体的一侧，扭着身子敲打键盘；时间一长又不行了，她又买了许多软皮本，以便随时记下所感所思……

她又是个极为认真的人，总想把一切做得好上加好。比方说，去年作家出版社要再版她的《轮椅上的梦》，那本书已经得过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和全国首届“奋发文明进步奖”长篇小说一等奖了，也已经译成日、韩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了，但她还是觉得当初写作时在艺术上不够自觉，今天看来尚有某些不足之处，说是要修订一下，其实她一直在重写与改写，而大凡写东西的人都知道，重写和改写一部长篇是比新创作一部长篇还要折磨人的。当她改写完之后，果然又累病了。有时一篇散文，你觉得已经很漂亮了，但她还是要放一放，改一改，早晚自己满意了才拿出来。她的写作真的是字斟句酌、呕心沥血。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她那颗持之不变、生生不息的爱心、热心和平常

心，她始终与最普通的百姓站在一起，与弱小站在一起。海迪在国家及省残联里面兼着一些部门的职务，那完全是社会兼职，义务服务，非但没有半点儿的报酬，还须她自己作出巨大的付出。山东残联的同志告诉我，近几年，她单是资助灾区及希望小学，就捐了七万多元。而她又救助了多少破裂的家庭及失学儿童啊！我曾见过海迪救助的一位残疾妇女，说起海迪来，她满含热泪称海迪为恩人，说要不是海迪自己早已离开人世了，是海迪在她被丈夫抛弃、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给她以活下去的信心，帮她安家立业，而为了让她的孩子上学，海迪每月资助她二百元，直到孩子参军入伍。

永远与弱小站在一起，不仅体现在她的社会工作里，也渗透在她的写作中。她是我所认识的作家中结交最广、朋友最多的人。从政界要人到社会名流，从专家学者到工人农民，从残疾青年到失学儿童，她结识和交往的朋友不计其数，但我从没看到过一篇她写的自己如何与政界要人、社会名流交往或吃饭的文章。相反，对那些乡村小姐妹，对那些弱小及普通劳动者，她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爱心。济南市档案馆有她专门的一个档案室，里面放着从中央领导人到全国一流书法家给她的题词，有她各个时期的奖状和奖品，有著名人物送给她的一些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礼物，还有来自全国及世界各地的十几万封读者来信，她也从没在自己家里悬挂或展示过，更没向任何人吹嘘过。然却更加显示了她自身的人格魅力：既富于爱心又自有风骨，既随和又正直，既柔弱又执着。

许多年以前，当小海迪伏在母亲的背上这里那里地求医问药的时候，看着母亲满身的汗水，满脸着急，她即默默地立下了一个朴素的志愿：将来无论如何不要再拖累父母，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啊！若干年之后，当她在县广播站当修理工领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她差不多就可以自慰：我可以养活自己了；如今她更可以自信，她非但没有成为家庭的拖累、

社会的负担，还成了家庭的骄傲、社会的财富。他们是家工资及稿费收入最高的人，不仅可以养家糊口，而且还为社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一切也都缘于她的劳动，缘于她的天天爬格子。

海迪的劳动成果是丰硕的。我在认识她的短短三年间，她出了四本书，年年都是丰收年。而且她的每一本新书都得奖，每一本书都上排行榜。《生命的追问》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莫多克》获得了全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在人心浮躁、书市疲软的当今，《生命的追问》发行十几万册，她重新改写的《轮椅上的梦》也一版再版。她的书久销不衰能让人觉得这世间还是有点真事儿与真情，因为她不是靠时髦，靠媚俗，恰恰相反，她靠的是爱心、纯情与健康。

（刘玉堂，《人民日报》2000年6月17日）

⑤ 人物小传

张海迪，女，汉族，中共党员，1955年生，山东文登人。1981年8月参加工作，198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吉林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毕业。现任中国残联第七届主席团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历任山东省莘县广播事业局无线电修理工，济南市文联创作室创作员，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残联第一、二、三届主席团委员，中国残联第四届主席团副主席，中国肢残人协会第三、四届委员会主席，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等称号。

张海迪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5岁之前，张海迪有一个幸福的童年，1960年一个明朗的早晨，玩具室里刚上完一节“课”，她

忽然跌倒了，从此身体从胸部以下失去知觉，再也没有站起来，经检查，张海迪患了脊髓血管瘤。五年中，她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去6块，最后高位截瘫。海迪没进过一天学校，但她刻苦自学，15岁在农村给孩子们当老师；在家自学针灸医术，为群众治病1万多人次。1981年参加高考预选，张海迪取得436分的好成绩。学习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甚至还翻译了13万字的英文小说，出版发表文学作品200多万字。198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2009年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2019年9月，张海迪被表彰为新中国“最美奋斗者”。



张桂梅

『七一勋章』获得者
时代楷模

用初心和信仰书写对党忠诚

有人问我，为什么做这些？其中有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恩和感情，更多的，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张桂梅

“你们可以说某个干部不行，但绝不可以说共产党不好。如果没有共产党，哪儿有今天的幸福生活。”20多年来，她始终牢记党的宗旨，秉持为民情怀，保持着铸魂育人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用爱心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只要我还有一口

气，就要站在讲台上”的诺言。

虽然个人命运坎坷，但她无论身心如何困苦、处境如何艰难，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信仰，饱含着对党、对人民、对贫困山区的无限深情，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她先后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全国十大女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十佳最美乡村教师”“全国百名优秀母亲”“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兴滇人才奖”“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等40多项荣誉称号。

她就是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中学一级教师张桂梅。参加工作以来，她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用初心和信仰书写着一名共产党员一辈子对党忠诚、一辈子为民奉献、一辈子坚忍执着、一辈子于己克俭的大爱情怀。

坚守初心，对党忠诚一辈子

1997年8月，张桂梅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入党20多年来，她始终爱党、护党，忠诚于党。

熟悉张桂梅的人都知道，任何人都不可在她面前说党委和政府的不好、说共产党的不是。她反复说：“你们可以说某个干部不行，但绝不可说共产党不好。如果没有共产党，哪儿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样一句话，她讲了22年，不知讲了多少遍，她说还要继续讲下去。

2008年华坪女子高中创建后，她把党的信念融入办学体系，坚持革命传统立校、红色教育育人，实行红色教育统领校园文化的教学模式。建校初期，由于山区条件艰苦，加之张桂梅要求严格，很多年轻教师难

以适应，不到半年，17名教师中就有9名辞职，教学工作近乎瘫痪。

现实让人始料不及，却让张桂梅意外发现，留下来的8名教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这也启示她，党员在，党组织就在，有党组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从此，张桂梅心中有了底气，脚下有了力量。她迅速把6名党员教师集中起来，重温入党誓词，诵读《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名篇，大家眼里泛着泪花，紧握右拳向党旗保证：一定要把女子高中办好！一定要把大山里的女孩儿送入大学！

学校党支部很快成立起来，从此女子高中有了“主心骨”，学校建设翻开了崭新一页。10多年来，她开创并坚持“五个一”党性教育常规活动：全体党员一律佩戴党员徽章上班、每周重温一次入党誓词、每周合唱一支革命歌曲、每周观看一部红色影片、每周组织党员开展一次理论学习。

有人说，张桂梅除了一副瘦弱的身躯是自己的以外，她没有孩子、没有亲人、没有家。她却笑着说：“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有一颗火热的心，这颗心里面有党、有人民、有学校、有国家、有千千万万的孩子，我什么都有！”

牢记宗旨，为民奉献一辈子

1974年10月，张桂梅响应党的号召，随姐姐从黑龙江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此后的时间里，她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边陲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1996年，丈夫去世后不久，张桂梅放弃了大理优越的工作环境，申请调到深度贫困山区华坪县。

从此，她一步步走向山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越走越偏、越走越苦。来到华坪后，她放弃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在

全县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并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课教学任务。

2003年，张桂梅送走了一个特殊的班级。这个班有的学生转校，有的学生辍学回家，有些男孩子还在网吧过夜，老师们对这个班都失去了信心，纷纷要求调离。

随着中考临近，张桂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主动请求接下这个班，担任班主任。之后，她进山找回那些不读书的学生，但玩游戏的学生还是管不住自己，晚上总想跑出去。

张桂梅横下心来，把行李搬进了男生宿舍，和32个男生住在了一起，既当师长又当家长。早上6点，她叫学生们起床出早操；晚上，她先检查完女生宿舍，再逐床清点男生人数，之后才躺下休息。

一段时间下来，男生们都说就像在家里一样，有个妈妈和他们住在一起。可是，只有张桂梅知道，住在男生宿舍里的那几个月是怎样熬过来的。为更好照顾男生的起居，每到下午张桂梅就不敢喝水，担心晚上起夜时学生趁机溜出去，而且男生们粗重的鼾声、梦话声和臭脚味，常常使她睡不好觉……她的辛劳没有白费，这个班有22名学生的中考成绩在500分以上。

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不幸总是缠绕着张桂梅。

1997年4月，她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已经像5个月胎儿那么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疗。但为了不耽误初三毕业班的教学进度，她偷偷把检验结果藏起来，继续坚持站在讲台上，直到7月把4个班的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才住院接受手术。手术后，医生反复叮嘱，一定要静养6个月以上，可仅仅24天之后，张桂梅又站在了她热爱的讲台上……

丈夫去世后，张桂梅没有再组建家庭。她没有亲生儿女，全身心投入教育和慈善事业。2001年，张桂梅一边在民族中学当老师，一边兼任

“儿童之家”院长，成了众多孤儿的“妈妈”。建院第一天，“儿童之家”就收了36个孩子，最小的仅有2岁，最大的也才12岁。

2003年，维持“儿童之家”的资金面临短缺。为缓解窘境，张桂梅到华坪各部门筹措资金，当年暑假又从华坪“转战”昆明，虽然把各种证书、媒体报道都带上了，却仍被很多人认为是骗子，有人还辱骂她、驱赶她。

“求人很丢人，但如果孩子们生活得不好，我这个义务院长更丢人。”筹款期间，张桂梅累了就在路边歇一会儿，渴了就讨口水喝，饿了就啃几口干粮，2003年至2007年的寒暑假，张桂梅在昆明为孩子们筹措到两万多元。对此她说，一切辛苦都值了！

无私无我，于己克俭一辈子

在华坪，张桂梅对自己的“抠门”是出了名的。由于每天只用三元生活费，有不熟悉张桂梅的人质疑：“现在吃碗米线、面条都要五六元，她每天只用三元的生活费，怎么可能？”然而熟悉她的人都说：“这的确是事实，为了省钱，她多年来从不吃肉，现在只要吃点肉就会呕吐，就会难受。”

张桂梅的吃穿用度极为简朴。她使用的手机还是一部老式诺基亚，这也是她最重要的宝贝之一。别人问她，为什么不换部智能手机？她说，手机里存有学生和家长的电话，怕换手机后这些电话号码会丢失。对她来说，跟学生保持联系，经常听听学生的心声，为他们加加油、鼓鼓劲，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张桂梅穿的衣服多年都是一个样。她说：“我身上穿的衣服，多半是一些领导、同事或好心人买了，硬往我身上套的。”党的十七大召开前

夕，华坪县委给了张桂梅 7000 元制装费，让她买身像样的西服，穿着去北京，她却用这笔钱为学校买了一台电脑，供教师办公，给学生学习。

张桂梅对自己的“抠门”出了名，对别人的慷慨更出名！有一次，一名学生没钱吃饭，她回到宿舍翻箱倒柜地找钱，把仅有的 20 元都给了那个学生。从此，那名学生每周都按时得到张桂梅 30 元的救助，直至初中毕业。

还有一天深夜，一个学生突发高烧，张桂梅看到他在寒冬腊月还穿着单衣，当即把丈夫生前留下的唯一一件毛背心送给了这名学生，并连夜把他送到医院，替他付了 200 元的住院费……

张桂梅这样慷慨的事例不胜枚举。截至目前，张桂梅把全部奖金、捐款和大部分工资累计 100 万元，全部捐献给了山区的孩子们和教育事业。

正如她的自我总结：“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说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

2008 年 8 月，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在云南省华坪县建成。学生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基本是降分录取，学习习惯差、学习基础差，有的学生连汉语拼音都不会，普通话也说不好，成绩始终提不上去。

张桂梅决定从激发内生动力入手，培养学生勤奋刻苦的精神。

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痴心和执着，张桂梅创造了贫困山区教育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基层教育工作的责任和担当，用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干事品格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撑起了一片蓝天。

办起全国第一所免费女高

在张桂梅看来，贫困山区的落后，主要是教育落后，尤其是女孩的受教育程度更低，由此形成了“低素质女孩—低素质母亲—低素质下一

代”的恶性循环。

“只要母亲的素质高，孩子的素质就高。要解决偏远山区的贫困问题，就必须从提升妇女素质入手。”由此，张桂梅萌发了创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从2002年起，她开始为这个看来“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而四处奔走。

“要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张桂梅的“宏伟蓝图”遭到不少人质疑，但张桂梅没有放弃，为此饱尝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酸。

为筹集资金办学，张桂梅求过很多人。一次，张桂梅到昆明某企业寻求帮助，未等她把办女子高中的构想说完，企业的领导就叫保安赶她走，“见我不走，保安就放狗咬我”。看着被狗撕破的裤腿和流血脚，想到自己的委屈，张桂梅坐在地上放声大哭。更多的时候，疲惫、无助的她坐在街头，靠着墙根睡了过去，醒来时已是万家灯火……

“2008年1月7日，姐姐从哈尔滨打来电话，说哥哥病危，一直喊着我的名字，盼着见我最后一面。恰好当时宣传部通知我9日到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我想北京离哈尔滨近，可以去看看哥哥了。”但到了中央电视台后，热情的编导找了位企业家和张桂梅对话，争取帮她解决女子高中的困难。

一边是山里的娃，一边是弥留的兄，张桂梅艰难抉择。当她把节目录完，等来这位企业家承诺给女子高中提供50万~100万元资助的同时，也等来了哥哥已经火化的消息……

那种锥心之痛，张桂梅至今难忘。

在省、市、县各级党委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捐助下，张桂梅的办学梦想最终实现。2008年8月，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建成。9月1日，来自丽江市华坪、永胜、宁蒗等深度贫困县的94名贫困女孩走进了女子高中的校园。

11 年，她家访了 1345 名学生

学校是建起来了，如何留住孩子却成了难题。为留住这些学生，家访成了张桂梅最重要的工作。去有些学生家的路太难走，连车都租不到，只能徒步前往。一个假期甚至两个假期，即便马不停蹄，张桂梅也只能走访完一届学生的家庭。尽管如此，她依然坚持：“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亲自到每一名学生的家里去看看。”

一次家访，到了山下，司机告诉张桂梅，车上不去了。学生的家在山顶，仅有一条不到半米宽的山路，路的一边是万丈悬崖，走路的话需要 6 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张桂梅搭乘乡政府工作人员的摩托车上山。“当时坐在车上，我都不敢低头，摩托车稍微歪一点，就会跌入悬崖粉身碎骨。”想起当时的场景，张桂梅至今仍心有余悸。

学生下山来接她，在半山相遇时，张桂梅第一句话就问她：“你为什么还要回这儿来啊？你怎么还老想回这儿啊？这地方你怎么回来的啊？”女孩低着头淡淡地说：“老师，我不回来，我上哪儿去啊？”张桂梅无言以对。

这样的家访已持续 11 年，覆盖学生 1345 名，行程近 11 万公里，张桂梅摔断过肋骨、迷过路、发过高烧，还旧病复发晕倒在路上……可正是这一次次家访，更加坚定了张桂梅将女子高中继续发展下去的信念。她不希望山里的孩子因为没能接受教育，在不到 15 岁的年纪就结婚生子，然后将缺失文化带来的无知和贫困又一代代传下去……

连续 10 年高考综合上线率保持 100%

2008 年，女子高中建校时只有 3 个班 94 名学生，第二年扩招了 5

个班，班级数由此增加到8个，张桂梅的工作量增加了不少。尤其是每天早上打扫学校卫生，逐间宿舍喊学生起床，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张桂梅有了她的小喇叭。每天早上五点半，小喇叭就会准时响起：“姑娘们，起床读书啦！”从起床到出操，再到课间休息，以及晚上睡觉前，小喇叭的声音一直在校园里回响。

学生们说，听到小喇叭的声音，心里特别踏实，如果张桂梅出差或出去开会了，一天听不到小喇叭的声音，就像少了点什么。

张桂梅说，她要用这样的方式让学生们知道，自己一直在身边守护着她们，一直和她们在一起。每堂课她都精心设计一段新颖的开场白，有时朗诵一首美丽的小诗，有时唱支学生爱听的歌谣，有时讲述一个自编的故事，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就这样被调动了起来，慢慢地成绩也上来了。

天道酬勤，张桂梅付出的心血得到了令人欣慰的回报。11年来，女子高中已毕业1645名学生，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率保持100%。2019年，毕业学生118名，109人上了本科线，9人上了专科线。

与此同时，张桂梅的身体却每况愈下，肺纤维化、肺气肿等疾病日益严重，医生说她的生命可能不会超过两年，但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张桂梅总是笑着说：“感谢每天清晨能够醒来，又能看到新的阳光！”

（周玉林，《中国妇女报》2019年11月20日、21日）

人物小传

张桂梅，女，满族，中共党员。1957年6月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丽江市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兼儿童之家院长，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

学校长。

1974年10月，17岁的张桂梅跟随姐姐从家乡黑龙江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她先后在林场、党校任团支部书记、政治教员，又到局机关当文书、团支书、妇女主任。1988年，张桂梅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丽江教育学院中文系。1996年8月，因丈夫不幸去世，父母双亡、无儿无女的张桂梅决定离开伤心之地，调入丽江市华坪县。自此，开启了她坚守贫困地区20多年的乡村育人之路。

张桂梅是百名孩子口中的妈妈，山区女孩子的一线曙光，她把全部身心投入深度贫困山区教育扶贫主战场，尤其在解决贫困山区女孩教育问题上，克服种种困难，建成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她敬业奉献，长期拖着病体忘我工作，在与时间赛跑和病魔的抗争中，以实际行动兑现“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的诺言；她无私无我，给予福利院孤儿和贫困山区女孩母亲般的呵护，把自己的工资、奖金和社会各界捐款100多万元全部投入教育事业，托举起了贫困山区孩子“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和梦想。



卓嘎、央宗

时代楷模

最美奋斗者

爱国守边的最美格桑花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

——卓嘎、央宗

金色的油菜花和葱郁的青稞将大地染得越加鲜亮。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与千年左旋柳咫尺相望。白鸽蹁跹在祥和欢乐间，雄鹰在茫茫雪原上空翱翔。伴着雅鲁藏布江的涛声、东山顶上的暖阳，我走进了玉麦。玉麦是卓嘎与央宗的故乡，在这里，我听到了卓嘎、央宗一家

人的感人故事。

一

玉麦乡隶属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受印度洋暖湿气流影响，植物垂直分布明显。杜鹃花从南开到北，山下是花的海洋，山上却只长枝干不开花。原始森林遮天蔽日，松萝随风飘扬。这里一年到头只有两个季节，半年雪，半年雨，一年 260 多天的雨雪天气让这里常年云雾缭绕。青稞只长苗不结穗，土豆只有拇指大，水草太丰美，羊蹄子会泡坏，所以这里的牧民只养牦牛犏牛不养羊。

那是 1960 年的春天，民主改革工作组来到绿雾一般的玉麦河谷，讲山外的变化，教村民识字，还建议桑杰曲巴担任乡长。桑杰曲巴是卓嘎与央宗的阿爸，那时候他还不明白“乡长”是什么意思。工作组告诉他，乡长就是为全乡人民办事的，同时强调，乡长责任重大，国土也需要乡长带着牧民一起来守护。桑杰曲巴问，“国土”又是啥？工作组说，国土就是咱们世代生活的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哪一座雪山，哪一个牧场，都不能丢失。从此，正值壮年的桑杰曲巴记住了国土就是家园，是不能丢失的最宝贵的东西。玉麦乡人民政府第一任乡长桑杰曲巴，就这样雄赳赳地站立在了玉麦的森林与雪山之间。

日拉山的冬天，冰雪能淹没牦牛的脊背。每年大雪封山之前，玉麦人要花上 10 多天时间，翻越两座 5000 米以上的雪山，跨过陡峭的山谷，穿越沼泽森林，把羊毛、酥油、奶渣、竹编运出去，换回青稞、盐巴、土豆、砖茶、火柴。这些物资要用到来年铃铛花开满山坡、道路通行之时。整个冬季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山外人进不了玉麦，玉麦人也出不去大山。后来，为了改善牧民的生活，政府在日拉山另一侧的曲桑村，给

玉麦人盖起了新房，发了粮食和牲畜，人们纷纷搬进了曲桑村。桑杰曲巴一家也跟着搬了过去。曲桑村的生活虽然惬意，桑杰曲巴的心里却始终牵挂着玉麦。3个月以后，他赶着牛群，返回玉麦。通往老屋的道路已经被绿草覆盖，家里的东西都被邻国人拿空了。桑杰曲巴对家人说，必须得有人在，这块土地才能守得住。

独自一家住在大山深处，见不到国旗，桑杰曲巴感到心里不踏实。到哪里找国旗呢？来到县城后，桑杰曲巴在街上一边走一边想办法，猛一抬头，看到县委大院的上空，五星红旗正迎风招展。他停住脚步，心想，国旗是布做的，可以自己做。孩子们见阿爸回来，以为鼓鼓囊囊的包里的布料是用来缝制衣服的，围着火塘高兴地跑来跑去，可是阿爸最后却剪出了一大四小五颗黄色星星，又将星星缝在红布上。阿爸严肃地说，这是最宝贵的东西，是我们的国旗。就是那一次，卓嘎和央宗第一次见到了五星红旗，懵懂地懂得了国旗的意义。

那一天，五星红旗飘扬在了桑杰曲巴家的屋顶上。后来，去山外开会，领导问有没有要解决的困难，桑杰曲巴说，那就送我一面国旗吧！他渐渐得到了很多面五星红旗。他把这些国旗插在近处的放牧点上，插在高高的山头，插在路边的高山松上……看着比朝霞还要夺目的旗帜，桑杰曲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力量。

二

玉麦乡的条件实在太艰苦了，没有医生，不通公路。自从桑杰曲巴的小儿子去了山外读书，空阔的玉麦林莽间，就只剩下卓嘎与央宗，还有她们并不高大的阿爸了。山外人把这里称为“三人乡”，乡政府就设在桑杰曲巴的家里。

除了放牧，就是看雨雪更迭，彩虹变幻，采摘比星星还要繁盛的报春花。一人抱不住的木灵芝随处可见，狼、黑熊、岩羊也常常不期而遇。每年转场两次，冬牧场转到夏牧场，夏牧场转到冬牧场。有的牛倔强不好赶，有的则钻进森林，掉进石头缝隙里，姐妹俩得费力一头一头去找回。她们把拌有盐巴的青稞粉喂进牛嘴里，算是对听话的牛儿的一种奖励。没有熟悉的面孔，成天只能跟牛儿说话。根据牛的毛色和犄角不同，她们给牛取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有的叫昂珠（白色小鸭子）、邦金（草坪上生的）、查果（黑白色），有的还取上亲近人的名字，高兴的时候，会和牦牛额头抵着额头玩耍。

桑杰曲巴巡山或者外出开会换粮食的时候，会让猎犬“支莫”和藏獒“雷索”陪伴姐妹俩。一旦听到外面有动静，“支莫”与“雷索”就会吼叫起来，姐妹俩感到特别害怕，盼望着阿爸赶快回家。有一次，她们对阿爸说，搬出去吧，搬出去就能看见人了，就有人说话了。阿爸说，这是国家的土地，我们不能走。央宗说，国家的土地就让国家的人来守吧。阿爸说，我们就是国家的人啊，如果我们走了，这块国土上就没有我们的人了。

20 世纪 80 年代，白玛坚参成为定期进出玉麦的邮递员。当白玛坚参翻山越岭把邮件送到玉麦时，桑杰曲巴的眼里总会闪烁欣喜的光芒。他迫不及待地展开报纸，一篇一篇读下去，重要新闻还要给孩子们诵读。姐妹俩逐渐懂得了放牧就是巡逻，在边疆放牧就是守护国土。牦牛和犏牛已经超过 100 头了，今天把牛赶到这座山上，明天赶到另一座山上，冬季会赶到南面的山谷里。有的牛儿跑得远，就任其游走在山峦草甸之间。

日子再苦，定期巡山是桑杰曲巴雷打不动的工作。一袋熟土豆，一把开山刀，就是巡山的全部装备。白天，用刀劈开密不透风的荆棘和灌

木，在青苔泥泞的林间冒雨穿行；夜晚，在石缝树洞里躲避野兽。饿了吃点土豆，渴了掬一捧溪水，累了靠在树下休息。每次巡山前，桑杰曲巴总要叮嘱姐妹俩，两天就能回来，如果第三天还没回来，赶紧出山去曲桑报信。巡山路上，桑杰曲巴检查着自己以前楔下的木桩、挂上的国旗、刻下的文字。木桩如果有人拔掉了，他就重新楔上。国旗不见了，他就再次挂上。

卓嘎、央宗姐妹长大后也开始巡山，她们背上阿爸背过的糌粑土豆袋子，带上阿爸用过的砍刀，一次次跋山涉水。只要看见自家牦牛的蹄印，闻到熟悉的菌菇清香，她们就感到无比踏实和亲切。巡山时，不少陡坡在70度以上，上去要借助绑在树上的绳索，一点点往前挪。她们走遍了玉麦的深山老林，一路走一路挂国旗，用最纯粹的方式给这片土地赋予“家”的意义。卓嘎逐渐成为玉麦乡的活地图，玉麦有多少个通道、多少座山口，没有人比她更清楚了。甚至卫星都探测不清楚的地方，她却能描述得很准确，解放军官兵有时也会来向她请教。

1988年，卓嘎接替父亲当了乡长，央宗担任副乡长兼妇女主任。1996年，卓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央宗随后也入了党。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桑杰曲巴的身体大不如前，他开始为女儿的婚事操心了。

这时候，一位叫巴桑的青年来到玉麦。憨厚的巴桑不但是放牧的好手，还赢得了卓嘎的芳心，最后与卓嘎走到了一起，3个女儿也相继出生。有了巴桑的加入，玉麦乡的巡逻队伍壮大了。

三

1994年，西藏自治区组织相关部门，对玉麦乡的居住条件、配套设施进行考察调研，精心选择了新的乡址，提出了扩建方案。搬到新乡址

以后，桑杰曲巴一家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1996年，邮递员白玛坚参和另外一家搬进了玉麦，玉麦乡终于结束了34年只有一家人的历史。桑杰曲巴在有生之年看到玉麦河谷人口的增加，放牧巡山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心情格外高兴。

20世纪90年代末，桑杰曲巴家里装上了太阳能发电装置和电视接收器，灯泡可以亮上几小时，如果阳光充足，还能看上一两小时电视。2001年9月，玉麦乡通往山外的公路修通了，当第一辆汽车开进玉麦的时候，桑杰曲巴高兴地给这个“铁牦牛”献上了哈达。沿着这条公路，他去了一次向往已久的拉萨。这年冬天，77岁的桑杰曲巴在大雪纷飞中，安详地离开了坚守一生的土地。临终前，他把全乡人叫到床前，对大家说，不要因为玉麦苦就离开这里，这是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是国家的土地，一定要看好守好。

2011年，新的玉麦乡政府成立，卓嘎、央宗姐妹分别从乡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边防派出所进驻玉麦，军警民共同守边固土成为现实。

公路彻底改变了玉麦人的生活，全乡9户人家有7辆汽车，边民补贴、生态补偿和草场补助等政策性收入节节攀高，每户人家一年能拿到4万多元。来玉麦的游客也多了起来，有4户人家开起了餐馆和家庭旅馆，村民自制的竹器、鸡心藤手镯、奶渣深受游客喜欢。家家户户都装上了Wi-Fi，不论给孩子寄零花钱还是在商店买东西，人们都开始网上支付。

四

日子一天比一天美好，卓嘎和央宗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她们从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基层访寒问暖，于是萌生了把家乡的变化汇

报给习近平总书记的想法。她们给总书记写了一封信，让全村人惊喜的是，党的十九大闭幕后第四天，习近平总书记就回信了，这一天是2017年10月28日。平日里雨雪不停的玉麦，这一天却是金色的阳光洒满了山谷。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了来信，我很感动”“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喜讯传来，玉麦乡的人们奔走相告，卓嘎哽咽地说，要是阿爸能看到这封回信，该有多好啊！

2018年，卓嘎、央宗姐妹俩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以表彰她们半个多世纪以牧带巡、爱国守边、守护祖国神圣领土的事迹。今年6月29日，卓嘎又荣获“七一勋章”，更多人知道了卓嘎、央宗一家人的感人故事与可贵精神。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卓嘎用实际行动带动更多牧民群众扎根雪域边陲。她结合自身的守边经历，在党员中开展宣讲教育10多次，还带头参加“重走桑杰曲巴巡边路”、向党旗宣誓等活动，引导牧民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令卓嘎和央宗倍感欣慰的是，虽然自己没有上过一天学，但她们的孩子都能到山外读书了。央宗的儿子索朗顿珠是玉麦乡的第一位大学生，2018年从西藏大学毕业后，在成都找到一份高山滑雪教练工作。阿妈央宗给他打电话说，难道你忘了波啦（爷爷）临终前的话吗？爷爷的话，他当然不会忘。索朗顿珠立即回藏参加了公务员考试，成为玉麦乡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小伙子深情地告诉我们，波啦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启蒙老师，小时候跟着波啦一起放牧巡山，波啦给他买了玩具枪，还给他做了刀削的竹子枪和木枪。有一次天气太冷，波啦取下牦牛鞍子下的护垫裹住了他。作为玉麦人的后代，他说，会继承波啦的遗愿，守好祖国的

边疆，建设好家乡。

“西藏山南玉麦线”在2018年2月被国家旅游局、国务院扶贫办列入“西部行”十大自驾游精品线路。在湖南省对口援建的大力支持下，如今，玉麦边境小康示范村已经建成。2019年4月，又有47户人家迁入玉麦，玉麦乡常住人口达到56户。56户人家如同格桑花一般，盛开在玉麦河谷间，盛开在高高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盛开在祖国960多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西南一隅，共同建设和谐安宁的美好边疆，谱写守边固土的新篇章。

（杜文娟，《人民日报》2021年7月19日）



人物小传

卓嘎生于1961年9月，央宗生于1963年6月。卓嘎、央宗姐妹都是中共党员，先后荣获“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全国三八红旗手”“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等称号。

卓嘎、央宗的家乡在中国西南边陲，从小生长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1964年至1996年的30多年间，桑杰曲巴家是这片土地上仅有的一户人家。一个爸爸，两个女儿，一栋房子，既是乡政府，也是他们的家。

几十年来，卓嘎、央宗姐妹俩和父亲一直在玉麦这个曾经的“三人乡”，以放牧、巡逻的方式守护着祖国的领土。她们的父亲桑杰曲巴是个老民兵，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母亲病故于外出寻医的马背上，刚出世的妹妹也在暴风雪中夭折。父亲常对卓嘎和央宗说：‘如果我们走了，这块国土上就没有人了！’这句话，两个女儿记了一辈子。他们知道，守

护土地，就是守护国家。

2001年，桑杰曲巴去世，卓嘎和央宗循着父亲走过的路继续放牧戍边。守边岁月里，姐妹俩走到哪里，就把国旗带到哪里。每每看到这抹绚烂的中国红，姐妹俩就会觉得，玉麦距离北京，并不遥远。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玉麦乡渐渐有了更多住户，已是“人丁兴旺”。西藏边境小康村建设相应开展，建立起完备的乡级基层组织，人烟稀少的广袤土地也有了公安边防部队驻守。卓嘎、央宗姐妹从乡领导岗位退下来，仍然心系边防。

“没有共产党，哪来玉麦今天的幸福生活？”卓嘎时常告诫子女，“日子好了，更要听党话跟党走，守好玉麦的一草一木。”央宗的大儿子索朗顿珠是从玉麦乡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放弃城市待遇优厚的工作，回乡加入巡边队伍。“我的根在玉麦。”索朗顿珠说，“我们年轻一代一定会传承发扬好先辈的精神，玉麦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卓嘎的大女儿巴桑卓嘎2019年大学毕业后，也回到了玉麦，成为乡村振兴专干。

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卓嘎“七一勋章”。



李素丽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劳动模范

为人民服务没有 “终点站”

每一条公共汽车的线路都有终点站，但为人民服务没有终点站，我会永远用自己的真情和奉献同大家一起走向明天！

——李素丽

“各位乘客，您好！欢迎乘坐我们21路1333号车。您可能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四面八方，我将用北京人热情、好客的传统，为您提供周到的服务。途中，如果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请不要客气，我会热心帮助您。”伴着扩音

器里李素丽甜润的声音，汽车启动了。

21 路公共汽车线路，北起北京北站，南至北京西站，走的不是多么繁华的地界，但南来北往的外地客人一下火车，往往就通过这路车接受北京人的第一次服务。这路车沿线 10 公里分布 14 个车站，34 岁的售票员李素丽就在这平平凡凡的岗位上，用自己日复一日的劳动给人们带来真诚的笑脸、热情的话语、周到的服务、细致的关怀。她“岗位作奉献，真情为他人”的精神风貌，给乘客们带来美好的体验，给乘客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我为我的职业、我的岗位自豪，是它给了我每天都能向他人奉献真情的机会，让我每一天都感到充实”

这是一个漂亮整洁的车厢：彩旗挂满四周，地板漆色鲜艳，玻璃明亮照人，扶手干干净净，“乘客之家”几个大字分外醒目。

一个操河北口音的小伙子问：“俺到六里桥长途汽车站，怎么走哇？”

“木樨地下车，往前走不远，换 1 路或 4 路汽车，坐到头就是六里桥，然后向前走上立交桥，左拐 200 米就到了。”说着，李素丽从身后的方便袋里拿笔纸，画了一张图交给小伙子。

有个背着包的男乘客挤到售票台前：“请问，月坛南街有个美能达相机维修部，你能告诉我哪站下吗？”

“您在三里河东口下吧，往回走十几步就是。”

“真是活地图！”有的乘客不由得发出赞叹声。可是，人们并不知道，为了成为“活地图”，李素丽付出了多少辛劳！

北京西站正式启用后，李素丽从 60 路调到 21 路。为尽快弄清沿线的情况，她起早贪黑利用班后时间调查，可是不巧，她妹妹骨折住进医

院。为照顾妹妹和上小学的孩子，她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给女儿做好早饭，再把妹妹的早饭送到医院，然后赶去上早班。下了班，她又一站一站走访沿线街巷的机关单位，一步步量出车站到附近主要单位的距离，再记在小本子上。夜幕降临，她一进家门，累得连脚都抬不起来。丈夫心疼地说：“你注意点身体，别着急，把摸路的事放慢点。”李素丽回答：“我抓紧多走几步路，不知多少乘客就能少走冤枉路。”

几个星期下来，李素丽摸清了沿线50条大街小巷和近80个单位的情况，编写了几千字的服务用语。

15年前，以12分之差没能考上大学的李素丽，到60路汽车当了售票员。开了一辈子公共汽车的父亲的教育，党团组织的帮助，使她渐渐爱上了售票员工作。特别是当她热情为国内外乘客服务，得到乘客赞扬时，更感到自己平凡岗位的不平凡。

“对内我代表首都，对外我代表中国。”对这句流行在首都窗口行业的话，李素丽有深刻体会。她常说，国内外乘客下了火车，接受北京的第一次服务，可能就是我这个售票员，服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首都的声誉和中国的形象，我一定要让他们从一开始就享受到北京人的美好服务。

“礼貌待客要热心，照顾乘客要细心，帮助乘客要诚心，热情服务要恒心。”这是李素丽为自己定下的服务原则。

“多说一句，多看一眼，多帮一把，多走一步；话到、眼到、手到、腿到、情到、神到。”这是李素丽对自己工作的要求。

李素丽售票台旁的车窗玻璃，一年四季进出站时总是敞开的。“这样我可以更好地照顾乘客。”即使下大雨，她也要把车窗打开，伸出伞遮在登车前脱掉雨衣、收拢雨伞的乘客头上。

李素丽习惯在车厢里穿行售票。车里人多，一挤一身汗，可她说：“辛苦我一个，方便众乘客。”

她的车上设有方便袋，遇到堵车，就拿出报纸、杂志，让乘客看一会儿，缓解焦急；看到有人晕车或不舒服想吐，她会赶紧送上一个塑料袋；遇有不小心碰伤的乘客，她的小药箱里有“创可贴”；姑娘们夏天穿着长裙上下车，她忘不了提醒往上拎一拎，以免让人踩上摔跟头。

李素丽售票台的抽屉里，放着一个棉垫。这是特意为抱孩子的乘客准备的。小棉垫垫在售票台上，让孩子坐在上面。

李素丽为她的岗位感到自豪。她说：“是它给了我每一天都能向他人奉献真情的机会。如果我能把这十米车厢、三尺票台当成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实实在在去为社会作贡献，就能在服务中融入真情，为社会多增添一份美好。即便有时自己有点烦心事，只要一上车，一见到乘客，就不烦了。”

“用力去做只能达到称职，用心去做才能达到优秀。普通平凡的事情要往好里去做，是没有止境的”

李素丽当售票员不久，有一天查票时，一个小伙子挺不高兴，故意把票举到她眼前晃个不停，嘴里还一个劲嚷：“你看，你看，让你看个够！”李素丽气得大哭一场。车队领导对她说，售票员工作虽然平凡，但并不简单，里面有学问。

李素丽渐渐明白了：做好售票员工作，光热爱自己的岗位不够，还必须掌握服务的本领，钻研服务的学问。

她虚心向老售票员学习，利用休息日多次到103路电车王桂荣车组和44路737号车等先进车组上观摩，还多次抱着自己的孩子登上拥挤的车厢，体验抱小孩乘客的困难。

北京的外宾多，她自学英语，现在已能用英语进行简单对话；车上

常有聋哑人，她学会了常用哑语；她请外地乘客当老师，学一些方言。

乘客多种多样，对售票员有不同的要求。李素丽认真分析各类乘客的心理，区别情况，把他们最需要的服务送到他们身上：老幼病残孕，怕摔怕磕怕碰着，李素丽搀上扶下，重点照顾；“上班族”最急的是按时上班，李素丽将心比心，尽量等他们；外地乘客，既怕上错车，又怕坐过站，李素丽百问不厌，到站提醒，让他们坐“安心车”；中小学生天性活泼，李素丽提醒他们车上维护公共秩序，车下注意交通安全；遇到人生地不熟的外地乘客问路，李素丽从不说“东西南北”，而是用“前后左右”指路，让乘客更容易明白……

1993年李素丽考取了北京市委党校大专班，用业余时间学完了19门课程。她把学到的心理学等知识运用到服务中去，使服务更加周到、细致。

李素丽知道，售票员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可能引发乘客的无名火，让他们一天都气不顺；也可能像甘泉一样滋润乘客的心田，让他们想起来就高兴。为了让每一个乘客都高兴地下车，她的每一句服务用语，都动了不少脑筋。

遇到孕妇乘车，李素丽不是用扩音器大声嚷嚷：“谁给怀孕的同志让个座？”而是走到近处轻声提醒孕妇身旁座位上的乘客。因为她明白，有的孕妇脸皮薄，大声嚷嚷或许闹个大红脸，好事没有好效果。为残疾人找座也是如此，生怕伤了他们的自尊心。

汽车进站时，李素丽从不边敲车厢边喊“靠边！靠边！”而是把头探出车窗，亲切地对车旁骑自行车的人说：“骑自行车的同志，请往外侧骑！”李素丽认为，“靠边”两个字让人感到是“轰他”，“往外”两个字让人感到是请他。相互尊重，不愉快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乘客跑过来赶上车时，李素丽从不说：“您别着急，我等着您。”而

是说：“您别着急，我和全车的乘客都在等您。”虽然几字之差，换来了车上乘客的支持。

李素丽的实践说明了一个道理：服务工作无止境，只要用心，再平凡的岗位也出学问。

“车厢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售票员要在乘客之间穿针引线，调节情绪，营造一个美好空间。”

人们说，不管车厢外是严冬，还是盛夏，李素丽的车厢里总是洋溢着和煦的春风，这是因为李素丽有调解矛盾的技巧。

公共汽车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车上什么样的乘客都有。特别是在早晚上下班高峰期间，车厢拥挤、嘈杂，有时还会发生矛盾和口角。李素丽往往几句话就化解一个个矛盾。

每天早上上班高峰时，在车站等车的乘客都想快点挤上车，上了车后却又希望赶快关门开车，形成“登上脚蹬板儿，立刻变心眼儿”的心理。因此，脚蹬板也被人们戏称为“变心板”。

李素丽为把“变心板”变成“同心板”，每天都很耐心地疏导车上和车下的乘客。她对已经挤上车的乘客说：“大家都急着上班，请各位再往前走半步，这样就可以多上一个人。”然后，她又探出身子对车下的乘客说：“车上实在很挤了，请您再等一会儿，车上的乘客都会感谢您！”

就这样，上了车的尽量往里挤，实在上不去的人也不拼命抓住车门不放了，李素丽沟通了车上车下人的心。因此，她的车在高峰时也常常能保持正点运行。

有一次，在拥挤的车厢里，李素丽发现有位抱小孩的乘客，就动员一位姑娘让出了座位，那位抱小孩的乘客坐下后却连一声“谢谢”都没说，

让座的姑娘脸拉长了。李素丽赶紧走过去，逗着孩子说：“小朋友，阿姨这么累，还给你让座，快谢谢阿姨！”抱孩子的乘客一听，马上弥补失礼：“谢谢你。”姑娘的脸又圆了：“甭客气，应该的。”李素丽的一句话，让双方都高兴起来。

李素丽处理与乘客之间的矛盾，更显示出服务水平。一次，李素丽查验下车乘客的车票，一个小伙子掏完衣兜掏裤兜，就是拿不出票来。李素丽看出小伙子没买票，说：“您可能一时着急找不到票了，要不，您今天再买一张，下车后，您要是找到了，下次坐我的车就不用买票了。”小伙子不好意思了，拿出两元钱说：“大姐，刚才我没买票，您说怎么罚就怎么罚吧！”“按我们的规定，下车逃票才罚款，您及时补票就行了。下次上车要主动买票，这样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事后，李素丽说：人人都有自尊心，售票员不能得理不饶人。让乘客下台阶，我的服务就上了台阶。

对待一些不讲理的乘客，李素丽也是以礼待人，以情感人。有个小伙子上了车就往干干净净的地板上吐了一口痰。李素丽轻声提醒他不要随地吐痰，不想气呼呼的小伙子又吐了一口。这时，李素丽没有再说话，走过去，掏出纸把地板上的痰迹擦干净。在全车人的注视下，小伙子脸红了，下车时连连道歉：“刚才全是我不对，请大姐原谅。”

“对待乘客，冬天我就应该像团火，夏天我就应该是树荫。”李素丽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工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每一条公共汽车的线路都有终点站，但为人民服务没有终点站。我永远属于我的乘客，属于我的岗位”

这是记者亲身经历的一幕：车刚过军事博物馆站，有位白发老大妈

拎起菜兜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妈您不用忙，等车到站我扶您下车。”李素丽走过来，扶白头发大妈重新坐下。“你的服务态度真好！”白头发大妈激动地说，“大家为这位售票员鼓鼓掌！”

话音未落，掌声四起。李素丽热泪盈眶，这掌声是乘客对售票员的最好奖赏！

售票员的岗位虽然平凡，但李素丽热爱自己的岗位，也得到了乘客们的热爱；她献给乘客的是真情，也得到了乘客真情的回报。

车上设有“意见簿”，李素丽得到的却都是表扬，有时一天就有10多条。

有位盲人下车前把一个纸包交给李素丽：“我特爱听你报站和宣传。这几天，我觉得你的嗓音有点儿哑，给你买了一包中药‘胖大海’，你泡水喝吧。”

一位中年女乘客拉住李素丽：“你太累了，我看你脸色不好，可要注意身体啊！”说罢，把一把荔枝放到售票台上，下车走了。

有位老大妈听说李素丽爱吃窝头，就做了几个糜子面的窝头送到车队。不巧，李素丽走车去了，老大妈便对车队的人说：“老没得空儿坐素丽的车了。这窝头她要是爱吃，说一声，我再给她做。”当李素丽和同事们一起分吃这窝头的时候，休息室里安静极了，大家无不为自己的工作得到乘客的理解而感动。

更让李素丽感动的，还是一些接受过她服务的乘客，以她为榜样，也向别人献出自己的真情。崇文区第二人民医院保健科杨秀敏大夫就是其中的一个。

10年前冬天的一个早上，杨秀敏抱着刚满6个月的儿子在地安门换乘60路汽车。肩上挎着大书包、两手紧搂孩子的杨秀敏，又怕上不去车，又怕挤着孩子，别提多着急了。突然，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请大家不

要挤，能不能让抱小孩的同志先上？”杨秀敏抱着孩子上车后，售票员又让她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更令杨秀敏难忘的是，一天，孩子在车上睡着了。她怕孩子着凉，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孩子盖上，又是这位售票员问了一声：“孩子在托儿所有衣服吗？”“没事儿，太阳出来就暖和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秀敏没想到，这天下午2点多钟，这位售票员下班后来到医院，从包里掏出一套腈纶棉童装塞给她：“天凉，您下班要坐两个多小时的车，别冻着孩子。”下乡插队再苦再累，杨秀敏也没流过眼泪，此时却流出了热泪。后来，她一打听，这位售票员叫李素丽。

杨秀敏坐了李素丽10年的车，李素丽的优质服务也感染了杨秀敏10年。孩子大都哭着不肯打预防针，她就自己做了不少小玩具，一边让孩子玩，分散注意力，一边给孩子打针。有些父母白天上班没空带孩子到医院体检，她就上门服务。去年世妇会期间，听说李素丽的女儿患肺炎住进医院，但李素丽工作忙，不能请假到医院照料，杨秀敏几乎天天去医院照顾李素丽的女儿。

今年4月的一天，车快开到终点站时，李素丽发现座位上蜷缩着一个因肚子疼而大汗淋漓的小学生，便把小学生带回车队细心照料。后来，小学生的疼痛缓解了，但李素丽不放心，下班后又和司机一起把小学生送回家。暑假时，这个叫王朔的小学生带着几个小伙伴来到车队，要帮助李阿姨擦车。后来，王朔又组织了一个红领巾学雷锋小组，每天帮街坊的爷爷奶奶往楼上拎东西，整整干了一个暑假。

让李素丽感到欣慰的是，她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她越是节假日和星期天就越不能休息，一年到头很少有机会全家一起出去玩一玩，可她的工作得到了丈夫和女儿的理解与支持。车上那只漂亮的小药箱，就是李素丽的丈夫用两个晚上赶制出来送给妻子的礼物。女儿莎莎精心扎了三

朵花，挂在车厢里，让妈妈一看见花就想起爸爸和莎莎。

李素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与表扬。她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售票员”“五一劳动奖章”和“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她带过的 52 个徒弟，大多成了车组的骨干，其中 3 人入了党，25 人入了团。

谈起乘客的关心和组织的关怀，李素丽说：“我说不清楚是我奉献给他人的多，还是他人奉献给我的多。我心里只有一句话，我在售票员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追求，我永远属于我的乘客，属于我的岗位；我的服务能使乘客满意，胜过任何荣誉。”

最近，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开展了“向李素丽学习，岗位作奉献，真情为他人”的活动，已有 5000 多名售票员有组织或自发地到李素丽车上学习、观摩。但李素丽仍然是那颗平常心：“每一条公共汽车的线路都有终点站，但为人民服务没有终点站，我会永远用自己的真情和奉献同大家一起走向明天！”

（《人民日报》1996 年 10 月 4 日）

人物小传

李素丽，1962 年出生，北京市人，中共党员，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代表，北京市第十二届，十三届人大代表；曾是北京市一名公交汽车售票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

1981 年，李素丽因为 12 分之差没考上大学，在当公交司机的父亲的影响下，成了一名售票员。从此，平凡的售票台成了她人生最大的

舞台。

“每一条公共汽车的线路都有终点站，但为人民服务没有‘终点站’。”李素丽说。

车辆进出站时，李素丽售票台旁的车窗总是开着，这样下雨时她就能及时从车窗内伸出雨伞，为乘客遮雨；即使车厢里人再多，她都坚持在车厢里穿行售票，就为让乘客少走几步……

18年的坚守与奉献，李素丽将平凡变得不凡。做老年人的拐杖、盲人的眼睛、外地人的向导、病人的护士、群众的贴心人……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根据工作需要，1998年10月，李素丽调到北京公共交通总公司服务处工作；1999年12月10日，开通“公交李素丽服务热线”；2008年，任北京交通服务热线主任；2015年1月，北京市政企分开，李素丽任北京公交集团客户服务中心经理……从一名普通员工到管理人员再到领导干部，身份变了、服务环境变了，但李素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始终如一。

“您下车之后，往左走，大约七八十步，就到地铁站。”用“前后左右”代替“东南西北”，用“步数”代替“距离”，北京公交集团客户服务中心的指路方式有些与众不同。

“因为问路者多为外地人，不习惯用东南西北来辨别方向。”北京公交客户服务中心的接线员告诉记者，这个“步数”，是他们每个人下班后，一步步量出来的，“这是成立热线时，李素丽定下的规矩。”

2017年4月1日，李素丽正式退休，但她又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为人民服务，仍在继续……

2019年9月25日，李素丽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



王仕花

最美奋斗者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以岛为家，守岛卫国

他在哪，家就在哪；他守着岛，我就守着他；他守着国，我就守着一个家。

——王仕花

开山岛的面积，只有两个足球场大，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就是这样一座被子女称为“水牢”的孤岛，在丈夫故去后，王仕花选择继续守下去。

坚守，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词。

有的人会因“孤独”而放弃，有的人会因“艰辛”而退却，但有一种人，会说：“开山岛是我们的家，我要守护到底。”王继才和王仕花夫妇的坚守已是一种信仰——守岛，就是守国门，守家园。

32年前，王仕花为“陪伴”而上岛，这个开头，是一位妻子要家庭完整的朴素情感。但在一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共同守护中，经历过即将断粮、连续台风、与外界失联的重重困难后，开山岛，被王仕花赋予“家”的概念，每天的日子，变得要“升旗、巡逻、查天象、看航标、记日志才觉得踏实安稳”。

超越一己之私、贡献一己之力的伟大，来自一天接着一天的平凡。家与国，在王仕花的字典里，已融为一体，成为她和丈夫的共同信仰和坚定信念。

有信仰，就不会迷失方向；有信念，就不会惧怕艰险。

对你我而言，我们都需要找到并守护好那座“心中的开山岛”。

王继才和王仕花，因为守岛，成了名人。不过，知道王继才的人多，知道王仕花的人少。他俩的故事，一般用王继才夫妇概括了。

2018年7月27日，坚守连云港灌云县开山岛32年的守岛民兵王继才兑现了他的铮铮誓言：守护开山岛，直到生命的尽头；2018年8月5日，王继才“头七”刚过，32年始终与丈夫一同守岛的妻子王仕花再一次向组织郑重递交申请，“开山岛是我们的家，我要守护到底”。

一

开山岛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能让王继才、王仕花夫妇心心念念，不舍昼夜？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跟随赴开山岛开展党性教育主题活动

的连云港市妇联，乘船上岛一探究竟。从灌云县燕尾港码头登船，需要约一小时的船程才能到达开山岛，同行的王仕花的大女儿王苏淡淡地说：“今天没刮风，应该能上岛。”她远眺了一眼开山岛，便低头回坐在船尾。

作为父母眼中家里的“顶梁柱”，王苏10岁的时候便担负起了给上岛的父母送补给和在家中照顾弟妹生活起居的重担，“不理解、委屈”伴随着王苏的童年时光。“为什么爸爸妈妈偏要去守那个‘水牢’？”“为什么妈妈宁可不要教师的工作，抛下我，抛下家都要上去陪爸爸？”……很多疑问在王苏幼小的心灵里盘旋，不得答案。

稍大一点，王苏跟着渔家一次一次上岛看望父母，这才逐渐消除童年时的困惑。“岛不大，四面都是海，岛上没有淡水、没有电、没有娱乐，只听得到呼啸的海风和拍打岩石的海浪声。”眼前的一切，比王苏想象中的“水牢”更加可怕，怪不得之前上去的人都打退堂鼓，“看着爸妈在岛上吃苦，我只剩下心疼。”

王仕花心里充满着对孩子的愧疚：“大姐王苏早早挑起家庭生活重担，在自己还是孩子的年龄就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弟妹；老二王志国是老王在岛上给接生的，刮台风，没来得及下岛去医院，我们母子都算死里逃生；小妹王帆小时候在岛上玩耍，我们在岛上巡逻，一个没在意，从岩石上摔下，后脑勺着地，至今记忆力大受影响。”

历数着桩桩件件对孩子、对家庭的亏欠，王仕花噙着泪水：“我放不下孩子们，更放不下老王，放不下开山岛，这里也是我的家。”

她说：“守岛，就是守国门，守家园。”

二

说起开山岛，王仕花立马打开了话匣子。“其实，当年，组织派老王去守岛，我是村里最后一个知道的。”1986年7月，王继才告诉王仕花说要去执行任务，让她回娘家过几天。半个月后，王仕花回到家，还没看到王继才回来，便问婆婆，婆婆欲言又止，再三追问下，才告知王继才去守开山岛了。“我心里一怔，老王一个人在那岛上，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在我再三恳求下，直到第48天，县武装部才派船把我带上岛。”

船刚靠岸，胡子拉碴儿、衣衫褴褛的王继才站在了王仕花面前，“像个‘野人’似的，又黑又瘦，我的心立马揪起来了”。王仕花满心疼惜，再来到王继才居住的哨所，满眼空酒瓶、随地的烟头、胡乱堆放着的脏衣服，王仕花再也忍不住：“老王，这岛守得，把人都折磨成这样，别人都不守，凭啥咱守？走，我们回家！”但王继才脚底下像生了根，望着大海说：“你回去吧，照顾好老人孩子，我得留下，开山岛是海防前哨，你不守，我不守，谁来守？”

看着王继才坚定的眼神，王仕花明白这个“犟脾气”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头，她只好一个人悻悻地下了岛。刚回到家的几天，王仕花总是“魂不守舍，茶饭不思”，“留老王一个人在岛上，没人管、没人问，他怎么挺得住？舍下两岁的女儿跟公婆过，还得把教师工作辞了，上岛陪老王，这值得吗？”两种声音，两样选择在王仕花的脑中反复较量，此起彼伏。

一天晚饭时，王仕花当着公婆的面表态了：“爸，妈，从今天起，我就不想再做老师了，岛上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继才的生活不能没人照顾，我要上岛支持他，陪他一起守岛渡难关。”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把公婆

说愣了。

等稍稍回过神来，曾经也是军人的公公对王仕花的决定大为赞同，而婆婆却为王仕花的大胆决定担忧不已：“这么好的工作丢了，不可惜吗？”

确实，王仕花到学校辞职时，连校长对她的举动都甚为不解：“你教学水平高，同事关系好，上面正在为乡村代课教师陆续转正，你可是大家认定的第一批转正人选，不如再考虑考虑？”王仕花婉言谢绝了校长的好意：“我必须陪在老王身边，岛上再苦，有我在身边就是一个完整的家，他的生活离不开我。”

去年，王仕花正式退休，每月只能拿到 700 多元的农保，而同期的教师却有四五千元的退休工资。“父母这一辈子都没把钱放在心上，他们想的都是够吃够用就行了，但承诺和信仰必须坚守”。三个子女讲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虽然他们给我们的物质财富是贫乏的，但是，他们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富足的。”

每每听到子女们的这些话，王仕花都感到十分欣慰，这些年岛上经历的点点滴滴便涌上心头。

三

1987 年 7 月，王仕花的预产期临近，谁知强台风突然来袭，眼看就要临产了，王仕花却无法下岛就医生产。“我肚子疼得受不了，心想这回，我们娘俩的命怕是保不住了。”王仕花感到绝望，王继才更是手足无措，急得团团转。情急之下，王继才抓起步话机联系上了镇武装部长的家属，硬着头皮当起了“接生婆”，在她的指导下，王继才找来剪刀在火上烤一下，颤抖着剪断脐带，撕开身上的背心在开水里煮一下，简单地给王仕

花包扎好。当孩子发出第一声啼哭时，王继才竟累得瘫坐在地上。“直到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两条人命啊。”王仕花说，儿子出生后，他们给孩子取名叫“志国”，老王说：“志字上面一个‘士’，下面一个‘心’，就是希望他当一名战士，心中有祖国，立志要报国。”

父母守岛 32 年，王苏已记不清她在家与码头之间反复走了多少遍，小小的身躯背着煤球、蔬菜、止痒药膏等生活用品，常常在凌晨一两点的夜色中，步行 50 分钟，守在码头等候渔家的顺风船，把这些补给品送给岛上的父母。有一次台风连刮 17 天，让王仕花尝到了岛上生活的“滋味”。

台风来临前，岛上只剩下 5 斤粮食，海上风大浪急，王苏估摸着台风时间一长，岛上肯定得断粮，但是补给根本送不上岛，“在岛下，我夜夜睡不好觉，每天都担心父母弟弟的安危，祈祷台风赶快过去”。岛上，狂风暴雨持续多天，海腥味的雨水直接打进了营房，房间里，被褥衣服上全都湿透了，油盐、煤球、煤油等生活必需品相继断供了，王仕花真正体会了一把“饥寒交迫”的感觉。

开始，王仕花夫妇还能坚持住，可王志国哪里挺得住呢，哭闹不止，夫妻俩只得一边搂着孩子，一边顶着暴雨，冒险赶到海滩边捡拾半死不活的海螺，一个个收集起来，小心翼翼地带回营房里，砸开螺壳扒肉吃。但这肉一股腥臭味，王仕花只得先把螺肉放进自己嘴里咀嚼，当觉得怪味减轻了，才往嗷嗷待哺的孩子嘴里填。就这样，守岛一家人顿顿吃腥味浓重、不经加工的海蛎，“到最后，连志国的尿都是乳白色的。”说到这里，王仕花倒吸一口凉气，尽管狂风肆虐这么多天，但每天的升旗仪式却一天不落，风平浪静后，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既没有被刮破，更没有被刮跑，风雨过后，迎着从海上升起的太阳高高飘扬，“那一刻，我真能感受到一种存在的力量，一种冲破黑暗、获得光明的亮色，恶劣环境

可以击垮我们的身体，却动摇不了我们守护五星红旗的坚定信念。”自那以后，王仕花的内心从陪伴丈夫守岛的朴素情怀升华到理解守岛、守护五星红旗的崇高伟大。

四

20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异地打工淘金的人日益增多，家中的亲戚也纷纷劝说王仕花夫妇下岛，到外面的天地开阔视野，挣钱养家。但夫妇俩却不为所动，每天乐此不疲地重复着升旗、巡岛、看航标、记日志的枯燥单调生活。

树欲静而风不止。王仕花清楚地记得，一天岛上来了不速之客。“一个长相斯文的开发商带着几个人上岛后，直接找到我们夫妻俩，利索地把一沓厚厚的百元大钞放在我们面前。”他开口就说：“大哥、嫂子，我对你家的情况了解，你一月工资只有150元，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孩子要上学，盖房欠了债，我给你一笔安家费，小岛让我来经营，赚钱和你对半分，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向上级部队领导汇报这件事。”

听了这混账话，王仕花夫妇俩气得一口回绝，但开发商不依不饶，威胁起来：“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不怕死，你们孩子都还小，你们舍得孩子吗？”开发商的一席狠话，激得王仕花夫妇背后直冒冷汗，嘴上却倔强地蹦出几个字：“我们不怕，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见软硬兼施都不奏效，开发商只能气急败坏地下了岛，临下岛前竟然把王仕花夫妇捆绑起来，让他们眼睁睁看着一把火烧了夫妻俩居住的营房。眼见熊熊大火把他们苦心经营的小家烧得一干二净，王仕花没有懊恼，更没有掉泪，她感到肩头的责任是实实在在的，绝不只是重复而机械的劳动，更不是虚无缥缈的三两句口号：“谁说和平年代不需要守这

孤岛呢，没人守着，就有坏人盯着。”

五

船快接近开山岛时，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守岛夫妻哨”的谆谆嘱托刻印在开山岛的正中央，“以岛为家”四个红字映衬着王仕花的真实感。

虽然，开山岛的冬天还是会把人冻得说不出话来；夏天还是会让人热得不熬到凌晨三点都无法入眠；一阵阵掠过的苍蝇蚊子，张嘴便能吃上……但是，如今登上开山岛，王仕花口中的孤岛还是大变样了。

正在守岛的民兵汪海建引着大家一路探寻。过去，都是喝方井里存的雨水，沉淀过滤后饮用，现在，岛上的矿泉水储备充足；过去靠煤油灯、电池维持着基本的电力需求，现在，装机容量6千瓦的电力设施保障着岛上的用电需求；过去，岛上和岛外联系只能依靠船老大“鸿雁传书”，如今，移动网络信号覆盖小岛，通达了岛内外的沟通联络；过去，这岛上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现在，苦楝树、梨树、桃树栽满小岛，小鸡仔、小狗仔活蹦乱跳，一派生气。

“可惜，这样的好日子，老王没过几天就走了呀。”王仕花一声叹息，“岛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我们一手经营的。”那双手饱经海水的侵蚀和海风的摧残，黝黑而粗糙，纹路深而掌心厚，“偶尔见到志国的孩子，很想伸手抱一抱，但一想自己毛糙的手可能把孩子的小嫩皮给刮坏了，一下就忍住了。”

长期在岛上生活，湿冷的环境让王仕花患有严重的风湿、皮肤病，但最让王仕花难以释怀的是因为左腿股骨头坏死，下岛看病而没能陪伴王继才最后一程。“总感觉老王还在岛上，还没走。”王仕花泪眼婆娑，“只

有在岛上，每天升旗、巡逻、查天象、看航标、记日志才觉得踏实安稳，这是老王的遗志，也是我的信仰，开山岛是我们的家，我要守护到底。”

（茹希佳，《中国妇女报》2018年10月23日）

人物小传

王仕花 1962 年出生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王继才的妻子。

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前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85 年设立民兵哨所，岛上条件十分艰苦。1986 年 7 月，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找到 26 岁的王继才，开始守卫黄海前哨开山岛。王仕花辞掉了镇小学教师工作，与丈夫一起守岛，被人们称为“开山岛上的夫妻哨”。

2018 年 7 月 27 日，王继才在执勤的时候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 58 岁。丈夫王继才去世后，王仕花于 2018 年 8 月 6 日向组织递交了继续守岛申请，现任开山岛哨所名誉所长。



任长霞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最美奋斗者

人民爱戴的忠诚卫士

面对黑恶势力她拍案而起，面对平民百姓她柔情似水。总有些人因生命的离去而有了更加震撼的力量，任长霞就是其中一位。

——题记

2002年10月1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第四届全国十大女杰颁奖现场，一位来自公安战线的女同志站在讲坛上，铿锵的声音在会堂回荡：“几十年的公安工作，使我深切感受到了广大人民的质朴之情，实现了我人生最高价值。我认

为，警察就是我的天职，为自己执着追求的事业而献身，值！”

这个身材娇小、脸膛微黑、精神饱满的女同志，就是任长霞。

中原女英雄

任长霞敢爱敢恨，她爱人民爱得深沉，她恨损害人民利益的黑恶势力恨得彻骨，她的这种爱不仅感动了登封，感动了郑州、河南，也感动了全中国。

“感动中国”这样评价她：“她是中原大地上的又一个女英雄。扫恶打黑，除暴安良，她铁面无私；嘘寒问暖，扶危济困，她柔肠百转。十里长街，白花胜雪，挽幛如云，那是流动在百姓心中的丰碑！一个弱女子能赢得百姓的爱戴，是因为，在她的心里有对百姓最虔诚的尊重！”

她是老百姓心中的“女青天”

一系列业绩的取得，源于任长霞对崇高理想的不懈追求。1983年，当英姿飒爽的任长霞警校毕业后来到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预审科当上一名民警时，她就在日记本中写下一段话：“能成为一名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人民警察，能亲手抓获犯罪分子、还老百姓公道，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她就立下了将自己一生献给公安事业的誓言。

1992年11月，任长霞在郑州市公安系统和政法系统岗位练兵大比武中，力克群雄，双双夺冠。1994年11月，又在全省预审岗位练兵大比武中，夺得第一名。办案实践中，任长霞更注重探索和积累办案经验，提高审讯技巧。凭着自己娴熟的预审技能、顽强的工作作风，她直接审

理了各类刑事案件 1072 起，追捕逃犯 950 人，在河南省预审战线上创造出了无人比拟的业绩。

1998 年，任长霞被提拔为郑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支队长。她带领支队民警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国 20 多个省、市，破获了 300 余起抢劫、杀人等重特大案件，抓获了 350 多名犯罪嫌疑人。

因为扎实的成绩，任长霞被誉为“警界女神警”。

登封除恶

2001 年 4 月 11 日，任长霞受命来到登封担任公安局局长。

登封位于郑州、洛阳、平顶山的接合部，位于嵩山腹地，因少林寺而名扬海内外，常住人口 63 万，每年流动人口上百万。多年来，登封治安形势严峻，大案积案较多，群众对公安工作意见很大。以登封避暑山庄老板王松为首的涉黑团伙，就是一个没人敢碰的毒瘤恶疮。他纠集家族成员、“两劳”释放人员组成黑恶势力团伙，私买枪械，私设刑堂，在白沙湖一带为非作歹，伤人过百，命案累累。登封市案件多发，但破案率低。在登封市直几十个局委机关中，公安局连续多年行风评议倒数第一。

现状，使新任公安局局长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上任第一天，与班子成员见过面后，已是中午 12 点多了，任长霞叫来已回家吃饭的督察队长常守豪：“走，到警亭、派出所看看去！”这一看，直看到晚上 11 点，老常领教了新任女局长的厉害。

开展工作刚刚 5 天，犯罪分子就给任长霞送来了“见面礼”。

4 月 15 日，一浙江女子在登封东金店乡被人强奸后，掐昏焚烧，被烧醒的少女爬到路边报了案。案情迅速传给任长霞，她拍案而起，抽调

精兵展开侦查。午夜时分，任长霞在现场召集专案民警，听取汇报，研究案情。33小时后，嫌犯被缉拿归案。

破案过程中，任局长半夜了还开汇报会，一改过去登封警察拖沓之风，为及时破案赢得了时间。“不到案发现场的公安局局长，不是一个好局长。”干过预审、搞过技侦、业务娴熟的任长霞将“把刑侦放在公安工作首位”的理念带到了登封。她对登封刑侦格局重新进行定位，一次投入70万元，改善装备。案件发生在哪儿，兵力就部署到哪儿，后勤保障等各个警种全力为破案服务，案件不破，绝不收兵！

任长霞是河南省公安系统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公安局局长。上任伊始，任长霞在整顿队伍、严肃警风的同时，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了破大案、破积案上，打响了一场又一场攻坚战。

西岭地区的万羊岗，5年间有22名妇女在此被强奸，4人被杀，案件一直悬而未决，当地群众一片恐慌。听到反映，任长霞和两位女警一起，打扮成当地妇女在这条人烟稀少的路上来回行走，引狼出洞。经过4个月的艰苦侦查，躲藏在寺庙里的嫌犯王少峰终被抓获。

在登封白沙湖一带，以王松为首的黑恶势力团伙横行乡里，致百名群众受伤，7名群众丧命。冯长庚就因为在水库边洗脚，被王松手下诬为偷鱼而被刺一刀，打断5根肋骨。在一个局长接待日里，冯长庚试探着向任长霞诉说了自己的冤情，倾吐了不敢明告状，却又不甘心的苦衷，引起了任长霞的高度重视，曾担任过郑州市打黑专案组副组长的任长霞，对王松团伙早有耳闻。在派人密访暗查掌握基本案情后，任长霞决心打掉这个背景复杂、组织严密、危害极大的犯罪团伙。到任登封公安局局长的第18天，即在郑州市公安局的联合指挥下，设计智擒了王松，其团伙成员一一落网。

作为全国十大打黑案件之一的典型案例，登封市公安局受到了有关

部门的表彰。消息传开，老百姓奔走相告，称颂任长霞敢于打黑碰硬，为民除害。受害人冯长庚满含热泪：“像这样棘手的案件，她可以找一千个借口搪塞，找一万个理由推托，可她没有，她情愿为咱百姓当靠山！”

积案何止一个！有，任长霞就严厉打击，长期在君召、石道等地活动的李心建团伙，草菅人命，欺男霸女，当地群众敢怒不敢言。在打掉李心建团伙时，君召等地群众慑于淫威，没人敢提供犯罪线索。任长霞戴着草帽，装扮成一个收兔毛的农村妇女，三入君召、石道两乡，收集罪证，终将该团伙摧毁。

不仅针对犯罪团伙，任长霞是哪里有案哪里办。1990年9月8日晚，君召乡韩素珍的女儿和另一名女孩儿被犯罪分子强奸杀害，由于种种原因，案件长期未破。2001年5月，任长霞在局长接待日上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心拿下这一陈年积案。2002年8月26日，犯罪嫌疑人赵占义被抓获归案，11年的悬案有了结果。

“要是嵩山搬得动，我就用它为任局长立碑！”韩素珍为表达对任长霞这位“女神警”的崇敬之情，筹措1000元，为她铭刻了一块正面镌刻着“有为而威邪恶畏，为民得民万民颂”14个大字的“功德碑”。2003年4月10日，她带领君召乡郭岭村的村民们敲锣打鼓，来公安局给任长霞立碑。任长霞坚辞不让，村民们说啥也非立不可。任长霞最终没有拗过，同意让大家把碑立在公安局后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等乡亲们离去后，任长霞立即让民警把碑拆了。村民们事后感叹：“任局长能拆掉石碑，可她拆不掉俺老百姓的心碑！”

作为村民代表，张生林向上级反映村里财务混乱问题，受到报复，被打成重伤，颅骨至今塌陷。由于案子长期得不到公正处理，无奈之下，他常年上访，历尽艰辛。对他的申诉，任长霞极为重视，很快使案情获得重大突破。每次见他，任长霞总是嘘寒问暖，逢年过节，多有体恤。

不到半年，大冶镇火石岭村绑架案、“5·18”特大盗枪案、石道杀人案、强奸轮奸女教师案、唐庄杀妻杀子案等一一告破。一批批群众敲锣打鼓，吹着唢呐，把一面面锦旗和镜匾送到了公安局。在白坪公捕现场，群众自发地打出了“任局长，辛苦了”的巨大横幅，来感谢他们的“女神警”。面对赞誉，任长霞冷静地说：“侦查破案，保百姓一方平安，这是警察的天职。发现线索，必须彻查，对祸害百姓者，坚决打击！”

保一方平安，不仅是要破解凶案，普通案件也得重视。2002年夏，登封市区连丢了几辆摩托车，任长霞下令全城搜查。有民警说：“在城区丢几辆摩托车，很正常，没必要费这么大的劲儿。”任长霞说：“丢一辆摩托车，对民警来说是小事，对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大事儿。”后来案件得到及时侦破。

在破解案件的同时，为了变被动为主动，任长霞又着手解决深层次问题。2001年4月25日，她抽调20多名民警成立“控申专案组”，变上访为下访，把控申工作查处信访积案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她把每周六定为局长接待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3年中共接待群众信访3000多人次，使400多户上访老户罢访息诉，被登封老百姓赞誉为“任青天”“女包公”。

事实带来认可。任长霞上任第一年，公安局在全市行风评议中一跃至前五位，这是登封市公安局多年来的第一次。

人间温情

2000年9月16日，中岳区任村村民陈秀英在一起纠纷中被打成重伤，事发后犯罪嫌疑人潜逃外地。陈秀英在医院做了两次手术，头上留下小碗口大的塌陷伤痕。由于案件迟迟未破，陈秀英踏上了上访告状之路。

“2001年5月的一个局长接待日，我到市公安局去申诉。那天的情景我到死都忘不了。任局长拉着我的手，问我啥事儿，我把告状材料递给她，她看了材料后，轻轻地摸了一遍我头上那块去掉颅骨仅剩头皮包着的软坑，惊讶地说了声：‘咦！咋打成这样！’她的泪水顷刻流了下来，双手扶住我的肩问：‘人呢？’我说‘跑了’。任局长说：‘你放心，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把他抓回来！’当时在场的100多个告状乡亲中许多人都哭出了声。”“任局长的心咋与咱老百姓的心贴得这么近，对咱这么亲！她也不嫌弃俺农村妇女蓬头垢面身上脏，在我头上摸了一遍又一遍。你知道，就这一摸，把俺的心都摸暖啦！”从公安局出来，陈秀英抑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经过两年多的艰苦侦查，2004年2月，任长霞指挥民警终于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从那以后，陈秀英每次进城看病买药办事情，都要到公安局门口转转，总想看看任局长。

2003年12月18日，是一起重大案件告破的日子。在石坡爻村召开的公捕大会现场，囚车缓缓开动。一个小姑娘抱着一个小孩死命地追赶着囚车。小孩一声声哭喊着“爸爸”“爸爸”，撕人心肺。小姑娘是犯罪嫌疑人王小伟的侄女，孩子就是他刚满3岁的儿子。因为家里穷，前两年他老婆跟他离婚了，家里还有一个年近古稀的老母亲。

听到孩子的叫声，犯罪嫌疑人眼睛紧闭，牙关紧咬，痛苦地将头埋在怀里。见到这个情景，任长霞走过去让民警把犯罪嫌疑人从囚车上押下来，说：“打开手铐，让他们父子再见上一面。”犯罪嫌疑人看到还不懂事的儿子时，露出了人性的一面，抱着儿子号啕大哭。这时，任长霞蹲了下来，用双手轻抚着孩子的脸，从衣兜里摸出100元，递给一位邻居说：“给孩子买点吃的，以后孩子有啥困难就去公安局找我，我叫任长霞。”说完扭头就走了。

当时在现场采访的任俊杰回忆说：“当我过一会儿再见到任局长时，

发现她在悄悄抹泪。”“任姐，你哭了？”她对我说：“唉，孩子真可怜！女人泪窝浅啊！”

高墙电网，厚门铁窗。5月25日下午，记者在登封市看守所见到了犯罪嫌疑人王小伟。第一次听到任局长遇难的消息，王小伟抱头痛哭：“她可是个好人啊，不该走这么早！”好大一会儿，他抬起头来说：“我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孩子。如果有机会出去，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坟上看看任局长，给她烧香磕头。”女性的慈悲是博大的，因为博大才显得伟大。

“任妈妈这一走，我又成了没妈的孩子！”登封市直二中初一女生刘春雨还没开口就失声痛哭，泪滴像断了线的珠子洒落在她手中的作文簿上——《我心中一盏不灭的灯》。窗外，风摇月季，雨打花蕾。小春雨断断续续讲述着她被“任妈妈”收养的一段情缘。

2001年5月，大冶镇西施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刘春雨的父亲不幸遇难，两年前失去母亲的刘春雨成了一名孤儿。任长霞在处理这起事故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眼含热泪拉过小春雨的手：“孩子，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闺女！”自此，任长霞独自承担了小春雨生活和学习的全部费用。

“任妈妈要是活着，她一定会给我送来生日礼物！”5月24日，记者采访小春雨时，这天正巧是她14岁的生日，她说，前年她过生日，任妈妈给她穿鞋的那一幕总是出现在眼前：“2002年深秋的一天，任妈妈到我家来看我，给我带来一双运动鞋和一件粉红色棉袄。她蹲在地上给我穿鞋，见到我的袜子破了一个窟窿，就说，‘这咋穿哪，给你点儿钱去买双新的’。我的眼泪唰地一下掉了下来，要不是当时旁边站着别人，我真想搂住她亲她一口，叫一声‘妈妈’。”

按当地习俗，披麻戴孝摔老盆，是亲生长子为父母送葬时才能行的最重的大孝礼仪，可在5月17日送别任妈妈那天，小春雨披麻戴孝，在

任长霞的遗体旁久跪不起，哭成泪人。她告诉记者：“当时我真想把躺在那里的任妈妈拉出来。要不，她就会被灵车拉走，再也见不到了。”“以前任妈妈工作忙得总顾不上回家，我宁愿她的骨灰放回家中，好让她再享受多一点家的温馨。要是放在陵园里，她太孤独了，连个说话的伴儿都没有……”

怀有这种感情的又何止一个小春雨？2002年1月，任长霞为了使更多的孩子得到救助，向民警发出倡议，在全局开展了“百名民警救助百名贫困学生”的活动。全市有126名贫困学生得到了干警们的救助，重返校园。在为任长霞送行的那天，孩子们哪一个不是手扶灵柩，声声哭喊着他们敬爱的任妈妈！

公而忘私

“说不生她的气是假的！几个月见不了她一面，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几句话，一顿饭就走了。我就是再想她，也不敢给患有脑出血的老伴说，只有独自落泪，一哭半夜。我给邻居说，我算是给公安局生了个闺女。说实话，她心里很少有家的概念、父母的位置。”任长霞的母亲抹了一把泪，“再想，她也对，家人再亲就这几口儿，那登封可有60多万人哪，不这样真的不中啊！”

“她的时间就像桶里的豆子，抓给事业上的多了，剩给家人的就少了。在这方面她固执得很，必须按她的原则办。说白了，工作上的事，群众的事不能挤，唯一能挤的就是给家人的时间。”任长霞的丈夫卫春晓律师说，“当初，我下班早了，给她倒杯水；她下班早了，给我倒杯水。多少回，她小鸟依人般偎在我怀里。随着她肩上的担子逐步加重，这些慢慢都没有了。她偶尔回家一次，也是不停地打电话说工作，或者倒头

就睡，叫都叫不醒。‘春晓，咱老夫老妻了，我真的太累，顾不了家，你多担待点儿。’”看似刚烈的卫春晓泪花闪闪……

“其实，妈妈很爱我，就是因为她太忙，很少有时间回家陪我。今年3月16日，我患病在医院动手术，痛得全身流汗，特别想妈妈，忍不住就给她拨通了电话。妈妈说，工作忙完了就来陪我。我听到妈妈在电话那头哭：‘卯卯，好孩子，妈妈腾开手，一定去看你，一定！’为了让妈妈到医院来看我，也好让她借机休息一下，我故意在医院里多待了几天，可直到我出院，妈妈也没顾上来看我一回。妈妈从来说话算数，可这次却永远地失信了……”任长霞的儿子卫辰尧一边讲述一边痛哭。

“要用百分比打分，你给妈妈多少分？”卯卯沉思了片刻：“顶多80分，因为她陪我的时间太少了！”

又一个80分！面对同样的问题，长霞的丈夫给了她同样的分数！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女人，如果说任长霞也有她的不足和缺陷，那无疑是一种英雄的残缺，残缺的美丽，美丽的崇高！

“说实话，姐姐人长得很美，也很爱美。除了警服，还特别喜爱红衣服——红夹克、红毛衣、红衬衫、红围巾。她自己就说，‘爱红装又爱武装’。说真的，不管啥衣服，姐姐咋穿都好看。”任长霞的妹妹任丽娟翻看着姐姐的照片，眼里闪着酸楚的泪光。

她的话印证了长霞的美与爱美。记者在任长霞局长办公室的洗面台上发现，她的玉照下也有不少女人化妆用的必需品，一瓶忘记拧盖的化妆品仍散发着淡淡的芳香。

“这是唯一的一张全家福。”任长霞穿着红色的夹克衫格外醒目，格外妩媚。丽娟说，2002年春节，妈妈提议让姐姐回来，团圆一次，顺便照张全家福。可她说要值班，没空。我们全家就不期而至，“突袭”登封，硬是“逮”住她照了这张相。“她终究还是走了，撇下我们大家，留下一

个残缺的家！”任丽娟镜片里的两窝泪水在盈盈晃动。

还有一张长霞身着警服，手持手机正在通话的照片。她一脸坚毅，显得特别飒爽。“其实，全家都习惯了，都理解她，支持她，包括至今仍被蒙在鼓里的瘫痪的父亲，从来都不给姐姐添麻烦。”

指着这张照片，丽娟说：“去殡仪馆为姐姐送行那天，妈妈把我拉到一边，让我给姐姐‘捎’去个手机，说我姐离不开手机，为那工作上的事，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不能临走连个手机都没有！”

猝然长逝

2004年4月14日晚，任长霞在侦破“1·30”案件中途经郑少高速公路时发生车祸，不幸因公殉职，年仅40岁。40岁正是人生最壮美的季节，然而，任长霞却猝然倒在了为之奋斗不息的公安事业上。她以自己的忠诚、才干和辉煌业绩，以自己的毕生心血履行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神圣职责。

她是公安局局长的榜样，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十大女杰”“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2004年6月，公安部追授任长霞“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她是个优秀的公安局局长，却不是优秀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她把有限的生命时光几乎全都用到了事业上，留给家人亲友的唯有痛惜的泪水。嵩岳无言，颍水低回。雨像泪一样飘洒，泪如雨一般倾诉。

说到舍小家为大家的任长霞，她曾经的搭档、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全国优秀刑警队长杨玉章说：“干公安局局长这一角儿，别说是女同志，就是大老爷们儿也得咬牙硬挺，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过，一个身子分成仨。长霞就是再优秀，登封治安状况那么复杂，她既要破案、扫黑、带

队伍，还要接访、调研、顾群众，她能有多少时间来顾及家人?!”这位剽悍的铁血汉子硬是半分钟没说话，生生把将要流出的泪水憋了回去。

“闻讣沈阳已吞声，泪水随机过百城。此后无计可问谁，九躬难尽战友情。”闻知噩耗时，任长霞的战友、登封市公安局政委刘丛德正在沈阳出差，在火速赶往登封的途中挥泪写下了这首小诗。任长霞的搭档、登封市公安局政委刘丛德说，她清晰的思路、强烈的责任心、高超的破案技巧、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给登封市公安局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足以让人品味一生。

三年来的并肩战斗，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长霞逢事总是想别人的多，想自己的少。她到登封后的三个春节，都因为事情多，是在局里过的。2004年大年三十，长霞又坚持让我回家过年，她值班。我知道，她爹因脑出血偏瘫，娘的身体也不好。让我回家，老婆孩子围着，我怎么安心吃得下饺子？那天晚上，我带着爱人一起去看望了她的父母。”

刘丛德把头埋入双手，声音哽咽：“今年的春节她真的回不去了！长霞，你是顾不上了，就让我们替你尽孝吧，你放心走好！”

大德无碑，大道无形。谁心里装着百姓，百姓就把你刻上心碑！历史就这么公道！

（《人民日报》2021年6月11日）

人物小传

任长霞 1964 年出生在郑州一个工人家庭，1983 年从河南省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工作，先后担任预审科民警、预审科副科长、法制室主任。1998 年，任长霞担任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

技侦支队支队长。

2001年4月，任长霞调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成为河南公安系统第一位女公安局局长。她深入基层调查，整顿队伍、严肃警风、破大案、破积案，抓获了中原第一盗窃高档轿车案主犯，先后打掉了7个涉黑团伙，破获了300多起抢劫、杀人等重特大案件。

任长霞抽调20多名民警成立“控申专案组”，把每周六定为局长接待群众日，共接待群众3467人次，使476户上访老户罢访息诉，被广大人民群众赞誉为“任青天”“女包公”。

2004年4月14日晚，任长霞在侦破“1·30”案件从郑州返回登封途中突遇车祸，因伤势过重不幸殉职，年仅40岁。任长霞牺牲后被公安部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



宋鱼水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一身正气的“阳光”法官

作为法官，必须把司法的公正性展示给百姓，把司法的温暖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给百姓，让他们正确对待裁判，理智接受输赢。

——宋鱼水

与宋鱼水认识的人描述她时用得最多的形容词是“朴实、谦虚”。好友马秀荣干脆说，“她是个典型的中国妇女”。就是这个典型的中国妇女，后来让人们认识到什么是公正的幸福司法。而这一切，发端于她的农村情怀。

心系农民

宋鱼水出生在山东蓬莱一个距县城 60 多公里的小山村。家乡有起伏绵延的群山，也有肥沃的土地，那里的土地养育了朴素善良的她。父母为什么给她起鱼水这个名字？她说当地有驻军，电影《三进山城》就是在那里拍摄的。可能父亲心里有军民鱼水情，亦可能她出生的宋村是京剧之乡，父亲兴许是从戏文中给她起名鱼水。越是朴素越是美丽，父母就给她起了这个朴素的名字，让她至今仍像家乡的泥土和草木一样朴实无华。

11 岁那年，家中突遭大变。父亲和孩子一向依赖的母亲突然腿动不了卧病在床，做家务和照顾弟弟们的重担完全落在宋鱼水身上，她因此一度辍学。本来好好地在上学，自己也对未来有着诸多美好向往，现在，失学的苦闷连同陷于生活困境的难受感觉，一直牢牢抓住她，并在她心里生根。后来能够再次读书，她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

小时候的宋鱼水经常目睹生产队里因粮食、柴草等分配不公而起纷争，因此闹得不欢而散。她听不惯那些纷争的声音，心想：“我要是包公就好了，可以给乡亲们公平地解决纷争。”从小她就感觉到公平合理是底层百姓最朴实的需要。

正是那种公平的意识促使她发愤读书，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专业。“高考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命运，更改变了农村人的命运。我所理解的高考很简单：知识改变命运。像无数个农村大学生一样，从乡土文明到城市文明，高考成了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回想当年得知自己被大学录取时的情形，宋鱼水至今依然印象深刻：“我家在农村，当时领取高考录取通知书时正赶上农村发大水的雨季。我

与另一位邻村女孩骑着二八式的自行车下山之后，眼前是泥沙俱下的洪水，但我们两个很有劲儿地扛起二八车，挽上裤腿，任凭河水漫过膝盖，毫无畏惧。那种穿过高山、跨过河流，奔向外面世界的向往就这样开始了。”

许多年后，早年的经历非但没有被淡忘，反而升华至一种自觉的职业和人生动力。

人是有使命的。对于这句话，宋鱼水有着自己的理解，她说：“在我们农村，每家每户无不希望家里出一名大学生。所以，对一名农村大学生而言，他／她的出现既是个人的希望、家里人的希望，更是村里人的希望。我小时候一直受到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到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读书以来，一直有改变农民命运的思考。”

宋鱼水始终相信，农民工在城里打工，接受的是现代都市文化的洗礼。他们是改变农村命运的主力军，他们正在以各种方式把城市的信息打包带回农村。等他们再次返乡时，这些经过大城市熏陶的农村人带回的将是新的文明。所以，从事法院工作后，她对小额案件或农民工的案件一直高度重视，这与她的乡土情结密不可分。

2006年，宋鱼水作为时代先锋报告团的成员在全国各地宣讲，她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小额案件与标的重大的案件相比，虽不值一提，但能为一点钱上法院的人大多是贫苦的人。我一生中可能会审几千件案子，但许多当事人一辈子可能就进一次法院，如果就是这唯一一次与法律的接触让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在他们心中会永远留下一个伤痕。伤害一个当事人，就会多一群怀疑法律的人；维护一个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就增加一分。”

“这段话确实是我内心宣誓性的表白，尽管我从未回到农村创业，但平凡而奋斗的一生确实是为农村的改变而来到都市。这种心结从未改变。”

宋鱼水饱含真情地说。

法律情怀

1985年至1989年，宋鱼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那时，同学之间经常在各种沙龙上对法律知识进行讨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这种辩论文化对她的法官生涯影响深远。宋鱼水办案风格以八个字流传在法律界：辨法析理，胜败皆服。

法学院的“辩论文化”对宋鱼水影响很大。那个时代，法学刚刚兴起，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越来越重要。宋鱼水认为自己比较幸运，那会儿的青年教师，都是现在的大家和名家。他们自己也成了知名法官，比如，王利明、韩大元、刘春田、龙翼飞、林嘉、陈卫东等。法学院是优秀老师会集的地方，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讲课风采，对宋鱼水和同学们的影响深远。

那时很重视本科教育，不论课上课下，老师们对学生投入不少心力。年轻老师住在筒子楼里，都在楼道里做饭，有时候还邀请学生们去吃饭，挺温馨的。

可能是受到改革开放的热情激发，那时同学之间非常爱聊天，晚上在宿舍里会一直聊到熄灯之后，直到有人说不许再聊了，大家才睡觉。那种习惯对宋鱼水影响至今。宋鱼水发言不是很多，但是特别喜欢听同学讨论。这跟她后来的法官职业很像，法官需要听进意见以后，再研究问题、下结论。

宋鱼水从一开始就有远大的理想——从事法律职业，这是坚定不移的。在她看来，法律有着最大的善。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是以善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对违法行为的惩处，也是希望把违法的人变成守法的

人、善良的人，她愿意为这种善良付出努力。

在谈及当年一个农村女孩为什么会选择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律专业时，宋鱼水坦言她喜欢公平公正的法律文化。

“我最早的启蒙来自对农村现象的思考和农民朴素的正义观，现在的积淀则是对学校系统教育和司法实践的感悟，”宋鱼水说，“我喜欢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名字，至少字面上理解，它应该是一座人民的大学，可以终生追求人民的滋养和人民的文化，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特别是当自己的私欲无限膨胀时，它会时时给你提供精神上的钙，不断提醒你别辜负这所学校的培养，勿忘初心，砥砺前行。”

在象牙塔的岁月里，宋鱼水与法律相伴了四年。这段经历给她带来了三个改变：“大学学习法律专业，首先让我树立了法律的理想。特别是‘辨法析理，胜败皆服’‘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些都是我终生奋斗的理想，接受这些理想离不开前期的教育。假如理想是从青春开始的，那么我的理想是从人民大学的专业训练开始的。”

“第二个改变是让我具备了专业知识的理念、体系和能力，”宋鱼水说，“大学是培养专业知识的人才，有了专业技能才能更有专业性地工作。对我而言，这是我做法官的重要前提。”

谈到第三个改变，宋鱼水认为是求真务实，干事创业从点滴做起，从基层岗位干起。她说：“人大具有求真务实的精神，我上大学没多久，人大的东校门就搬来了一块儿大理石——‘求真务实’石。工作之后，各种偶然与必然的因素，我的青春奉献在海淀区人民法院，我也吸引了很多校友在海淀区人民法院等基层法院工作。比如，李颖、陈昶屹等一批年轻的优秀法官已经成长起来。”

“之所以热爱基层，是因为基层的改变是基础的变化，老百姓的变化

是真正幸福的变化。面对基层和基础非常难，但从我做起，每个人都投入，一切就会慢慢改变，产生质的变化就容易得多。”宋鱼水真诚地说。

她说：“我自己曾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希望所有的人能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对那些困境中的人，我总是很容易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激起尽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帮助他们的冲动。”

此情至真至深，几乎成为本能。某天，面对众多年轻记者，宋鱼水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常常不厌其烦、连续数小时倾听当事人的陈述，乃至包容他们的激烈情绪和语无伦次时，突然一反常态果断地摆手说：“其实，你们不会真的明白我的感受。”那一刻，她看起来无奈而惆怅。

与民同心

1993年，宋鱼水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并可以独立办案，那个时候她承办的案件基本都是小案子。她办的第一个案子，原告是个普通的民工。

那是一个寒冬的早晨，一个20来岁的农民工坐在海淀区法院经济庭的办公室里。他穿得非常单薄，破旧的衣服已经看不出颜色了，尽管屋里有暖气，但他还是冷得微微发抖。民工对宋鱼水说：“我起早贪黑给一家饭馆送了一年的菜，一直没给钱。临近年根儿，我冒着严寒一趟趟去要，求完服务员，求老板，饭馆的人烦了，连推带搡地把我赶了出来。”

宋鱼水一边询问小伙子，一边做笔录。桌面上，放着一份起诉书，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显然是小伙子写的。宋鱼水了解这个农民工的处境后，心里非常难受。她出生在农村，深知农民生活的艰苦，一年的菜钱、工钱对这个农民来说就是全部的收入。

宋鱼水做完笔录，就冒着寒风去找餐馆的老板。那时法院办案的程序很简单，不像现在立案、审理、执行分别由不同部门负责。那时所有

的程序都由一个法官负责。宋鱼水见到饭馆的老板，说明了来意，没想到老板也向她倒了一肚子的苦水。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家饭馆因为经营不善，已经多次倒手。之前那个买了民工蔬菜的老板早就不见踪影。现在这个老板说：“法官同志，自从我租了这个饭馆，就没少遇到这种事情，好多人成天追着我要面钱、米钱，我冤不冤呢？”

宋鱼水告诉他说：“你冤，但那个民工更冤。这账虽不是你欠的，但你承租了这个饭馆，你就应该先还给他！按照法律规定，你可以向过去的承租人追债，但你现在必须先把钱给他。”

听了宋鱼水的一番道理，饭馆老板答应把欠账都还了。这个案子顺利结案了，而那个农民工拿到钱后痛哭流涕，因为他重病的妻子和上学的孩子都需要这笔钱。农民工的泪水让宋鱼水的内心深受触动，她感觉到作为一名法官的责任更重了。

在宋鱼水心里有一杆秤，它维护着百姓的权益和法律的尊严。宋鱼水，这个名字从一开始就为她和百姓的紧密相连埋下了伏笔，尽管她早年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这位专家型法官从小在农村生活，依靠国家的助学金资助顺利读完了大学。家庭环境和后天的成长使得她比一般人有更多的理解、耐心和宽容，也对弱势群体内心的苦楚和渴望更加感同身受。从接手第一起案件起，她始终坚持对待弱势和强权一律平等、对民工和权贵一视同仁的原则。宋鱼水至今对当法官独立承办的第一起案件记忆犹新。

“这些弱势群体往往缺乏法律知识，举证困难，如何保证法律判决的公平和公正呢？”对这一疑问，宋鱼水认为，她只是在基层工作的一个普通公民，希望大家的生活和工作都有质量，她很关注如何让普通人幸福地生活和工作，把法律当作维护当事人权益的一种有效手段。

“法官不仅要利用法律的威严解决问题，更要通过自己的言行关爱

当事人。让他们信仰法律，敬畏法律，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并在以后的生活中善于用法律武器和法律知识保护自己。”宋鱼水多次提到了这个观点。

在她看来，法律是公正和善良的艺术。只有充分尊重、理解当事人，善于倾听，才能让当事人接近你，与你沟通，促进问题的解决。

此外，宋鱼水还说：“判案过程中首先和当事人有效地沟通，了解双方的真实想法，并分析这起案件的疑难点所在，找到最能说服当事人的角度，调动当事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处于弱势的一方，要帮他分析胜诉的希望在哪里、如何找到最有力的证据。充分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真正站在他的立场分析、考虑问题，用我们的知识和当事人共同探讨，取得当事人的信任，从而很多问题就能破解。”

宋鱼水最有名的庭审风格之一，是无论时间多长、当事人的身份和举证能力如何，她永远目光直视对方。一位律师说，法官是知识含量很高的职业，很多受过这方面教育的人不由得会产生职业优越感，精英意识很强，过度重视技术性结果，缺乏对当事人的人文关切。

与她共事十几年的法官曲育京说，她是把朴素的个人同情心，放大成更高层次的对社会大众的宽容与善待。

阳光公正

法律的力量在于公正，法官的分量也在于公正。独立办案11年，宋鱼水执着地守护着公正：审案1200余件，其中300余件属疑案难案，没有一件因裁判不公被投诉被举报，连败诉方也诚心送上锦旗“辨法析理，胜败皆服”。

她是“阳光”法官，第一眼看见宋鱼水，当事人几乎都有这种感

觉——这张脸，正气、智慧，又真诚、温和。

身为法官，宋鱼水常常换位思考。她说：“法官中立审案，保持距离，不是保持冷漠。”

宋鱼水以耐心出名。

一位老作家曾因稿酬纠纷告到法院。庭审中，这位老作家用诗一样的语言来回十几遍反复阐述自己的观点，旁听的人打起了瞌睡。但作为审判长的宋鱼水，目光却一直没有离开当事人。直到对方语毕，宋鱼水才向双方讲解出版合同方面的法律规定，老作家仔细聆听宋鱼水的讲解，突然出人意料地说：“法官，我接受被告的方案。这事发生后，你是第一个完完整整听完我讲话的人，你对我的尊重让我信任你，我尊重法庭的意见。”

“让当事人把话讲完。”话虽简单，做起来却不易。对一个案子有耐心，容易；对所有案子有耐心，需要长期培养。

耐心、尊重，让宋鱼水走近当事人，彼此多了份信任。

“大风和阳光比威。风说：‘我威力大，能把人的衣服吹掉。’一阵狂风，人反把衣服裹紧。太阳无语，阳光暖暖，让人自然脱掉外衣。”

审判台上，宋鱼水细致严谨，又亲切平和；旁听席上，北京市人大代表高扬，不由得想起这则伊索寓言。

旁听者与当事人，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她，结论却是一样：“她像阳光，以无形的力量让人折服。”因为司法办案能力强，而且态度好，她成为“满意”法官。她认为，办案中任何差错都不可原谅。

曾经，三次官司，宋鱼水判了一胜一败一平。为这一平，代理人拿着法条找她理论。两个多小时，宋鱼水从容应答。代理人心服口服：“在你这儿打官司不是一次两次，赢得堂堂正正，输得明明白白。”两天后，“辨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大红锦旗送到海淀区法院。

在宋鱼水眼中，公正，沉甸甸。

让所有当事人都满意，难；一名法官，却不能停止努力。

认定事实不能有误，适用法律不能偏颇，判决书不能有纰漏……宋鱼水时刻警醒自己：“案件任何差错都不可原谅！”

要让当事人认可公正，不能一判了之。宋鱼水说：“法官应当是‘传道者’，不但要判，还要释理，把法律的理念传递给当事人。”给当事人看的判决书，也成了释理的“平台”。随手翻开一份，苦涩的法律条文，都被精心转化成生活规则，通俗易懂。宋鱼水说：“既要回答当事人最关心的问题，还要让他们看明白。”

曾经恨过她的当事人，专门写来贺年卡：“是您启发了我怎样做人。”“法官能得到这样的‘待遇’，不容易。”海淀区法院副院长陈琦十分感慨。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身为农民的女儿，宋鱼水更是拥有一颗爱民心。从当法官第一天起，宋鱼水给自己“约法三章”：不轻视小额案件，不轻视困难群体，不轻视当事人的任何权利。

11年来，无论案件大小，无论外地人本地人，无论是掏不起诉讼费的贫困群众还是腰缠万贯的富翁，宋法官都一视同仁。

因为公正，她是司法系统中的“免检”法官。是啊，只要心不贪，没有推不了的人情。

“小宋这人，我敢打包票。”在海淀法院领导的眼中，宋鱼水属“免检”。

法官有权。一纸判决，能令公司倒闭，也能使人命运改辙。更何况身为庭长，她的意见多少可能“左右”判决。

法官无权。找过宋鱼水的人都知道她的“名言”——法官有权又无权。法官行使国家权力，只能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平和正义。如果不能保证“天

平”平衡，就没有资格当法官。

认为法官有权，找上门来的不少。那一年，宋鱼水刚当上经济庭副庭长，老家就来人了。亲戚说情的这起案子，恰恰就在经济庭。但她却不能开这个口……“我不怪你！”听到善良的亲戚理解自己，她的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这些年，教过她的老师、共患难的同学，都做过她的当事人。发现需要回避的，她主动申请；经手的案件，她也“不近人情”。

有朋友怨过她。“人们更敬佩按照法律原则判案的法官。”宋鱼水相信正义的力量。

有人疑惑：十几年时间，上千件案件，就没有一次推不掉的人情？“只要心不贪，没有推不了的人情。”宋鱼水做得义无反顾。

十余年来，宋鱼水紧紧守住公正的底线：没有一件案子因裁判不公被投诉被举报；没有收过当事人一件礼品；没有办过一件人情案；也没有利用庭长职务，向审判人员施加过任何不公正的影响。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法律忠诚，这是宋鱼水的品格。正是这种品格，造就了她追求公正、维护公正、代表公正的意志。

让百姓相信法律，让社会拥有公平，这就是公正的力量。

与时俱进

中国在改革中前进，社会正处在由人治向法治过渡时期。法律也从非主流文化渐渐地走向主流文化，已日益被人关注。在经济发展的当下，人们格外注重以法律维护自身权利。就宋法官主持的海淀法院知识产权庭而言，接到的案件也迅速增加。在数年里，宋法官调查、审理、调解、

判决的案子达 1300 余件，这些案件里浸透了宋法官的汗水和智慧，她创造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她的故事被社会传诵着，感动过千万人。

审判工作折射出国家发展变化。在宋鱼水看来，一个基层法院所折射出的案件和人才队伍的变化，都与国家的发展和人才供给有关，也与高考带来的社会进步有关。

“案件是非常敏感的，分析案件的矛盾点能够敏锐地发现社会发展的需求。总的来说，我体验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宋鱼水向记者分析道，“第一阶段，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经济案件异常活跃。各种各样的纠纷也是市场主体的法治意识增强、市场规则的法治建设加速导致的，案例成为市场法治文化的重要牵引。

“第二阶段，市场经济深入发展阶段，知识产权案件凸显活跃。从知识产权审判庭的建设，到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背后有案件的支撑。知识产权案件的最大特点是经济模式的升级，是专利、商标、著作权的产业升级。案件越活跃，越意味着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在发生本质的变化，知识产权的人才储备在不断增强。案件的推广无疑在加大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传播，用法律制度呵护知识产权已成为社会的共识。

“第三阶段，民事案件空前爆发，公民权利和义务体系的背后是公民理性和社会人才的整体实力提升，法治社会呵护的是全社会的人才建设体系，人才是最重要的竞争力。”

面对时代发展所带来的新变化，宋鱼水有着清醒的认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对各个群体的专业素质和专业实力要求就会越多，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整体期待就越高，其中有两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司法建设处在国家法治建设最活跃的时期，法院的精神文明建设更加凸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并行发展和相互促进的，当市场经济对法院干警产生巨大诱惑力的时候，法院干警的稳定性、精神上的软实力是新时期

的重要课题，也是确保司法改革成功、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正义保障。二是本次司法改革一方面优化了司法队伍，另一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司法的人才储备还需要艰苦的发展历程，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要掌握好节奏。”宋鱼水感言：“现在，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很高，无论是案件量的挑战，还是队伍实力的挑战都很大，这注定了司法的发展不是风花雪月，而是砥砺前行。”

“法律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质是社会责任感，假如你热爱公益，不妨报考法律。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司法，而正义永远是司法的目标。”宋鱼水满怀信心地说。

幸福司法

尽管宋鱼水拥有无上的荣誉，但通往荣誉的道路并不总是铺满鲜花。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席卷了整个中国，很多人不愿拿一份死工资，纷纷下海或转行。宋鱼水告诉记者，因为当时案多人少，法官常年超负荷地工作，劳动和报酬不成正比，法官和律师的经济收入差距比较大。尽管如此，当有人问宋鱼水是否要转行当律师时，她坚定地说：“一个优秀的律师可能有百万财产，一个合格的法官只能有洁白朴素的生活，我更愿意做一名法官。”这句话是她那个时期的深刻感触。

至今，做一名合格的基层法官依然是宋鱼水的无悔选择。这种坚定不是因为社会给了她太多的荣誉，而是她把法官当作一种神圣的职业，并为能够推动社会的法治建设而自豪。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荣誉和财富时，宋鱼水说，她并不淡化荣誉，因为荣誉的背后有无数工作者的辛勤付出，是长期建设而形成的；荣誉也是一种民族文化，代表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追求。但是人不能躺在功劳

簿上，荣誉代表过去取得的成绩，是过去时，要正确理解荣誉，变荣誉为动力。

宋鱼水说，当她对外宣传法制时，感觉法官的荣誉非常重要，她可以利用这种荣誉所代表的权威把想表达的知识传递给他人。但在单位和同事一起工作时，她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法官，忘掉了这些荣誉。她说：“人要认识到自己的弱项，多看他人的强项，多向他人学习，注重团队精神，创造讨论的氛围，任由别人把自己批得体无完肤，和他们互补长短。”

对于金钱，宋鱼水说她不可否认金钱也是生活的重要一部分，这也是我们发展经济建设的目标。这些年来国家一直注重经济发展，度过了贫困期，人们慢慢富裕起来，人人都渴望成为财富阶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前提必须是合法收入。

而且，如何使用钱非常重要：当我们有充足的物质生活时，很多人把目光转向了税收，热衷于慈善，因为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一个人富有了不一定能幸福。只有整个社会都富起来，我们生活这样的大环境里才会感到幸福。

宋鱼水说：“人是社会的人，我们能给下一代的很少，我们可以给孩子财富，但给不了他们幸福，因为他们要受制于社会的公共发展。他们不可能局限在一个生活小区里，也不可能只待在哪所好学校里，他们总归要接触社会、接地气、接民间，我们希望他们出门时坐公共汽车是安全的，希望医疗设施是完善的、发达的，希望他看到的小朋友都和他是一样的，而这些都得益于强大的公共建设。”她希望有更多的财富投到社会公共事业中，应用于公共设施建设，使金钱惠及更多的民众。

与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相比，宋鱼水更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她相信自己从事的工作可以带给更多人更大的幸福。她渴望通过奋斗使大多数

人获得幸福，希望广大公民都能过上有财富的生活，为了这个目标就算吃苦受罪也值得！

那些孩提时代的深刻记忆已成为她甜美绵长的回味。宋法官说她一直是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先是对生存看得很重，一直在为生存奔波，渴望生存环境的改变。后来又把责任看得太重，自身的条件改变之后，又尽心尽力地报答父母，教育孩子，帮助弟弟、乡亲和朋友，愿老人晚年生活幸福，希望弟弟、孩子、乡亲和朋友拥有自立于社会的能力和精
神。她把责任、亲情和友情都看成她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著名法官，她在法庭内外都一样是温和的态度，这得益于她在生活中的修炼。参悟人生的宋法官，把人生分成三个境界。一是中立的境界，站在这个境界上让人清醒，可用客观的标准判断事物，洞察现实。二是积极的境界，这个境界令人乐观，不会因困难而颓废迷茫，再艰难也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三是舍弃的境界，走向这种境界，会让你拥有伟大而崇高的心灵，使你变得无私无畏、乐于奉献。人生不单独具备某一种境界，在宋法官身上这三种境界都拥有，在工作和生活中，这三种境界都时常在她的人生中起到不同的作用，只是某个时候某种境界的力量有所不同。

她是司法界的模范，以无私的情怀爱着她的当事人。她身上，透着山东女子的善，也裹着北京女人的甜。时代大潮汹涌不息，她努力跟上国家的脚步。生活中的她宽怀淡定，冷静温婉，一如深山里的兰花静谧地绽放，花香清淡却沁人心脾……

（《人民日报》2016年7月8日）

人物小传

宋鱼水，山东省蓬莱人，1966年2月出生，198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济庭工作，1996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专业在职研究生，先后任书记员、审判员、副庭长，海淀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民五庭庭长。

宋鱼水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感情，对审判事业有着执着追求，独立办案十余年来，公正高效地审理了各类民商事案件1700余件，其中500余件属于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均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宋鱼水经手的案件，有70%能够以调解方式结案，她认为与判决相比，调解更符合中国国情，更契合中国人“以和为贵”的理念，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取得“双赢”效果。

宋鱼水将学到的知识和先进司法理念与审判实践紧密结合，注重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考虑案件的处理；她始终把维护社会正义、实现公正高效作为自己最大的人生追求；她确立了“准确把握公正尺度，尽量引导当事人用信任的方式解决纠纷”的办案思路；她充分利用司法手段，高效审结案件，最大限度维护企业利益；她创新适用法律，平等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法律与社会行为规范的整体互动，推动企业在法制轨道上健康运行。她司法为民、心系百姓，平等对待每一名当事人，精心审理每一个案件；她立足国情，注重实际，勇立潮头，敢于攻坚，妥善处理法律尚无明文规定的案件，办理“全国首例”；她勤勉正直，廉洁自律，恪守法官职业道德。

在审理案件中她对自己“约法三章”：第一，不轻视小额案件，因为小额案件往往涉及百姓生活；第二，公平对待每一个当事人，本着善良和正义来适用法律；第三，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当事人，充分尊重当事

人的尊严和利益。

案件审理中，她始终坚持追求四个统一：个案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和谐统一；审判效果与经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遵循法律与创制法律的和谐统一；程序公正与实体正义的和谐统一。

她为自己确立了争当专家型法官的目标，也就是法学理论要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能站在学术前沿进行思考；能在办案中运用理论解决疑难问题，办出高质量的案件。

她被当事人誉为“辨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好法官。一位多年在法院担任监督员的人大代表在听完她的庭审后欣然投书新闻媒体：“审判长准确的判断，透彻的说理，不偏不倚、不怒自威的气质不仅令旁听群众折服，就连败诉方当事人也频频点头。旁听一次好的审判，就是上一堂生动的法制课，给人一种全新的启迪和力量。”

在2005年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宋鱼水被确立为向全党推出的第一个重大先进典型。2007年，宋鱼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期间当选为主席团成员。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宋鱼水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十大女杰、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法官、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官、全国十大法治人物、首都“巾帼十杰”、北京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她还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四青年奖章、中国法官十杰（2003年）金法槌奖、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市杰出人才奖。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并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称号。2011年被评为“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陈
薇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为国铸盾的“人民英雄”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陈薇

陈薇，浙江兰溪人，专业技术少将军衔，现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科协“求是”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担任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安全与防护装备分会主任

委员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2020年8月11日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采访陈薇院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她实在很忙。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研发广谱抗病毒药物，筛查更有效抗体，研发改善新冠肺炎愈后肺纤维化的药物，开展预防、治疗、愈后各项科研……件件都是事关重大的急事难事，必须快马加鞭。

抗击非典疫情、汶川抗震救灾、抗击埃博拉疫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位来自江南水乡的温婉女子，每每在危急关头迸发出不可思议的震撼力量。

2020年8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陈薇“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人民军队熠熠生辉、浩气长存的银河中，又多了一颗璀璨的星。

“这是军人的使命，这份荣誉属于全国全军疫情防控科研攻关战线的所有同志！”此时，陈薇正在执行任务。对她来说，这是军人最好的战位。

在陈薇看来，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如果能与国家需要相结合，个人价值就会成倍放大。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冲锋中，这位巾帼英雄带领团队为国为民铸就生物安全防控坚盾，实现了个人价值的一次次放大。

党和人民需要时，她总能不辱使命，敢打必胜挽狂澜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7款新冠疫苗获批使用，疫苗累计接种已超过17亿剂次。

其中，陈薇团队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腺病毒载体）”，是首个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的疫苗，对全国上下民心士气的稳定，对加紧建立国内群体免疫屏障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最新消息，陈薇团队研发的“雾化吸入用重组新冠疫苗（5型腺病毒载体）”Ⅰ期临床试验数据，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传染病》在线发表，成为国际首个发表的新冠疫苗黏膜免疫临床试验结果。

然而，17个月之前的武汉，刚研制出来的新冠疫苗充满未知。

尽管腺病毒载体已是成熟的技术平台，尽管疫苗已通过了动物试验，但无论有多少理论保障，无论有多少信心支撑，谁都难以保证绝对安全。

“我先试打，半小时后如果我没事，你们再打。”陈薇面色如常，语气如常。

此时，“知情同意书”已签好字，静静摆在桌上；一辆救护车停在楼下，静静待命；一面鲜红的党旗，静静挂在注射室的墙上。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接种半小时后，陈薇未出现不良反应，团队其他成员也开始接种疫苗……

历史，会定格这属于军人的冲锋与胜利。

在武汉抗疫的113天里，陈薇带领团队用一项项关键成果，为最终胜利投下一枚枚决战决胜的砝码——

面对防控初期武汉对核酸检测能力的应急需求，她带领专家组在24小时内搭建起负压帐篷式移动检测实验室，依托自建的“全自动核酸提取平台”，迅速形成日检1000人份的核酸检测能力。

面对临床精确诊断难题，她组织专家组综合病原学、免疫学、遗传学、空气动力学等多学科优势，快速建立了“核酸检测—抗体筛查—多重病原检测”的“三步走”鉴定链条，率先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妇幼光谷医院、泰康同济医院等推广应用，有效提高了临床诊断准确率和治愈率。

疫苗，是抗击疫情最有力的武器。“这个疫苗，必须由中国自主研发！”陈薇明白，军人永远不变的价值，在于打赢每一场战争。

2020年3月16日，陈薇领衔科研团队研制的新冠疫苗，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4月12日，疫苗开展Ⅱ期临床试验；8月11日，该型疫苗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成为国内首个进入临床获得专利权新冠疫苗；2021年2月25日，该型疫苗获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是国内批准的第一个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制备的新冠疫苗……

“专利是我们的、原创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在任何场合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在武汉短短3个多月，陈薇添了不少白发，但她坚定的话语，始终透着胜战的底气。

2020年3月，在武汉疫情防控和疫苗研发最关键的时候，陈薇迎来自己的生日。接到战友祝福，她百忙之中回了一条信息。

信息中有8个字——“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危难之际，她总能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决不惜

这些年，陈薇的高光时刻，总是与一次又一次的急难任务相关联。

与病毒正面遭遇，时间从来不会站在人类这边。一路走来，陈薇面临的，几乎都是与死神争夺生命的“魔鬼课题”。而她，也总能在危难之际，用超乎想象的速度交出一份份优异答卷。

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不管刀山火海，打起背包就出发。超乎想象的速度，体现的是向险而行的勇气，是敢打必胜的能力，更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绝对忠诚。

拳拳之心放在忠诚的天平上，就能解读出军人牺牲奉献的信仰分量——

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陈薇敏锐预判，自己正在研究的 ω 干扰素对此次变种变异性强的SARS冠状病毒有抑制作用。她率课题组连夜

进入实验室，与当时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病毒零距离交锋。

分离非典的冠状病毒、测出病毒的基因图谱、进行“干扰素对抗非典病毒的体外细胞试验”……课题组成员身着厚重防护服、每次持续工作八九个小时，期间不吃不喝甚至不能去卫生间，在最短时间内验证了干扰素的有效性。

——这次战斗，1.4万名预防性使用“重组人干扰素 ω ”喷鼻剂的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

2014年2月，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大规模暴发并迅速蔓延，引发全球恐慌。“埃博拉离中国只有一个航班的距离。”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陈薇挺身而出。

为研发重组埃博拉疫苗，陈薇先后4次带领团队赴塞拉利昂开展临床试验，时常面临与埃博拉患者零距离接触的危险。2014年底，陈薇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的重组埃博拉疫苗进入临床，并实现中国疫苗境外临床试验“零”的突破。

——这次战斗，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疫苗走出国门，在国际传染病防控中彰显了中国力量。

“累吗？”“不累！”其实，不是不累，只是战斗太紧张顾不得累。

战斗中，她是让人敬佩的人；结束战斗转身离开，她是让人心疼的人。

党旗所指，万难不辞。没有人天生就是英雄，是心中那份永远执着的信仰，支撑她在逆境中拼搏，一次次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每次攻关，她总是时不我待，带领团队向前冲

“穿上这身军装，就意味着这一切是你该做的”“除了热爱，我想不

出其他理由”……这是陈薇的心声。

穿上这身军装，是1991年。那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陈薇，顶着“入伍就意味着落伍”的议论，选择走进原军事医学科学院，开启了攀登医学尖端的漫漫征途。

“病毒是公共健康的最大杀手，是国家安全的隐形威胁。”凭着职业敏感和军人的使命意识，陈薇将抗病毒药物作为主攻方向，积极申请国家和军队课题支持。

担任研究室主任后，陈薇主持的第一项课题就紧贴实战需要——带领团队攻关10余年，成功研制首个纳入国家战略储备的重组疫苗。

时光能让年华老去，却也能滤去浮华，让意志信念历久弥坚。经过军营淬炼，如今的陈薇英姿飒爽、百炼成钢。

自主创新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一名优秀的战士不仅要自己冲锋，还要带动更多战士英勇亮剑、迅速成长。

“睿智与亲和并存，执着与从容合一”。这些年，在陈薇培养带领下，团队“厚度”不断增加，战斗力越来越强。

副研究员迟象阳说，陈薇是教她开阔视野的那个人。

与迟象阳同年被陈薇招入麾下的3名学生，所学专业分别是物理学、工程力学和自动化。在陈薇指导下，迟象阳将自动化和微生物研究结合起来跨界攻关，主动受领搭建单细胞技术平台的任务，成功研发抗体基因平台。后续一系列应急攻关任务都应用到了这个平台的技术。交叉学科的优势，在多次科研中得到充分发挥。

研究员张晓鹏说，陈薇是教他坚韧执着的那个人。

作为陈薇带出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2003年，张晓鹏开始受领某重组生长因子药物研发任务。然而，任务进展并不顺利。

“做科研失败是正常的，看准了就坚持下去。”陈薇时常鼓励自己的

学生。前不久，张晓鹏牵头研发的药物终于拿到了临床批件。

始终以时不我待的使命感，把工作当“一线任务”来完成，是陈薇的信条。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她积极建言献策，一直为加强国家生物安全奔走呼吁。2020年10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明确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陈薇等一批科研工作者的矢志不渝终于梦想成真。

一支新冠疫苗连瓶仅有十几克，很轻；它承载的内容和精神，却很重！

“已知有手段，未知有能力。”面对“已知”和“未知”，陈薇带领团队枕戈待旦。她说，荣誉不是人生的波峰，而是随时响起的冲锋号角。

（黄超、邵龙飞、金雅兰，《解放军报》2021年8月5日）



人物小传

陈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生物安全专家，长期从事生物防御新型疫苗和生物新药研究。

1990年，24岁的浙江女孩陈薇是清华大学生物化工专业在读硕士。1991年4月，她放弃高薪，特招入伍，加入中国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

2003年“非典”暴发，人们从未了解的病毒在国内蔓延，危急关头，陈薇接到命令，对非典致病原因及相关疫苗研发，展开研究。她一头扎进实验室就是无数个日夜。她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分离出SARS病毒。为了满足医务人员的需要，加班加点生产，连续奋战20多个昼夜，使用“干扰素喷雾剂”的1.4万多名医务工作者，无一感染“非典”。

2014年2月，西非大规模暴发并迅速向外蔓延的埃博拉疫情，引起

全球恐慌。年底，陈薇就率团队研发出了世界首个 2014 基因型埃博拉疫苗。2018 年，该疫苗获得了国家颁发的新药证书和药品批准文号，这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获批的埃博拉疫苗产品。

作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逆行者”之一，2020 年 1 月 26 日农历大年初二，陈薇带领团队进驻武汉。到达武汉后，他们开始紧急搭建帐篷建移动检测实验室。1 月 30 日上午，陈薇和她的团队转入移动检测实验室，应用自主研发的检测试剂盒，配合核酸全自动提取技术，使核酸检测时间大大缩短。



梁建英

高铁『复兴号』总设计师
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让世界领略中国 “智”造

巨人的肩膀不好站，必须让自己
成为巨人才行！

——梁建英

高个子，大脸盘，言谈举止间透着女性的细腻和大气——她叫梁建英，是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作为我国高铁装备行业唯一的女总工程师，她主持研制的 CRH380A，创造了时速 486.1 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

从时速 200 公里的“和谐号”，到时速 350 公里的“复兴号”，从跟跑到领跑，她带领的团队，将中国高铁打造成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必须让自己成为巨人才行

中国高速动车组，走的是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产品可以买来，但技术创新能力买不来。原理是什么，外方守口如瓶。”这让梁建英暗下决心，憋足了一口气。

2006 年，中车四方公司启动时速 300 公里高速动车组自主研发，年仅 34 岁的她担任这个车型的主任设计师。

高速动车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每列动车组上的零部件就达 50 万多个，几万张图纸需要设计，需要分析的数据达数百兆，一道道高难度的技术门槛需要跨越。

对梁建英和她的研发团队来说，每啃一个“硬骨头”，都是一场硬仗。梁建英没有节假日成为生活常态，想陪年幼的女儿吃顿饭都是奢望。

2007 年 12 月，由中车四方公司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列时速 300 至 350 公里动车组成功下线。一天晚上，女儿用稚嫩的童音指着电视上飞驰而过的动车组高喊：“妈妈，你的车！”那一刻，梁建英心中既有满满自豪，又有对家庭的丝丝愧疚。

高速列车是试验出来的

半年之后，中车四方公司又向 CRH380A 高速动车组发起攻坚，梁建英再次担任主任设计师，开始了新一轮长达两年的艰苦试验。该动车

组最高设计时速 380 公里，当时世界最快，没有任何先例可循。梁建英说，只有通过大量研究试验，才能确定高速列车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

在兰新线的百里风带上，有他们等待大风的身影；湖南的高温高湿环境，让许多人身上生了湿疹，“比吃减肥药瘦得还快”。高强度的工作，有时候让很多人都撑不住。

CRH380A 高速动车组问世，在京沪高铁先导段创造了时速 486.1 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当列车慢慢停下来，梁建英与同伴们握手庆贺那一刻，大家才发现，她的手是冰凉的。

攀登下一个全新高度

对待科研工作，梁建英一丝不苟。高速动车组转入自主创新阶段时，有一次梁建英就一项报告询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解决？”有工程师就说：“当时外国人交给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梁建英一听就火了，她严厉地说，以后谁再说当初人家交给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话，我就让你们写检讨。“设计有一定的继承性，但是设计师不能被别人的思维固化，我们需要变更和创新，这样团队才能有活力、有朝气。”

梁建英和团队设计制造的动车组，让全世界领略到中国智造的力量。作为主要参研人员，京沪高速铁路系统工程项目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梁建英如今带领团队，又开始研发时速 350 公里长编组中国标准动车组和时速 250 公里中国标准动车组，助力“复兴号”形成系列化，同时还要研发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速列车。”梁建英信心满满。

（刘成友，《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



人物小传

梁建英，1972年出生，山东潍坊人。1995年7月，梁建英从上海铁道大学毕业，分配到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了和中国铁路事业的不解之缘。她历经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的不同发展阶段，更是让中国高铁享誉世界的幕后功臣。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经受着一种“大国”之痛，这就是“春运”。买票难、人挤人，在几十亿人次的人口流动中，交通运输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同时存在运力不足、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而破解困局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铁路现代化建设，推进铁路技术装备现代化，其中就包括发展高速铁路。2004年，梁建英成为时速300～350公里动车组研发设计项目的主任设计师。自2007年国产动车组投入运行以来，速度快、乘坐舒适的高铁，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今天的中国高铁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已经领先全球。这一切，都离不开梁建英和团队成员们一次次的努力和探索。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随到领跑，梁建英说有四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2004年以前，原始积累阶段。第二阶段：2004—2006年外来技术引进、消化、吸收阶段。在技术转让的过程中，合作方会告诉你如何去做，但为什么这么做，原理是什么，他们都非常神秘。梁建英说“巨人的肩膀不好站，必须让自己成为巨人才行”。第三阶段：自主

提升阶段。2006 年启动时速 300 公里动车组设计，数字的提升难度太大了。局部震动对车辆寿命也会产生影响，最终他们找到并解决了这个问题。第四阶段：全面创新的阶段。让中国高速列车立足于世界先进行列的阶段。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凭借责任、激情和攥紧拳头的“狠劲”，为了攻克一道道难关，在 1000 多个日夜里，梁建英与设计团队的同事通过系统梳理，从关键部件展开研究，将一摞摞资料、设计思路变成了方案可行的图纸。做了 450 多项的仿真分析，1050 多项的地面试验，2800 多项的线路试验，她主持研制的 CRH380A 动车组创造了时速 486.1 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复兴号”动车组实现时速 350 公里商业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



刘
洋

中国首位女航天员
时代楷模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被祖国需要很幸福”

不少人问我：这种日子很辛苦吧？学习训练这么紧张，很累吧？我真的没有感觉到辛苦，反而觉得非常幸福，是一种被组织信任、被祖国需要的幸福。

——刘洋

眼前的刘洋，一头干练的短发，神态沉稳安静，眉宇之间有着女兵特有的飒爽和坚毅，和熟人口中那个军乐团里的黑管吹奏者、空军演讲比赛的得奖选手、文艺演出的主持人似乎很难融为一体。

渴望飞翔

因为热爱，飞得更高更远

作为我国首位将飞向太空的女航天员，同时又是第二批航天员中首位执行任务的代表，刘洋自然是乘组中的“焦点”。

“神九”任务中，刘洋主要负责航天医学实验和空间试验管理，内容达数十项。对于一位进入航天员大队刚满两年的“新兵”，这的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刘洋深知自己的责任，自2010年5月加入航天员大队，到今年6月首飞，两年来，她一门心思扑在学习训练上。短短两年就要飞天，这创造了中国载人航天的新纪录。要在两年时间里浓缩训练两位搭档14年的训练知识，除了更刻苦、更勤奋，别无他路。因为热爱这个事业，刘洋耐住了这份艰苦和寂寞。

除了单调乏味的生活，更大的挑战是各种身体适应性训练。按照刘洋现在的成绩，她可以像男航天员一样，8倍于自己的重量压在身上，依然可以保持头脑清醒，正常操作。

身经百炼

珍惜幸运，克服风险挑战

2009年，刘洋作为空军运输机飞行员，刚好赶上在空军飞行员中选拔第二批航天员，她通过层层考核，顺利入选。入队刚两年，又赶上了我国实施载人交会对接任务，她以优异成绩通过定选考核，成功入选任务乘组。

幸运的垂青，来自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艰苦磨炼。为了能早日飞上天，她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汗水。每天晨练，别人跑5公里，她就跑7公里，刮风下雪从不间断。2001年毕业后，刘洋被分配到广空航空兵某师。她刻苦钻研飞行技术，在同批女飞行员中第一位“放单飞”。

飞行并不浪漫，而是充满了风险和挑战。2002年9月的一天，刘洋驾驶战鹰进行仪表飞行。飞机起飞离地10米左右时，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一股鲜血喷到风挡玻璃上，座舱内立刻便充满了焦糊味。危急时刻，刘洋表现出年轻飞行员少有的镇定，她集中精力保持飞机状态，和机组成员密切协同，实施紧急着陆。成功降落后一检查，飞机共撞上了18只信鸽，有两只被吸进了进气道。如果应急处理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

才女丽人

体味幸福，诠释理想追求

作为年轻人，思维活跃、性格开朗的刘洋给杨利伟这位前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杨利伟说，因为年龄有十三四岁的差距，从性格到对事物的看法，刘洋和他们都“非常不一样”。但刘洋也有着比同龄人更强的使命感，骨子里的军人味很浓。

刘洋说，两年时间，她从来没有逛过街，也没有看过电影。“不少人问我：这种日子很辛苦吧，学习训练这么紧张，很累吧？我真的没有感觉到辛苦，反而觉得非常幸福，是一种被组织信任、被祖国需要的幸福。”

刘洋小时候生活在河南郑州一家工厂的家属院，因为学习成绩好，一直是邻居们教育孩子的榜样。她是家里的独生女，更是父母的“贴身

小棉袄”。

作为妻子，每每说到自己的爱人，刘洋的心里总是充满爱与感激。已经快 34 岁，还没有孩子，刘洋也跟爱人讨论过这个“计划”。“只能等执行完任务了。”刘洋腼腆地笑了。

（孙秀艳、宗兆盾、余建斌，《人民日报》2012 年 6 月 16 日）

人物小传

刘洋是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2012 年 6 月 16 日至 29 日，刘洋作为神舟九号航天员乘组的一员，与景海鹏、刘旺一起圆满完成我国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任务，成为中国第一个到过太空的女性。

1978 年 10 月 6 日，刘洋出生在河南省郑州，祖籍河南省林州市；1997 年刘洋从郑州十一中毕业后参军，以高分考入空军长春飞行学院，为中国第七批女飞行员之一。2001 年毕业分配至广空航空兵某师，成为中国空军运输机飞行员，能驾驶 7 种机型。

2010 年，凭借优异的表现和过硬的业务技能，刘洋从 15 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中国第二批航天员，并开始接受基础理论、航天环境适应性、航天专业技术、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等八大类几十个科目的航天员训练。

选拔女航天员的条件非常严苛，对人的精力、判断能力、处置能力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就好比从鸡蛋里挑骨头，甚至皮肤上的疤痕、蛀牙及脚茧都不能有。全球已有 56 位女航天员飞上太空，其中美国 46 人，苏联和俄罗斯 3 人，加拿大、日本各 2 人，英国、法国和韩国各 1 人，

而当时中国则为空缺。

曾经3次登上太空的航天员景海鹏曾这样介绍刘洋：“刘洋才两年的航天员，工作训练要追上我们十几年学的内容，不太可能。但是她利用两年时间，周末都没有休息，把所有的课程、十几个系统都赶齐了，和我们步调一致，完全达到了执行飞行任务的能力。”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2012年6月16日，随着搭载神舟九号的火箭成功点火升空，女航天员刘洋成为中国航天史上第一名登上太空的女航天员。

在长达13天的飞行中，刘洋不仅完成了手控交会对接的时候进行监视、支持的艰巨任务，在此次飞行任务中还出色地承担了科学实验任务，给国家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她说：“被祖国需要是一种幸福。能够投身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文花枝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最美奋斗者

生死关头唱响生命的强音

不管能做出多少成绩，我都会继续保持奋斗的姿态，认真工作，热爱生活，努力做一名平凡而美丽的奋斗者，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支持与厚爱。

——文花枝

灾难来临时，她把生的希望让给了游客，把死的威胁留给了自己。那一年，文花枝 23 岁。

2005 年 8 月，带团旅游时，导游文花枝和游客遭遇了严重车祸。当施救人员一次次向她走过来，她总是吃力地摇摇头说：“我是导游，

我没事，请先救游客！”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救援时间里，她多次昏迷，但只要一醒过来，就不停地为大家鼓劲、加油，文花枝是最后一个被救出来的。她左腿9处骨折，右腿大腿骨折，髌骨3处骨折，右胸第4、5、6、7根肋骨骨折。由于延误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医生不得不为文花枝做了左腿截肢手术。

截肢后，看着空荡荡的裤管，文花枝埋下头伤心地哭了。但几分钟后，再抬起头时，她眼里已经没有了泪水：“即使少了一条腿，我也会坚强地生活，我会用微笑面对一切”。

手紧紧扶住栏杆，右腿站稳立住后，再慢慢抬起左腿……文花枝的康复过程漫长而艰辛，左腿截肢处经常被假肢磨得血肉模糊，文花枝咬牙坚持锻炼，从不叫苦喊痛，总是笑着对家人和朋友说：“没事，我好着呢！”

劫难之后，从前的憧憬和设想都被打乱。“身残志不能丢！”冷静思考后，文花枝决定：告别自己热爱的导游事业，重回校园，提升专业知识和能力，将来更好地为旅游事业服务。

2006年8月，文花枝进入湘潭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学习。刚装上假肢那阵子，身体很不适应，常人十分钟的路程，文花枝要走上半小时。

2006年以来，文花枝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等荣誉。2012年，文花枝当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鲜花和掌声蜂拥而至，但文花枝始终保持清醒。

“我要努力地改变自己。”文花枝从没闲着，目的只有一个：让舍己救人的文花枝淡出人们的视野，使掌握了专业知识、热心公益事业的文花枝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2013年，文花枝硕士研究生毕业，成为湘潭市旅游局的一名职工。

多年过去，文花枝说：“不想永远活在当年的光环里，希望为大家做一点实事。”2015年，文花枝作为扶贫专干，被派往平里村这个韶山市最贫困的村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山路崎岖，行走不便，她就搭乘摩托车，逐家逐户走访，将村民的致贫原因、贫困程度、扶持需求等基本信息都一一记录下来，为每户贫困户制订了详细的脱贫计划。

丧偶独居的村民肖金华，眼睛有残疾，家里缺少经济来源，意志消沉，文花枝鼓励她不要气馁。不仅为她争取了生活补助，还用亲身经历鼓励她，让她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在文花枝的努力协调下，许多优秀旅游企业负责人、旅游策划专家多次到平里村考察，为村里的旅游发展出谋划策。2016年，平里村一举摘掉了“省定贫困村”与“湘潭市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村”两顶帽子。无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普通村民，都对这个看似柔弱的女支部书记伸出了大拇指。

2017年，结束驻村帮扶后的文花枝回到了单位，从事旅游推广与对外交流工作，现任湘潭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推广和对外交流科副主任科员。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岗位，文花枝的每一步都是全力以赴，坚持用实际行动为“奋斗”作出自己的诠释。她说：“不管能做出多少成绩，我都会继续保持奋斗的姿态，认真工作，热爱生活，努力做一名平凡而美丽的奋斗者，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支持与厚爱。”

（龙军，《光明日报》2019年10月3日）

人物小传

文花枝，女，汉族，中共党员，1982年11月生，湖南湘潭人，湖南省湘潭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副主任科员。

2005年8月，在旅游团遭遇严重车祸的生死关头，她把生的希望让给游客，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兑现了诚实守信、服务游客的诺言。因为延误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造成左腿高位截肢。

2006年10月27日，由中宣部、国家旅游局、全国妇联、湖南省委共同举办的“全国模范导游员文花枝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2015年，她主动请缨参加精准扶贫工作，到韶山乡平里村（原韶西村）任第一书记，是湘潭市首批驻村帮扶工作队唯一一名女干部。驻村期间，她走访调研提炼出的《村民最关心关注问题解决计划一览表》在两年内全部落实解决，平里村一举摘掉了“省定贫困村”与“湘潭市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村”两顶帽子。

2012年6月，文花枝当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



黄文秀

『七一勋章』获得者

时代楷模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青春之花，绽放在扶贫路上

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

——黄文秀

“一个人，燃尽了青春，把爱与希望种在无数人心中……你赋予的力量，再艰难的道路，我们继续着征程……”最近，在广西百色市，许多人都在动情地传唱这首名为《力量》的歌。它是百色市一位村民为哀悼因公殉职的黄文秀所作。

黄文秀是百色田阳县人，生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

理论科副科长、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第一书记。2019年6月16日，她回家陪护刚做完肝癌手术不久的父亲后，因惦记百坭村的防汛抗洪工作，冒着暴雨连夜返回工作岗位，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

“我想回去建设家乡，把希望带给更多父老乡亲”

废旧轮胎搭上木板当作“沙发”，只有一铺床、一张蚊帐，这便是黄文秀的卧室。

“已经比原来好多了，我们家兄妹三个，一直以来都是贫困户。前两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我们从贫困山区搬出来，再加上小妹研究生毕业有了稳定收入，家里才脱了贫。”黄文秀的姐姐黄爱娟说。

在家人眼里，黄文秀从小喜欢读书。黄爱娟说，家里条件困难，小妹读高中时，就得到教育扶贫资助，读研究生时也得到国家的帮扶，“小妹常说，她是靠政府资助走出大山、上完大学的，她将来要回来建设家乡”。

2008年，黄文秀考入山西长治学院思政专业，该校原政法系党总支书记程过富曾问黄文秀：“你的成绩还不错，为什么来长治？”

黄文秀回答：“我们百色是革命老区，长治也是革命老区，都是邓小平同志战斗过的地方，我想到这个地方来。”

2011年6月11日，在鲜艳的党旗下，黄文秀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2013年，黄文秀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2016年硕士毕业后，她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当一名定向选调生，扎根基层。

“我跟她说，以你的能力，留在北京没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黄文秀的导师郝海燕曾给她建议。

可黄文秀仍坚持内心想法：“我是从广西的贫困山区出来的，我想回

去建设家乡，把希望带给更多父老乡亲”。

“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黄文秀牺牲后，同事们在她的房间里看到，一本讲述长征故事的书籍《西行漫记》格外醒目。驻村一年多来，她经常用长征精神来勉励自己。

回顾2018年3月刚上任时的情景，黄文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百坭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分散居住在几个不同的山头，对于我这个不熟悉地形的‘新手’来说，要在最短时间内掌握全村贫困户的详细情况，是非常困难的。但我没有失去信心，想起了那句话——‘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长征的战士死都不怕，这点困难怎么能限制我继续前行。”

她走村串户了解情况，但是一开始并不受欢迎。

“你这个小年轻，我们跟你聊了也没用。”“跟你说了你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吗？一个女娃娃能行？”

黄文秀觉得心里憋屈，搞不懂为什么自己辛辛苦苦地翻山越岭、走村串户，群众却还质疑。她找到村里的老支书梁建念请教，老支书语重心长：“黄书记，你刚来，老百姓对你还不熟悉，他们不愿与你深聊，你也要理解他们。农村其实就是个熟人社会，老百姓们跟你熟了，自然就接纳你了。”

有一次入户，村里的贫困户老黄要求纳入低保。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战告诉他没达到纳入低保的条件。老黄却反问：“那我要‘贫困户’干什么？”谈不拢，扶贫手册填不了，工作没法开展。

“文秀书记说让她来试试，结果老黄连门都不开。”周昌战说，黄文

秀吃了闭门羹，但并没放弃。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好不容易敲开了门，老黄还是黑着脸：“我为什么不能享受低保？为什么不给我发小额信贷、产业奖补资金？你不给我，我就不在手册上签字。”

黄文秀笑着说：“我也姓黄，我叫你哥。哥你这么聪明、勤快，一定能奔小康。”几通好话，老黄脸上有了笑容。黄文秀趁热打铁：“政策有的，我一定给你。你把果园经营好，我帮你申请产业奖补。”

此后，黄文秀和老黄以兄妹相称，她向老黄解释扶贫政策，时常到他家果园查看，叮嘱要做好果园护理。不久，老黄一家脱贫。

百坭村村民种了很多砂糖橘，但还是穷。“我们种植技术不行，又没销路，挣不到钱。”村民们说，文秀书记来了后，联系到百色一家公司，帮村民建起标准化果园，村民以土地入股，公司负责传授技术。

可是果怎么卖出去，又让村民伤脑筋。村屯路不好，来收果的都是本地小摊小贩，一天也拉不走几车。黄文秀争取资金修好道路，联系云南、贵州等外省大果商来收购。她还帮着建立电商服务站，为30多户贫困户销果创收。

如今，百坭村摸索到了适合本村发展的产业——种植杉木、砂糖橘、八角等，全村种植杉木从原来的8000余亩发展到2万余亩，砂糖橘从1000余亩发展到2000余亩，八角从600余亩发展到1800余亩，另外种植优质枇杷500余亩，种植产业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周昌战说，扶贫工作非常辛苦，但从没人听黄文秀叫过“苦”。她陆续帮村里解决了4个屯的道路硬化，修建蓄水池4座，完成两个屯路灯的亮化工程。2018年3月，百坭村的贫困发生率为22.88%，经过努力，2018年百坭村103户贫困户顺利脱贫88户，贫困发生率降至2.71%，实现了贫困户户户有产业，村集体经济项目增收翻倍。

“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特别注重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她从走访中了解到，群众原来不大配合村里工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两委”干部为群众办事不够主动，有时群众办事找不见人，意见比较大。黄文秀从抓实抓严村干部的坐班值班制度开始，白天落实专人负责在村里接待群众，晚上与村干部一起开展遍访贫困户工作，征求意见、宣传政策，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黄文秀走访了百坭村 38 名党员，征求党员对全村发展的意见建议，并将他们划分为 3 个党小组开展各类活动。同时，她还积极将“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融入扶贫工作中，扎实推进抓党建促脱贫工作。

作为一名党员，黄文秀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村民黄仕京家因学致贫，黄文秀了解情况后及时为他家申请“雨露计划”，一次性落实了 5000 元补助，解了燃眉之急。黄仕京非常感动，执意留黄文秀吃晚饭。饭间，黄仕京突然问她：“你是在北京读的研究生，怎么会来我们这么边远的农村工作？”

黄文秀说：“百色，是一个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大石山区、贫困地区、水库移民区于一体的特殊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也是我的家乡。面对如此情况，怎么还有理由不回来？共产党是切实为群众谋发展、谋福利的党，怎么能不响应党的号召，到艰苦偏远地方工作？”黄仕京听后，当场端起酒碗向她敬酒，表示也要让家里孩子争取早日入党，毕业后回来建设家乡。

“听到他的话，我心里非常感动，自己的工作能够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共产党的好，对我是非常大的鼓舞”。黄文秀在扶贫心得中写道。

近年来，黄文秀的父亲身患肝癌，做了两次大手术，让家庭再次陷入困境。但是，黄文秀不仅没向组织提出要求，而且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慰问资助村里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

“她父母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尤其是她父亲，她没有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同事知道。”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科科长何小燕回忆起来，泪流满面。

“6月14日，也就是黄文秀牺牲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她还在与我们开会讨论村里的项目。”周昌战回忆说，当天，村里一个灌溉200多亩农田的渠道被山洪冲断裂了，黄文秀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带领村干部到现场查看灾情，当晚组织大家汇总受灾情况，商量如何抓紧维修、申请项目、解决群众急需的问题，还列出了维修任务清单。

翻开黄文秀的入党申请书，其中写道：“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这份庄严承诺，黄文秀始终践行，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刘华新、庞革平、李纵，《人民日报》2019年6月30日）

人物小传

黄文秀，女，壮族，广西田阳人，中共党员，1989年4月出生。生前是广西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

2016年，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作为定向选调生

到广西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2018年3月，黄文秀被派驻到百坭村任第一书记。

黄文秀刚到百坭村工作时，这个深度贫困村共有472户2067人，其中有103户473人未脱贫，贫困发生率为22.88%。脱贫任务艰巨，但是并没有吓到她。

决战贫困决胜小康，就是她“心中的长征”，为此再大的困难她都敢于面对。

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到贫困户家，不再拿着本子问东问西，而是脱下外套帮贫困户扫院子；贫困户不在家我就去田里，边帮他们干农活，边聊天，时间久了，村民们见我多了，开始慢慢地接受了我。”听到村民说“你这个丫头，还真是难‘缠’得很哩”，她心里感到很欣慰。

取得村民们的信任支持是一个好的开端。黄文秀认为，百坭村穷的首要原因是基础设施落后，行路难，用水难。

为解决百坭村的难题，她申请到了1.8公里的通屯硬化项目，新建4个蓄水池，解了百坭村生产生活的燃眉之急。

产业发展滞后，黄文秀认为这是百坭村穷的另一个原因。贫困群众要砍掉不结果的柑橘，黄文秀急忙去阻止，并找专家解决。

百坭村那用屯一直种植砂糖橘，但由于缺乏技术、管理不到位、市场打不开等原因，2017年产量只有5万多公斤。黄文秀引进专业公司，引来果商，建立电商平台，让砂糖橘产业凤凰涅槃，目前年产量达80多万公斤。

经过黄文秀一年的努力，百坭村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脱贫18户56人，教育脱贫28户152人，发展生产脱贫42户209人，共计88户417人，贫困发生率降到2.71%，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6.38万元。

2019年6月17日晚，因担心百坭村会发生洪涝灾害，黄文秀从田

阳区的家中冒着大雨连夜往百坭村赶，路上遇到山洪暴发不幸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0岁。

2019年，百坭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79%，实现了整村脱贫。2020年底，百坭村所有贫困户脱贫摘帽，实现了黄文秀生前的夙愿。

2019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追授黄文秀“时代楷模”称号；9月25日，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10月，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20年5月，黄文秀获评“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2021年2月，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称号；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黄文秀“七一勋章”。

为花季少女解开裹脚布，为广大妇女争取参政权，为底层娼妓寻求独立人格，谁说我辈不女权？

——向警予

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

——赵一曼

我决定入党，就是决定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甚至宝贵的生命。

——江竹筠

如果我能活到 100 岁，还有 5% 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更加坚定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

——李桓英

唱戏先做人，无德艺不立。

——常香玉

共产党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立党为公，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申纪兰

希望青年科技工作者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的进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屠呦呦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

——卓嘎、央宗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陈薇

巨人的肩膀不好站，必须让自己成为巨人才行！

——梁建英

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

——黄文秀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官方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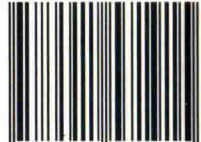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官方天猫旗舰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官方京东旗舰店

ISBN 978-7-5115-7191-5



9 787511 571915 >

定价：48.00 元